

主 办：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

临沂市地方史志研究院

主 任：姜仕礼

委 员：李洪彦 段 洪 唐少清

卢少林 王文博 王卫东

陈宏图 李树峰 夏洪雷

黄夫群 刘如彬 程丽丽

邵 勇 杨 岩 侯宗良

刘焕英 周宗青 石洪欣

主 编：李洪彦

副 主 编：段 洪 呼国英 高 雷

特邀编审：曲文军 王纪明

责任编辑：杜 帅 宋希芝

美术编辑：胡拙安

法律顾问：山东今海瑞律师事务所 刘海亮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1310012号

目 录

【本期特载】

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04

【峥嵘岁月】

鏖战齐鲁（五） 吴瑞林 09

统一战线在鲁南 李维民 12

万里征程江南路

——华东子弟兵团垛庄连征战纪实 李忠和 薛俊盈 18

【名人素描】

曾国华传（四） 王连城 曾林辉 25

疾风劲草阎尔梅（一） 阎 强 28

【文化掇英】

沂蒙大地一支笔（一）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34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范玉秋 36

【史海撷萃】

萧颖士轶事 温 瑜 42

【探索发现】

东夷故乡寻踪（二） 高 雷 45

老照片“老大娘给炮兵指示目标”里的

老大娘找到下落了 郑玉强 52

【蒙山沂水】

临沂师专记忆 杨东霞 56

| | | | |
|---------------|------------------|-----|----|
| |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瞭阳崮 | 公丕成 | 62 |
| 【诗画赏析】 | | | |
| | 我的“油画生涯” | 王沂东 | 64 |
| 【影像沂蒙】 | | | |
| | 2000年：建设中的临沂人民广场 | 本 编 | 68 |
| 【史料辑存】 | | | |
| | 鲍宅山凤凰画像 | 李遵刚 | 70 |
| 【百家渊流】 | | | |
| | 日照丁氏先贤珩公 | 丁钢昌 | 76 |
| 【沂蒙乡亲】 | | | |
| | 作曲界“隐士”刘廷禹 | 索之华 | 78 |
| 【工作动态】 | | | |
| | | 本 编 | 80 |

封面：瞭阳崮

(详见本期《“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瞭阳崮》)

封底：画之妙妙在意之境，融笔墨之外那点意思。——龙溪说画
胡石/书



地 址：临沂市北京路17号
行政服务中心655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2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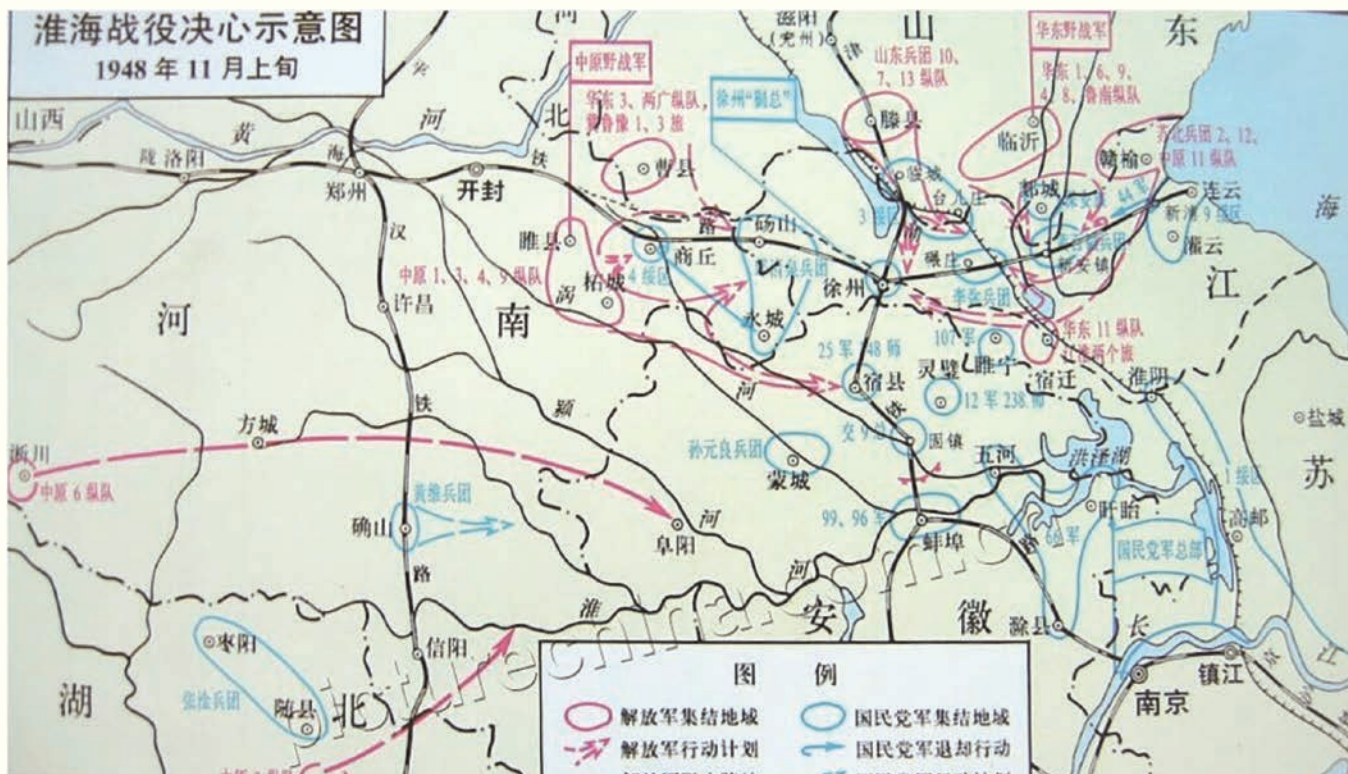
印 数：2000册

发送对象：中共临沂市委党史研究院系统内部

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预备命令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甲) 济南大捷后，刘匪^①为防我进击徐州及新^②、海^③、两淮^④地区南下华中，刻以黄^⑤兵团主力守备新安等地区；十三兵团之九军守备运河以西徐州、赵墩段铁路，其八军亦正自丰、碭地区东开徐州中；七十二军似任徐州城防守备；冯治安部主力控制韩庄、台儿庄及柳泉、贾汪及运河沿线正加修工事中；邱^⑥兵团主力亦已东移碭山、丰县、黄口地区集结待机，似随时作机动增援准备；孙（元良）兵团及刘汝明部六十八军、五十五军控制于商汴段，并有继续东开模样。我陈军长^⑦、邓政委^⑧率部已于二十二日攻占郑州，并将继续转兵东进夺取开封，尔后继续向徐蚌段前进。



(乙) 我为继续歼灭中原战场敌之机动兵团有生力量，使山东、华中解放区联成一片，暴露津浦南段，孤立徐州，进一步开展中原战局更有利之形势，决集中华野全力（包括西兵团、山东兵团、苏北兵团及鲁中南主力）首先歼灭据守新安镇为中心之黄百韬兵团（包括二十五军、六十四军、六十三军、一百军各部），并求歼徐州外围韩庄、台儿庄、贾汪地区之冯治安一部或大部，尔后视情况发展，进击两淮、高、宝^⑤及新、海，或再歼由徐东援之邱、李^⑥兵团之大部或一部；乘胜扩张战果，西进津浦，南逼长江，打烂蒋匪之华中防御体系，迫敌完全转入防御。估计战斗发起时，冯治安部可能收缩韩庄、台儿庄及运河沿线；黄百韬兵团亦可能缩集新安镇为中心周围地区固守待援，徐州以西之邱兵团可能向徐州集结，会同李兵团向徐州东北出动，以保徐州，但发觉我主力围歼黄兵团时，该两兵团有先后沿陇海路两侧东援，或同时集中东援之可能；同时海州、两淮之敌亦可能以小部出扰策应。

(丙) 各部作战任务预定区分如下：

(一) 集中一、六、九、鲁中南、四、八、十一，及苏北兵团（二、十一、十二）十个纵队并特种纵队担任围歼以新安镇为中心之黄百韬兵团，约七至八个旅兵力，其任务区分：

1. 以四、八纵附东兵团炮兵团之野炮营首先围歼运河车站、炮车地区之敌，并扫清泇口至猫儿窝段运河两侧及邳县、官湖地区之敌，开辟与控制阻援阵地；尔后该两纵主力即沿运河以东、泇口、滩上，邳县、官湖及运河车站、炮车沿线，并以南至猫儿窝、窑湾、纪集之间地区部署阻援，并应以运河线为主要阵地，构筑坚固工事，尽量伸派精干部队挺进至运河以西，协同江淮军区武装，逼近赵墩、土山镇、睢宁地区游击侦察活动，坚决阻击李、邱兵团之东援，保障主力围歼黄兵团之作战安全，该两纵统归四纵陶司令、郭政委指挥，其具体部署由陶郭^⑦决定之。

2. 以九纵沿沭河两侧前进，担任包围新安镇及红花埠附近地区之敌（黄百韬兵团部附四十四旅）任务，俟我围歼瓦窑地区之敌得手后，配合一、六、鲁中南纵围歼新安镇之敌。

3. 以一、六纵队、鲁中南纵队（附特纵日式榴弹炮二个连及野炮三个连——其日榴二个连及野炮一个连附一纵，另野炮二个连附六纵）由本部直接指挥，担任围歼瓦窑地区之十三军主力。一纵经郟城、马头之间地区开进，应以主力首先由红花埠以西，杨家集、程家集以东之间，插至前后沙墩、底湖、侯墩、东马港之线。背靠九纵，尔后由东向西配合六、鲁中南纵围歼瓦窑、程家集、马圩地区之六十三军生力。六纵经马头、重坊之间地区开进，应以主力沿杨家集、程家集（不含）以西沂河以东之间插至青石桥、大小新庄、松园、老庄，并以一部由马圩以南向东与一纵打通联系，由西向东及由南向北攻击，配合一、鲁纵围歼马圩、瓦窑、程家集地区之六十三军主力。鲁中南纵应以一部包围监视郟城之王洪九部，主力尾一纵之后跟进至瓦窑以北之杨家集地区，担任由北向南攻击。配合一、六纵围歼瓦窑、程家集、马圩地区之六十三军。一、六、鲁中南纵围歼瓦窑、程家集、马圩地区之六十三军作战，应力求速战速决，尔后即转兵东向，协同九纵围歼新安之敌。

4. 苏北兵团之二、十二纵（欠三十四旅）并指挥王、张^⑧纵队（附特纵日式榴弹炮一个连，野炮四个连），担任围歼阿湖地区之二十五军，该部经赤岸镇、山里头、张苍之线以东地区开进，应首先以主力一部夺取控制新安镇以东及东北之大佃户、205高地，116.4高地至山里头、鲁窝子沿线阵地，切断敌二十五军向新安镇之退路，尔后集中主力分割围歼之，但亦必须同时以一部首先切断敌向海州退路，防敌后窜。苏北兵团留淮海之十一纵，应同时包围高流、高潭沟、官庄地区之六十四军，不让其与二十五军及黄兵团部靠拢，待瓦窑、阿湖地区得手后，集中二、十二、王张纵队配

合该纵围歼之，其具体部署由韦吉^⑩决定之。

5.特纵除工兵五个连分附七、十、四、八、十三纵协助架桥，日式榴弹炮、野炮分附一、六纵及苏北兵团作战外，该纵率美式榴弹炮团及坦克全部于战役发起时，集结临沂附近地区待命参战。

(二)为使主力有充裕时间围歼黄百韬兵团，决定七、十、十三三个纵队，统归东兵团指挥，担任由临枣线向乾坤庄、台儿庄、运河沿线、贾汪地区，以攻势钳制迷惑敌人，形成攻徐态势，造成敌人错觉，吸引邱、李兵团北援或停滞于徐州附近，不敢大胆东援，各纵任务如下：

1.十纵沿临城（临城之敌小部包围展开政治攻势解决之）、沙沟南下，首先以精干得力部队袭歼乾坤庄守敌，抢占控制大桥，尔后渡河南下，沿津浦路及东侧地区向利国驿、柳泉扩张攻势，并协同七纵向贾汪地区之敌攻击。

2.七纵由临城、枣庄之间先派精干得力部队袭歼万年闸地区守敌，抢占控制万年闸大桥，另以一部于主力行动前包围峄县，切断枣、峄敌之退路，掩护主力经曹马村、峄县、古邳地区，由万年闸及其东西地区渡运河直扑贾汪，如发现敌向南收缩则歼灭之，力求围攻贾汪冯治安总部，配合政治攻势迫冯起义，该两纵统归十纵宋司令、刘政委^⑪指挥。具体部署由宋刘决定之。

3.十三纵担任围歼台儿庄之敌，如该地不便攻击，则可先以小部包围监视，主力由台儿庄以西至万年闸渡运河直扑汴塘、宿羊山，寻歼守敌，切断台儿庄及以南运河沿线守敌退路而歼灭之，得手后以主力控制于宿羊山、汴塘及以北阵地外，应以一部迫近包围碾庄、曹八集段守敌，向东与四、八纵打通联系，准备协同四、八纵阻歼可能由徐沿铁路东援之敌。

七、十、十三三个纵队，具体部署由谭王^⑫决定之，东兵团之炮兵（欠一个营附四、八纵）之附属，亦由谭王规定。

(三)三纵并指挥广纵，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两旅进入鲁西南金乡、单县、成武之间地区，视机向商砀^⑬段发动攻势，配合陈邓所率攻郑、汴部队东进破击津浦徐蚌段之行动及我东线主力围歼黄兵团之作战，力求拖住孙兵团不得经商、砀东援，并威迫邱兵团之侧后，使其不敢放胆由砀、徐东援。第二步待陈邓攻汴得手，主力向东进击津浦时，再视机动转协同作战，具体部署由三纵孙司令、丁政委^⑭决定。

(四)各部在指定集结地区（另纸规定），战斗开进中应注意组织精干部队于主力前半日行程，搜索截歼击各开进地区及两侧外围守敌，勿使逐步后缩。

以上各纵统于十一月三日自指定集结地区开进，于五日晚发起战斗。

(五)华中、江淮、冀鲁豫、豫皖苏军区之地方武装，在战役发起时即开始破击攻歼陇海、津浦铁路，断敌后方交通补给，迟阻敌之增援，配合主力作战，其任务区分如次：

1.江淮军区之独立旅及三十四旅配合淮北地武担任破击陇海赵（墩）徐（州）段及津浦之徐（州）蚌（埠）段，以赵徐段为重点。淮南地方武装应对蚌（埠）浦（口）段展开轮番破击。

2.豫皖苏应集结独立旅及分区基干团，担任破击津浦之徐（州）蚌（埠）段及陇海徐（州）商（丘）段，以徐蚌段为重点。

3.冀鲁豫军区担任对陇海路之徐（州）商（丘）段辗转轮番破击。

4.华中军区之淮海分区地方武装配合滨海分区组织对海州、新浦地区守敌攻势，监视新浦、海州之敌，打击迟阻其西扰声援，同时以一部监视两淮之敌，苏中地武应组织对运河沿线及沿江发动攻势，箝制南线之敌。

5.滨海地武应配合淮海地武监视新浦、海州之敌，打击迟滞其西扰声援。

(丁) 侦察任务区分:

1. 一、六、鲁中南纵查明掌握瓦窑地区之六十三军情况。
2. 九纵负责查明掌握新安镇黄兵团部及一百军之情况。
3. 苏北兵团及王张纵队负责查明掌握阿湖地区之二十五军情况，及高流、高潭沟地区之六十四军情况。
4. 四、八纵负责查明掌握炮车、运河车站之六十三军情况。
5. 十三纵负责查明掌握枣峰、台儿庄、汴塘、宿羊山地区之冯治安部五十九师情况。
6. 七纵负责查明掌握临枣线、万年闸、贾汪地区之冯治安部情况。
7. 十纵负责查明掌握韩庄、利国驿、贾汪地区及临城之冯治安部七十七师之情况。
8. 三、广纵负责查明掌握兰封、商丘、砀山、黄口段之孙元良、邱清泉兵团情况。
9. 各军区负责掌握该地武破击地段之情况。

(戊) 各部开进时间序列路线及集结地区区分:

(一) 左路:

1. 十一纵于二十五日晚由现地出发，沿卞桥、大平邑、费县、临沂之线，以五日行程于三十日拂晓前，进至重沟（不含）东北，以蒋家屯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2. 六纵应二十五日晚由现地出发，经大平邑、铜石、费县，以五日行程于三十日拂晓前，进至朱陈西北之磊石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3. 一纵于二十六日晚由现地出发，经南陀罗、卞桥、铜石、费县、武德，以六日行程于十一月一日拂晓前，进至临沂以南之东西高都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4. 特纵于二十七日晚由现地出发，经放城、大平邑、地方、费县，以四日行程于三十一日拂晓前，进至以徕庄铺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5. 野直于二十八日晚由现地出发，经泗水、南庙馆、大平邑、地方，以四日行程于十一月一日拂晓前，进至费县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6. 十三纵于三十日晚由泗水地区出发，经卞桥、大平邑、铜石、郑城，以三日行程于十一月二日拂晓前，进至梁邱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7. 九纵应于三十日晚由蒙阴以南之桃墟地区出发，经双侯集、半程、临沂，于三日行程于十一月二日拂晓前，进至重沟以西之大王家湖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8. 鲁中南纵队应于三十日晚南移华埠以东地区集结待命。

(二) 中路:

1. 四纵应于二十五日晚由现地出发，经兖州、土旺、城前、白彦、梁邱，以五日行程于三十日拂晓前，进至驼阴以南之西河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2. 八纵应于二十七日晚由现地出发，经兖州、界牌、梁邱，以六日行程于十一月二日拂晓前，进至梁邱东南之潮仙桥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三) 右路:

1. 七纵应于三十日晚东移西集以北地区集结待命。
2. 十纵应于二十六日晚由现地出发，经肥城、安驾庄、宁阳、兖州、邹县，以六日行程于十一月一日拂晓前，进至滕县为中心地区集结待命。

(四) 三纵、广纵应于二十八日前，进至成武、单县、金乡地区待机。

(五) 各纵应于三十一日即派人到徕庄铺特纵驻地，接领所配属之炮兵。特纵附属各给之工兵连，应于十一月一日前，进至指定各该纵之集结地区交接。

(己) 通讯联络:

本期特载

1. 口令联络记号，十月份仍继续使用讯字委四号，自十一月一日启用野字第一号。

2. 步炮联络记号，自十一月一日启用野字第一号（其旗色一律使用三色指挥旗）。

（庚）粮站布置、医院设置、伤员转运、电话架设，另行通知。

（辛）本部第一步进至费县，战斗发起时进至马头以北二十里之庄坞附近指挥。

（壬）注意事项：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在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此令

代司令代政委粟裕

副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陈士榘

副参谋长张震

注释：

①刘匪指刘峙集团。②新指新浦。③海指海州。④两淮指淮阴、淮安。⑤黄指黄百韬。⑥邱指邱清泉。⑦陈军长指陈毅。⑧邓政委指邓小平。⑨高、宝指高邮、宝应。⑩李指李弥。⑪陶郭指陶勇、郭林祥。⑫王、张指王秉璋、张霖之。⑬韦吉指韦国清、吉洛。⑭宋司令、刘政委指宋时伦、刘培善。⑮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⑯商矚指商丘、砀山。⑰孙司令、丁政委指孙继先、丁秋生。

鏖战齐鲁 (五)

吴瑞林

七、开辟桑园根据地

桑园，是莒县东北的一个大集镇，东临日照，东北角与诸城邻近，与莒县县城间隔着店子集，背后有一座大山，属于山区。高树勋部没有进驻过。开辟桑园根据地，是同高树勋合作的成果。

我们向鲁东南的胜利挺进，与高树勋的支持分不开，省委很重视同高部发展合作抗战的良好关系。在我们向鲁东南挺进的时候，省委已获悉蒋介石要将高部调往河北。为了发展与高部的合作，省委随后以二支队的名义给高树勋写了一封公函，由我们送给高树勋。不几天，钟辉、焦子佩同志转告我们说，高司令要见我支队司令员。临时特委和支队领导研究认为我们应当去，并共同推举由我代表前往拜访。经请示，获得省委批准。省委指示我们要当面向高树勋报告支队的情况，以示尊重。临行前，我们同钟辉、焦子佩同志通了气。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准备在报告二支队情况的同时，还应该讲明三件事：（1）冯玉祥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作为西北军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西北军中培养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将领，高将军就是其中之一；（2）杨虎城将军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爱国将领，他与张学良将军合作，领导、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轰动全国和全世界的大事变，为逼蒋抗日、促进国共合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还致力于将西北军培养成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战斗部队；（3）高树勋将军一贯反对打反共的内战而坚持抗日斗争，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又率部奋起参加抗战，这是要载入史册的，也是西北军的光荣。有了这些思想准备，我便前往高部驻地，先拜访钟辉、焦子佩同志，请他们给我介绍情况。这是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说，高树勋很盼望同我们晤谈，很高兴我去拜访他，并以开玩笑的口气对钟、焦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政治委员说话算数吧！”按照高树勋的安排，第二天上午他要在政训处见我，并设宴款待，因此我有时间在政训处逗留。钟辉同志的办公室里，挂有一幅山东省的军用地图，我还从未见过，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鲁东南的全盘地理形势。我就站起来仔细观看，钟、焦两位同志也走过来站在地图前，我们就很自然地边看边研究起来了。从全局看，桑园

这个地方有险可守，如果我们派部前来将其开辟为根据地，我占山区，高部占平原，不但不会与高部闹矛盾，反而还能互为依托，对我对高部均有利，我们还可以放手在莒（县）、日（照）、诸（城）边开展工作，同莒（县）、日（照）、（临）沭、临（沂）边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既可向北发展，又可向南发展，这对创建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和鲁东南抗日游击战争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估计和看法，我们三个人不谋而合，大家都会心地笑了。钟辉同志把我这天在政训处过夜和第二天宴请的事安排妥当以后，对我和焦子佩同志说：“走，到饭店吃饺子去，我请客。”

第二天，高树勋派他的一名副官前来通知政训处，说“高司令上午十点半到达。”听到此信，我在钟、焦两位同志的陪同下赶到一里路外去迎接。见了面，彼此虽然都表现出以礼相待，但都无拘无束。他看我大约比他小十几岁，就笑着说：“杨政委’（那时我仍用化名杨昆，故称我姓杨），你现在任一个支队的政委，率部名扬鲁南，却很年轻，我痴长你一二十岁，就叫你小弟吧！七年前，我曾到江西参加反共内战，后一气之下离开了第二十六路军十七师，跑到天津去了，没有同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赵博生和二十五师的董振堂一起参加宁都暴动，真是没有眼光，没有远见，现在后悔莫及。如果那时要是参加了，我也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大官’啦。哈哈！”他是那么豪爽、开朗，毫不掩饰、做作。我也坦诚相答：“高司令当年大义凛然拒绝反共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哩！现在，你高举抗日旗帜，坚持国共团结一致，合作抗战，不是很有远见吗！”我们边走边谈，到政训处入席后，钟、焦两位同志作陪，又边饮边谈。高树勋喝了几杯酒，谈锋更健。我就乘兴对冯玉祥、杨虎城和他本人倾向民主进步、促进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的光荣历史表示了敬佩之情，同时也表明了我坚持敌后抗战的决心和与高部团结合作的诚意。他明确指责骑兵十三旅胆小怕打，从鲁南西逃了；斥骂张里元派个什么许黑子（即许树声）到莒县当县长，又派个什么穆胖子（即穆其玉）到日照当县长，其实都是来和他作对的；称赞二支队在鲁南干得很出色，我便插话说：“我们二支队现在就插在他们两者之间，受到他们两面夹击的威胁。”钟、焦两位也插了几句话，说明二支队与他们人数相当，但装备不如他们好。高树勋说：“小弟，你不要怕，我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如果他们敢动一动你们，我就去消灭他！”这次面晤比预想的要好得多。事后据钟、焦两位同



高树勋在与驻地老百姓谈话

志说，高树勋对这次晤谈很满意，认为我的态度再次证明共产党真正了解他，赞扬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培养出了一批精干的指挥员，并说今后在鲁东南战场上有二支队和他同心协力，并肩战斗，争取胜利不成问题。从此，我们和高部更加亲密合作，鲁东南出现了两支部队团结抗战的新局面，也为我们开辟桑园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我返回部队后，临时特委和支队即时向省委作了书面报告，省委肯定了我们的作法，指示我们要继续发展与高部的友好合作关系，当高部奉命北调时就准备接替他们的防务。遵照这一指示，我们便抓紧置办冬装，购置枪枝弹药，准备北上。

从首次拜访高树勋的晤谈情况看，似乎当时高树勋尚不知道将要被调往河北。但过了不久，大约就在九、十月间，高部北调的行动就公开了。他以河北系平原，更用得着骑兵为由，向莒县、日照两县县长提出要买一批马带走，但许黑子、穆胖子都拒绝给他。为此，高树勋便派人向我们联系通气，说他掌握了莒、日两县长通敌证据，许、穆两人有叛变投敌可能，他准备除掉他们，当他采取行动时请我们按兵静观，并说要送一些枪支给我军，带不走的人员亦留给我们。我和邵德孚同志又专程到沂水去向郭洪涛同志当面报告这一情况。郭洪涛同志指示我们：“高树勋处理国民党莒、日两县政府的事，是他们的内部问题，我们不加干涉。他送枪留人我们可以收下，但表现不好的人，我们可以不要或酌情予以处置。”后来情况起了一点变化。许、穆可能听到对他们不利的风声，一个暗送5万大洋，一个暗送10万大洋，高部遂不了了之。后来事实证明，高树勋的判断是正确的，穆胖子投靠了专事反共的国民党山东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许黑子投靠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高树勋率部北上，派了一位副官长来向我们告别，并将莒、日、诸边的防区全部交给我们。省委又以二支队的名义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欢送信，盼他北上后继续和八路军团结抗战。我们做了一面大红旗，上书“抗日先锋高树勋将军”，派专人前往莒北，连信带旗一齐送给他。他看了十分高兴。他率部离开莒北以后，我们一面留下郭有邻等同志坚持莒、日、沐、临边的工作，一面率主力北进，接防莒、日、诸边大部分地区，并以桑园镇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我们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广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国共合作、军民团结共同抗战才能争取胜利的道理，号召各界各阶层人民组织起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实行人民持久抗战。在此基础上，我们又召开各界代表、士绅名流和乡镇村长座谈会。发出120张请帖，结果到了150人。在会上，我们同他们共商抗战大计，请他们支持部队，解决冬装问题。大家都主动发言，自愿承担起了解决冬装的任务。当天晚上，我们夜间巡逻的部队抓住一个潜入我防区侦察、放毒的汉奸特务，从他身上又搜出了10余包毒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第二天恰逢赶大集。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在桑园镇上召开群众大会，把特务押上，当场试验，让狗吃毒药。狗一会便被毒死，群众看了又惊又恨。我们将这个汉奸特务交群众公审，宣布其罪状，号召群众组织武装起来实行自卫，站岗放哨，防奸、防特、防毒、防破坏。最后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这个汉奸特务就地正法。其他一些地区也发现有类似的破坏活动。于是就抓住这件事，在我防区广泛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抗战热情。各区乡镇村的群众抗日自卫队和工、农、青、妇各类群众抗日救国会纷纷建立起来，出现了拥军爱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以桑园为中心的莒、日、诸边抗日根据地正在形成。

选自吴瑞林《鏖战齐鲁》

统一战线在鲁南

李维民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党组织积极发动各界抗日群众，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在鲁南地区，组成了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1939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率六八六团抵达抱犊崮山区后，打开了鲁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创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定地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是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国民党军队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七七事变”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各地中共组织利用各种合法的形式，发动群众，组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7年10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到徐州会见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经协商，李宗仁表示同意各党派共同抗日，并欢迎郭子化代表我方在徐州设立办事处。郭子化还与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徐州专员李明扬和山东第三区（临沂）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建立了较好的统战关系，为我党在鲁南地区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3月，郭子化和张光中从李明扬处争取到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队伍。5月下旬，特委在枣庄墓山附近的老古泉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沛县、滕县、峄县三县抗日武装合编为人民抗日义勇队，后称第一总队，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委，下设三个大队，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这是由共产党在鲁南地区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果。部队组建后，积极出动，伏击日军，在三峰山伏击战中，击毁敌军车8辆，毙伤日军七八十人。我军给李明扬写了战斗报



张光中在鲁南

告，还送去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和一面日本旗，李明扬回信鼓励，并给了1000块银元。

1938年6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原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率领省委机关大部和四支队二团、三团及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南下滕县，支援曾受顽固派申宪武部围攻的第一总队，同时探索开辟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途径。经过7昼夜连续20余次战斗，先后攻克申宪武部之冯卯、高庄等村，击毙顽军200余人、伤150余人。在这次反顽斗争中，由于没能很好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打击面过宽，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抄了申宪武的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因而引起地方实力派恐慌，原来与我有统战关系的当地士绅，都怕被我军消灭，转而支持和援助申宪武，威胁我军侧背，并与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游击第三支队梁继陆勾结，乘机向我军进逼。许多群众也不敢接近我们，我军兵员、给养难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等部回师鲁中，第一总队向抱犊崮东部转移。这时，张里元尚与我部保持统战关系，并给予协助。1938年9月，经省委批准，为解决部队供给的困难，在不改变部队建制、不干涉部队人事安排、保持部队独立活动的前提下，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改用张里元第三区保安司令部直辖四团的番号，1939年4月又改称张里元部第二旅第十九团，仍由张光中任团长，李乐平任政委，实际上属于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在中共地方组织领导下，进行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39年9月，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进入鲁南地区后，第一总队正式整编为苏鲁支队，归一一五师指挥。

在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之前，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就率五十一军、五十七军进入山东，其五十七军一一二师驻在鲁南。早在1939年4月26日，罗荣桓在泰西时，就在师直属队的干部会议上指出：“于学忠到鲁南，统一战线的形势可能会好些。我们应很好地巩固与东北军及同盟者的团结。”1940年1月6日，罗荣桓在大炉作关于创建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时，明确提出与东北军协同作战的方针，并与东北军建立了电台联络。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到达山东后，积极开展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徐向前、黎玉曾亲去于学忠部进行联络。当时，一一二师的师部就驻在离一一五师驻地大炉只有12里路的石河官庄。师长霍守义对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好，在这个师里还有秘密的中共工委。这个师的六六七团团长方毅是中共秘密党员。罗荣桓受中共山东分局委托，指导这个工委的工作。工

委负责人谷牧、李欣，曾到一一五师向罗荣桓汇报一二师的情况。罗荣桓也派参谋处长王秉璋、联络科长靳怀刚，公开到一二师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靳怀刚的父亲靳云鹗，曾经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当过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霍守义是张作霖的老部下，早就认识靳怀刚，称他为“老弟”。为了便于做联络工作，罗荣桓还任命靳怀刚为一一五师后方政治部主任。

在与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罗荣桓坚持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他指出：搞统战不是拍人家的马屁，而失掉自己的立场，对于反共顽固势力的挑衅，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东北军出身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与于学忠、霍守义不同，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坚决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经常挑衅，制造摩擦。1939年12月28日，沈鸿烈任命的费县县长李长胜，在应邀去费县官里庄参加临郯费峰四县边联农民自卫团开会时，命令自卫团架起枪支，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当场打死自卫团干部和团员6人，打伤20余人，制造了震惊鲁南的“官里庄惨案”。

李长胜的后台不仅是沈鸿烈，他还是反动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激流的外甥。李长胜的县政府在霍守义管辖的地盘内，鲁南地委和四县边联领导人向罗荣桓汇报官里庄惨案的情况时，罗荣桓指示说：“你们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到霍守义的驻地游行示威，要求霍守义严惩杀人凶手。”霍守义也觉得这件事李长胜做得不对，他不想得罪他的上司缪激流，但也不敢支持李长胜。霍守义派人接见了示威群众，表示要调查此事，并要向死难者发放抚恤、丧葬费。群众的示威和请愿，使李长胜破坏团结、破坏抗日的罪行有目共睹，成为众矢之的，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地委根据罗荣桓的指示，成立了前敌委员会，调动24个农民自卫团，兵分5路，把李长胜的县政府盘踞的崮口包围起来。罗荣桓一方面鼓励自卫团坚定信心，持久围困，不要硬打硬拼；一方面派靳怀刚继续去霍守义那里做疏通工作。霍守义一直按兵不动，李长胜支持不住，在一个夜晚狼狈逃跑。我军收复了崮口，建立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

积极团结和争取鲁南地方实力派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鲁南各地出现的各种名目的“司令”多如牛毛，但真心抗日、与共产党友好的则屈指可数。抱犊崮山下大炉一带的开明士绅万春圃，人称“万三爷”。他为人豪爽，讲究义气。“九一八”事变后，他的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和杨清如等先后加入共产党，万春圃也同共产党有了联系。1937年9月，万春圃经与张里元交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抱犊崮以恢复联庄会名义，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1939年张光中率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转移到抱犊崮山区后，万春圃的这支部队编为第一总队的第二大队。同年9月，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到达大炉后，万春圃设全羊席盛情接待陈、罗，并诚邀陈、罗住在他家中。万春圃常常到罗荣桓的房间，听罗荣桓讲国内形势和八路军的历史和传统。万春圃看到罗荣桓和战士一样，穿的是几乎褪成白色的军装，盖的是打了补丁的被子，吃的是高粱煎饼就咸菜，觉得过意不去，便吩咐他夫人炒了一盘辣子鸡丁，让勤务员王立志给罗政委送去。罗荣桓开始认为是炊事班改善生活，动了两筷子，又觉得不对劲，向小王问明了原委，立即叫夫人林月琴拿出钱来叫小王送去。这件对八路军来说是十分平常的事，却使万春圃一家十分感动。万春圃说：“俺活了50多岁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啊！”



左起：陈士榘、陈光、
彭畏三、罗荣桓

万春圃从同罗荣桓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接触中，和共产党的感情更加亲近了。国民党顽固派曾扣押他的小儿子和女儿作人质，要拉他到国民党那边去。他说：“我儿子、闺女宁可不要了，也要跟着共产党走！”他把自己经营了多年、有几百条枪，并有机枪和迫击炮装备的部队，完全交给八路军指挥。1940年3月22日，万春圃的四县边联武装和苍山游击大队正式合编为八路军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后来万春圃还担任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

八路军积极团结和争取的，还有孔昭同的部队。孔昭同是滕县人，曾在北洋军当中将师长。北伐战争后，他解甲回乡，开药店、办学堂，济世育人。1938年初，日军占领济南后继续南下，滕县告急，滕县城里有些土豪劣绅怂恿他出面组织维持会，他说：“我上街卖拳要饭去，也不能当汉奸！”

孔昭同曾与在阎锡山部队当过军长的杨士元组织过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杨任司令，孔任副司令。1938年3月，在日军进攻滕县时，孔昭同的两个儿子孔宪尧、孔宪纲遭日军飞机轰炸遇难，抗日自卫军不久也被日军击溃。失败反而更坚定了孔昭同的抗日决心。他变卖家产，充作重组军队的经费，同时身披写着“上尽国忠，下报家仇”的黄缎带，在鲁南山区奔走呼号，又把抗日的队伍组织起来。1938年夏天，国民党第十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驻在鲁南，兼任鲁南行政长官，当时共产党还派了干部在石部做统战工作，孔昭同是石友三的结拜兄弟，便接受了石部整编第六师的番号，活动于抱犊崮西北的滕县、邹县、泗水、费县之间。年底，石友三接受蒋介石的指令，排除共产党，将部队调往河北。孔昭同毅然与石友三分道扬镳，拒绝北上，坚持在家乡抗战。

1939年一一五师进驻鲁南后，孔昭同立即委派他的亲戚、山东教育界知名人士彭畏三前去联络。罗荣桓在大炉按当地习惯摆了十大碗，热情款待彭畏三，向他阐明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彭畏三转达孔昭同对共产党坚持抗日的钦佩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感。罗荣桓请彭畏三转告孔昭同，孔师与八路军合作抗日，可保持原来的番号，继续在原地区活动，双方加强联系，增进了解。彭畏三提出，孔昭同希望八路军派一位政工干部去孔师做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选派特务营教导员黄玉昆随彭畏三去孔师工作。黄玉昆到孔师后，宣传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优良传统，帮助孔昭同整顿部队，克服旧军队的恶习，改善官兵和军民关系，为改造这支部队创造条件。

经过一段工作后，孔昭同毅然决定，与国民党割断联系，郑重要求接受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经八路军总部（简称集总）批准，孔昭同被正式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曲（阜）泗（水）邹（县）滕（县）费（县）五县游击司令。彭畏三被一一五师聘为高级参议。孔昭同亲率部队，到一一五师驻地接受整编。一一五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宴请孔昭同和他的部属。陈光、罗荣桓检阅了孔昭同部队，还给他们补充了弹药和服装。1940年11月，孔昭同因病逝世。陈光、罗荣桓、萧华联名送了挽联，颂扬孔昭同热爱真理，为民族为国家英勇奋斗的高尚情操。

热情欢迎和重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最早是以郭子化为书记的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组建人民抗日义勇队期间，边区特委就团结争取了一批爱国抗日的知识分子。当时，有小鲁南和大鲁南之说。小鲁南是指以抱犊崮为中心的曲、泗、邹、滕、临、郯、费、峄这一片山区；大鲁南是泛指胶济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东地区。1940年6月，在费县南部七里河南山的白子峪召开的鲁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小鲁南地区。这次大会选举彭畏三为鲁南参议会参议长。抗战期间先后组成的统战组织鲁南抗敌工作团、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则是既包括小鲁南，又涉及大鲁南的组织。

鲁南抗敌工作团和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是中共山东省委和当时在石友三部工作的中共山东联络局书记张友渔，团结广大爱国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统战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民主人士，是曾为清末秀才又曾留学日本的教育家范明枢。他从1920年起担任曲阜省立二师校长七八年，在山东影响很广，桃李满天下。1932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曾以“进行赤化宣传”“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他逮捕，后被冯玉祥将军营救出狱，并拜他为师，还请他为泰山周围的穷苦子弟创办了15处武训小学。“七七事变”后，范明枢先在泰安组织泰安抗敌后援会，接着组建泰安人民抗敌自卫军，这支武装后来参加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他以72岁高龄，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四处奔波，做宣传鼓动、组织群众等工作。他用巨幅白布，请人绘制抗日宣传图画，固定在独轮车上，载着简单的行李，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介绍组织行动起来的方式方法，获得广泛积极的反响。

积极参加抗战的另一位著名民主人士，是早年于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三一八”运动的李澄之。他曾被国民党开除，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他到武汉找党联系，转到山东敌后工作。1938年初，他以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导员的公开身份回到山东，与中共山东省委和张友渔建立了联系。利用国民党的经费，在蒙阴县坡里镇创办了山东省立第四联合中学，主要招收从敌占城市中流亡的青年学生，实行战时体制，教育培养抗日人才。学校的教职员工，都是积极抗战的知识分子。教务主任彭畏三，是李澄之在北师大的同学，他在省立七中当校长时，曾支持和掩护共产党员刘顺元在校内从事革命活动。总务主任先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耿光波，后是曾就读于山东大学的杨云阶。四联中聘请的教员，以范明枢为首，大都是鲁南抗敌工作团、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成员，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教书。山东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仝养斋、陶钝、田佩之、张立吾、冯基平、路雨亭等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个学校任教，使四联中成为坚持抗战的堡垒。

积极反共的沈鸿烈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转移到沂水县东里店后，了解到四联中的真相，大动肝火，以停发经费相威胁，勒令停办这所生气勃勃的战时中学，

还勒令撤销鲁南抗敌工作团和鲁南群众总动员委员会，另成立组织拉拢李澄之等参加。李澄之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汇报了这一情况，在山东分局支持下，毅然决定与沈鸿烈决裂，于1939年7月，在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大诸葛镇附近的刘家河北村，成立了鲁南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除四联中同志外，还邀请了既是著名律师又是著名中医、早年参加过反军阀斗争、“七七事变”后从北平回乡担任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和沂水县行政委员会主任的刘民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北京大学任教、“七七事变”后担任莱芜县长的梁竹航；早年就读于青岛大学，毕业于江苏省立无锡教育学院，长期致力于农村民众教育，“七七事变”后从上海回来参加抗日工作的杨希文；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与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张伯秋；曾留学法国与周恩来等相识的孙鸣岗；曾经熊十力推荐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工作、1939年一一五师攻克郯城码头后出任郯城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的高赞非等。他们原先就参与或领导鲁南抗敌自卫团和鲁南群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工作，也是抗协的领导人。四联中的全体学生，都参加了抗协。在各个地区，还成立了抗协的分会部。不久，抗协组织发展的一些地方武装，组成抗敌自卫军，由梁竹航任司令员，李澄之任政委（对外称政治部主任）。

抗协和抗敌自卫军，都是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统一领导之下。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1939年6月底抵达山东的徐向前、朱瑞率领的八路军第一纵队，都给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积极的支持。朱瑞接任山东分局书记后，经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到抗协去，和大家谈形势，谈工作，谈学习，也谈生活，发现抗协有什么困难，及时帮助解决。一一五师陈光、罗荣桓、萧华也多次热情接见抗协的负责同志。1940年11月，抗协负责人彭畏三和高赞非，向罗荣桓等汇报了抗协和抗敌自卫军的工作情况后，陈光、罗荣桓、萧华于11月19日致电各部队，并报集总和党中央。电报说：“关于山东抗敌协会组织我予以极力赞助发展，务使领导权完全落在进步分子与我同情者手里，并加强党在内部的核心作用。这一组织主要是以小资产阶级为骨干，团结大多数中间阶层，坚持抗日独立战争。尤当目前严重投降危险与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形势之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抗敌自卫军，电报说：“‘抗协’要组织自卫武装，须帮助掌握武装，注意供给干部……对于同盟者武装，通过‘抗协’组织形式，加强争取工作，不强调为八路军。”

抗敌自卫军的领导班子，是由“抗协”成员和部分共产党员共同组成的，政治工作以共产党员为核心负责进行，军事行动由八路军统一指挥。抗敌自卫军曾配合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部队，参加收复青驼寺、葛沟、海头和攻占赣榆城等战斗。

1940年七八月间，山东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具有立法权力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共产党领导的省政府，简称战工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为山东省政府）。“抗协”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参议会和战工会的工作。范明枢当选为参议长，刘民生是副议长；李澄之、梁竹航、杨希文、耿光波、张伯秋、田佩之、孙鸣岗、张立吾等都被选为战工会委员或参议会驻会议员。李澄之后任战工会副主任委员，其他同志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育、财经、司法等方面的负责人，他们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文化经济建设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经过战争年代的长期考验，范明枢、李澄之、杨希文、彭畏三、梁竹航、孙鸣岗、田佩之、耿光波、张立吾、高赞非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中高级干部。

万里征程江南路

——华东子弟兵团垛庄连征战纪实

李忠和 薛俊盈

1949年的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庄严号令。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乃至全中国已指日可待。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人民解放军各部先后进行统一整编。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实行渡江解放江南的作战任务。



莒县拥有的40万人民具有善良朴实，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在历次对敌斗争中做出了不朽贡献，垛庄区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朵奇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我著名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党的领导组织坚强，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和坚强堡垒。1949年1月，根据六地委和滨海军分区的指示，中共莒县县委决定在处于横山革命根据地的垛庄区组织一个自带武器与行李的远征子弟兵连，随军南下为解放江南的第三野战军担负战地保障任务。垛庄区远征子弟兵连的壮丽画卷由此展开，子弟兵连的勇士们也由此掀起了他们人生中崭新的一页。他们中有的人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江南，有的人因此而影响到以后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印痕。

1949年的春节，人们还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组织南下远征子弟兵连的指示迅即传达到了各村。上级指示，小村2人，大村4至5人，人选定在民兵、公安员、青年积极分子、村干身上。区里的干部也直接到村里做组织工作。区委副书记崔崇玉找到官路村的冯志举说：“再辛苦一趟，江南还没解放，还得去解放江南。”崔书记找冯志举有他的担忧，因冯参加淮海战役刚回来，满身的征尘尚未洗去。“老党员了，还得服从党的命令。你看咱什么时候不听从党的指挥？！”一句朴实的回答就坦诚地表露了这位老党员的心迹。而这时，他家庭十分困难，两个小女孩拖累着媳妇不能干活，他一走，地谁来种呢？还有老人。冯志举顾不了这些，服从区里的安排，担任了二排的副排长。

时间非常紧迫，很多人还在准备着过元宵节的東西，魏富红在村里是民兵，刚刚赶完集带着买来的猪肉、蔬菜、礼花等。回到家就听说村里正在组织子弟兵南下支援渡江的解放军，急忙找到村干部要求去。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村里只好把原定的人员做了调整，满足了他的心愿。时间已是正月十六的晚上，家里连一床好点的被褥都来不及准备，他也只有这天晚上才没有参加村里民兵的站岗放哨。

警卫排的副排长何相久是何家庄子人，1947年入党，一直是区里、村里的积极分子，担任着四个村的药铺副经理，在村里是村团长，为老百姓的事忙忙碌碌。去凤凰山赶集刚到家就接到了通知，而这时正是元宵佳节，在别人忙着过节、吃着元宵的时候，他却在整理着行装，准备出发了。

白土沟的王安忠，一位英勇刚强的汉子，听到区里的号召后说：“我是党员，党员就应该带头。”同村党员王玉祥，也表达了同样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感染了群众，带动了群众。白土沟村去的5人全都是自告奋勇。

人员、枪支很快组织齐了，163名南下子弟兵们舍小家、顾大家，抱着为解放江南广大父老乡亲的信念而出发了。按照区里的安排，小店以北的王家官庄、东心河、西心河、山疃、前李官庄、后李官庄、耿家庄子、何家庄子、前山头渊、后山头渊、东匣石、西匣石、万子、白土沟等村的南下人员，正月十六在区委驻地小店集合起来。区里开了个简单的欢送会，区负责人做了动员，会后吃了饭，就算是为远征子弟兵连送行。

1949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七，各村的南下子弟兵带着武器和简单的行李向莒南县进发。在莒南县的大店镇，垛庄的南下子弟兵们集合齐了。莒南县县委的张秀坤、垛庄区武装部副部长李珂、莒南县武装部副科长曹建珠早就安排好了食宿，在一所地主家的大房子里等着迎接，并随同一起南下。垛庄区委派来的负责人庄子玉、董凤德带队，在这里进行了班排组编。全连分为4个排（其中，警卫排36人属团警卫连）。连长庄子玉，指导员董凤德，副连长卢从理；一排排长薛彦升，副排长赵凤兰；二排排长燕厚公，副排长冯志举；三排排长严升玉，副排长严永忠；警卫排排长王秀金，副排长何相久。连设连部，副连长卢从理兼文书，司务长王松年，医生于成

忠，通讯员陈记、潘维祥，另有炊事班。连队成立了党支部，董凤德任党支部书记，庄子玉、卢从理为党支部成员。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党员完成任务，发展新党员，充实党的队伍。小店村的王培在团部当医生，就是在南下时发展的新党员。

经过组编以后，按照原定计划，向徐州方向前进。途中在滨海军分区驻地欢墩埠，与阎庄、苗蒋、寨里的子弟兵们会合。滨海地委组织的1500多名南下子弟兵在欢墩埠镇举行了大会。滨海军分区武装部长王晓在全团大会上宣布任命：南下子弟兵团团长孙桂芳、政委杨凤山。垛庄连所在的营为一营，营长李珂，教导员张秀坤，副营长曹建珠。

由欢墩埠镇步行至新安镇坐上闷罐火车到达徐州，又从徐州步行至丰县的赵庄，进行了整训。根据华东支前委员会的命令，团里的干部进行了调整，张传仁任团长，乔学诗任政委，杨凤山任副政委，孙桂芳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因战时保密，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均用数字代号。华东共组织了18个南下子弟兵团，垛庄连为第十六团一营二连，归属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整训期间，整顿思想，打消思想顾虑，各连队普遍召开了诉苦大会，控诉自己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受土豪劣绅欺压的悲惨经历，激励大家为江南的解放贡献力量。学习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3月1日，第一次穿上了黄粗布的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华东子弟兵团”的新胸章，人人显得格外精神。

3月中旬左右，垛庄连的子弟兵们经睢宁县境、洪泽湖畔、高邮，穿过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泰州白马庙，到达指定地点——泰兴以东的黄桥与季市间，在这个地方做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按照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的指示，主要抓好三件事：第一件，开展政治练兵。针对有些同志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军消灭得差不多了，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的思想，主要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连里还给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使大家认清，必须穷追猛打，决不能半途而废。第二件事，开展军事训练。支前子弟兵们生活在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没有见过这样宽达数里甚至十余里的大江，怕“长江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军事训练中，子弟兵们练习挖战壕，从选址、尺寸、形状都严格要求。每人每天必须挖数个深达人跳进去稍一蹲即看不到人、站起来操枪就能射击的掩蔽洞。还要练习每小时15公里的越野急行军，每天都要跑得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学习训练乘船，练习不晕船的方法和乘船注意事项等。在训练中，要求大家从实践中体验，熟悉渡江作战的一整套战术方法。第三件事，就是筹集船只。船几乎被国民党军队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有一定的困难，就动员大家制做竹筏，并操练如何乘坐竹筏和船只代用品。上级给子弟兵团下达了今后的任务，一是打好渡江战役，看押俘虏；二是警卫后勤机关，搞好后勤保障；三是维护社会治安。警卫排的同志则跟随团首长执行任务。王青振跟随团长张传仁，何相久跟随副团长兼参谋长孙桂芳，王德明跟随副政委杨凤山。

4月18日，季市下了一场小雨，垛庄连的子弟兵们踏着泥泞的小路，20日抵达长江边。上级要求不准向外走，不准解开背包，不准生火做饭，只能靠在一起，吃点备好的熟食，静候渡江命令。警卫排王安忠与穆严田奉命到三营下达命令，二人不顾天黑路滑，疲倦乏力，顺着弯弯曲曲的田埂走了十几里的小路，准时将命令送到，受到首长的表彰，王安忠荣立三等功，穆严田荣立四等功。

4月21日，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飞向长江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江水都映成了血红色，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军万船竞渡。

4月22日黄昏，天空朵朵黑云渐渐向西移动，西边一片彩霞色彩斑斓，层层叠叠，耀眼夺目。垛庄连的子弟兵们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每人携带武器、背包和10斤半大米，悄悄埋伏在江边，半夜时分，从房口强行横渡。他们面对迎面飞来的子弹，冒死前进。熟练的船工弯着腰，死死扳着舵，连排长不停地鼓励着：“不要停，使劲划，身子不要动，坚持就是胜利，登上岸就是胜利。”子弟兵们毫不畏惧，帮助船工使劲划船，谁也不吭声。这天晚上，由于船只少，需要运送的弹药物资多，在押送船只的过程中，他们有的人来回四次。头两次运送后勤人员过江，后两次运送军需物资。下船以后，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没有码头，江水淹没到胸口，冰凉冰凉的，脚底淤泥又粘又滑，一个浪涛涌来，打得他们左右摇晃。他们高举着武器，奋勇向江岸冲去。

过江到达江阴以后天已经亮了，国民党部队已经溃逃。垛庄连从江阴一路越过无锡沿京沪铁路向苏州进发时，在繁昌至江阴的弓形地区内，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郎广围歼战役正白热化。到达已经解放的苏州，垛庄连驻扎在东渚镇、木渎镇、广福镇、金山寺等地。

第三野战军主力集中在苏州、常州一带，第十兵团的战区西起昆山、太仓、浏河，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大场、真如、江湾一线。5月22日，三野指挥部向各军下达总攻命令。23日，各军同时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市区。从战役一开始，警卫排的子弟兵就冒死跟随首长参加战斗，在钢筋水泥地堡群中冲锋陷阵。警卫排副排长何相久、战士张庆明等人，同团首长几次到市里联系，接收俘虏后，押送到苏州，交给驻扎在苏州的子弟兵们看管，垛庄连接收看管了3000多俘虏。子弟兵们轮流站岗放哨，严加看管，并反复交待我军的俘虏政策：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立即掉转枪口，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也可以。看押的俘虏多，一间不大的房子，经常关押几十名俘虏。天气热，拥挤不堪，俘虏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子弟兵为贯彻俘虏政策，对他们进行劝导。张庆明从上海接收俘虏向苏州押送，由于情况紧，一时供应不上，缺少吃的，他就四处找食物送给俘虏，还给俘虏联系车辆，将行李物品送到苏州。在他们的感召下，很多俘虏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掉转枪口，向蒋家王朝射出仇恨的子弹。

上海解放以后，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人民币。垛庄连的子弟兵们负责收缴俘虏携带的金银财宝，交给国家，并给俘虏更换人民币。俘虏交金银财宝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边站岗，但他们毫不为这些金银珠宝所眼红。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官兵交的银元有一大布袋，还有金手饰、金条等，这些东西摆在他们脚下，最后清点，一点都不少。有一次，魏富红在站岗时，发现一个俘虏向鞋里偷偷藏掖什么东西，他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从这个俘虏的鞋里搜出了金条。有些俘虏将银元拴在腰里不交，他们就主动协助搜查。只要他们稍稍动心，就能发一笔财，可他们毫不为之所动。而当时，他们发的津贴只有2元钱，还不够几条香烟钱。

中央原定的渡江战役时间是两个月，而人民解放军一夜强渡长江，三天后解放了南京。1949年初中共华东局为解放上海，准备了大批干部组成接管大队。垛庄连的子弟兵们在强渡长江时，莒县首批南下干部也正沿着津浦路南下。在嘉兴，副连长卢从理就碰到了垛庄分区党委副书记宋光明。

上海战役结束后，第三野战军只有十兵团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军南下解放福建。华东地区组织的18个子弟兵团只留下1个团随军继续南下，其余17个团全部回原籍。根据年龄构成、文化程度、党员比例等情况，决定第十六团留下，升级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直属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官兵。

垛庄连在苏州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很多人给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买了一些物品，准备回家团聚。接到升级为正规部队的命令后，连、排长们分头做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团里派人把各人买东西收集起来，邮寄回家。在苏州，他们更换了新军装，“华东子弟兵团”的胸章更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步入正规军人的行列，很快完成了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同其他部队一起，向福建进军。

6月下旬，他们接受了保卫野战二十三医院的命令后，从嘉兴坐火车直抵江西省上饶，下火车便开始步行。正是炎热的夏天，每人背上枪枝弹药、背包和干粮，起码也有50多斤。在苏州装备的一门60迫击炮、掷弹筒，一挺歪把机枪，两挺轻机枪，也在他们之间轮流地背着，他们同二十三医院的医生、护士一起，很快就进入了横亘在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脉。山多，又高又陡，分水关、黄岗山，像一头头野兽，虎视眈眈，考验着这些人。路，都是叠起来的，成“之”字形向上盘旋着。他们脚不停步地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行军，从西向东爬一个拐弯，看到北极星在前方，从东向西再爬一个拐弯，看到北极星还在前方，直把人爬得晕头转向。白天，抬头向上看，浓阴蔽日，看不见天，低头向下望，深沟断壑，望不见底。他们累得直喘粗气，挥汗如雨，汗水将衣服浸透了，又烤干了，眼睛被汗水浸得看不清路。有的战士全身溃烂，下身没皮，脱水脱得几次昏倒，尿出的尿都成了红的。

为了避开烈日，他们都是半夜起床行军，到天最热的时候停下来。山高林深，没有村庄，也没有人烟，只有他们这些南下的战士们穿行在山里。运输物资，开始还用马匹驮运，山越走越多，越来越陡，马匹爬山时跌死了，他们割下点马肉带着继续前进。物资只能人扛肩挑，50斤一包的药箱、医疗器械，他们硬是把它们背出了大山。张庆明在爬山时，帮助炊事班挑着炊具，炊事班一位姓张的战士一不小心把行军锅掉下山沟摔成了好几块，可行军还得做饭，张庆明只好爬到山下，挑了一块大一点的碎片带着。油、盐也都撒了，只能吃些没油没盐的菜。一次行军后，累得实在走不动了，连气都好像没有力气喘了，浑身连一点汗都没有。张庆明到离公路不远的一户人家，烧了一大锅大米茶等着同志们来解渴，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只得回去找部队，一看都累得躺在地上。喊起来，大家挣扎着喝了点大米茶，才又继续赶路。



“爬上高山就是胜利！”

“咬紧牙关，越过万重山，一定要解放全福建！”

这些鼓动人心的口号，写在路边的石头上，它代表了全体指战员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些口号的鼓舞下，他们一路前进，攀登着一座又一座山峰。从嘉兴出发时每人发了6双鞋也不够穿的了，后边的同志只好拣前边的同志穿破后扔掉的鞋穿，还有的同志连破的鞋子也没有得拣，只好赤着脚行军。满脚的血泡，也没能挡住他们向福建前进。

在山里行军的时候，雨特别多，洪水甚至能把汽车、马匹冲走，战士们经常冒雨行军，浑身淋得透湿。这里号称四多：老鼠多、蜈蚣多、蛇多、蚊子多。用战士们的话说：“老鼠比咱家的小猫大，蚊子大的像苍蝇。”蜈蚣多的翻身都能压死几个，数不清的蛇蜷曲在草丛中，横在小路上，比比皆是。没有蚊帐，他们只好把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把床单两头用绳子扎起来，当中用树枝或竹篾圈成个弓形撑起来，人躺在里边睡觉。可蚊子太厉害了，白天穿着衣服，也照样被叮得满身疙瘩，70%以上的战士都得了恶性疟疾，发作时寒颤高热，把人折磨得十分难受。刚开始病号少的时候用担架抬着，病号越来越多抬不过来了，就用两根竹竿夹在病号的胳膊下，前边一人拖着，后边一人推着，艰难前进。实在不行，就用背带绑住病号，一人或二人连拉带拽。有一个战士得了疟疾，三天不吃饭也不喝水，爬都爬不起来，张庆明就买了一块钱的油炸糕，泡成水往他的嘴里滴上几滴，给他捋捋胳膊伸伸腿，把他救活了。

治疟疾的药不够用，就只好硬撑着，许多战士因此而牺牲。邵家垛庄的李成玉是炊事班长，因行军过于劳累，又得了疟疾，几天几夜牙关紧闭，连水都喂不进去，就此倒在了福建的山里。垛庄连的官兵们悲痛万分，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将其火化，把骨殖用弹药箱装好，一直背回家乡。李成玉后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在福建山里，连长庄子玉、指导员董凤德先后病倒，离队休息治病，全连的工作由副连长卢从理主持，直到二人在福州赶上部队。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连队在行军时，组成“品”字形的作战队形。前头一个排是尖刀排，后面两个排为保卫排，保护着整个二十三医院前进。殿后人员一路收留掉队的医生和护士，挽着、扶着追赶部队。宿营时，他们忙着劈柴、扫地、做饭、整理病房、病床，帮助医生、护士洗衣服、床单，还做一些年轻护士的思想工作。医院的人休息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确保医院的安全。警卫排战士王安忠因为疟疾，住进了野战二十五医院，到出院的时候，不知部队去向，只好留在医院。留院等待部队期间，他积极工作，站岗放哨，搬运物资，行军打仗，样样干在前头，受到医院领导的好评。当得知部队在安海的消息后，他便搭乘医院的车回到部队。

当时福建形势特别复杂，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遗留下了一批批成营成连的部队，他们窜入深山老林，成为散兵游勇，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形成多股土匪流寇。他们到处打家劫舍，逼迫农民送钱送物，拦截交通，抢掠财物，袭击我军队。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剿匪灭寇，成了垛庄连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到一地，都要安置临时镇公所。按照十兵团指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剿匪，局面安定下来。张庆明得了疟疾，掉队赶不上前边大部队的。太阳一落山，从山上下来4个国民党兵，离他仅有20米远。他病得手脚酥软，但他提着枪，坚持着跑到前边一个废岗楼里，将枪口对准了这4个国民党兵，双方对峙了半天。这4个国民党兵慑于张庆明的正气威严，掉头逃窜，而这时的张庆明已经连扣动扳机的力气也没有了。在山上还有成连成排的国民党官兵放冷枪，等部队追上去后，他们就自动拍着巴掌走出来。原来他们的冷枪是“叫点子”，就是叫我们的部队过去，接收他们投降，不然，这些国民党官兵在山里饿也饿死了。与这些国民党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垛庄连的全体指战

员每到一地都要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还帮助无住房的老百姓盖起了新房。等他们走的时候，这些老百姓都放起了鞭炮，拿出家里最好吃的欢送他们。

垛庄连的指战员们翻过崇山峻岭，越过了建阳、建瓯，到达了闽江上游的南坪。按照十兵团的作战部署，分为南北二路：一路向南迂回到尤溪，翻越百余公里的山路，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夺取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一路从北沿闽江、闽清到福州。垛庄连的官兵也就兵分二路，有的跟随作战部队走南路，有的保护医院、后勤，和作战部队走北路。

8月17日，福州战役打响。战斗进行得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天，十兵团就攻入了福州城。各部队以团或营为单位作战，看谁抓的敌人多。垛庄连在6天追击战中，看押6000多名俘虏，其中还有国民党的将校级军官。警卫排在安海接收了800多名俘虏，向泉州押送时遭遇敌机轰炸，这些俘虏拒不隐蔽，大部被敌机炸死，我押送人员也有伤亡。9月中旬至翌年1月，王维升等警卫排的部分同志和执行勤杂任务的人员参加了漳厦战役，其余同志在福州休整待命。

10月1日，垛庄连的全体指战员在福州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和评功授奖活动。垛庄连的全体指战员因作战勇敢，战绩突出，几乎人人都被评为功臣。已调到团警卫连任指导员的卢从理等十多人荣立二等功，其余被评为三等功和四等功。他们手捧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签发的立功证，都以自己为江南的解放贡献了力量而无比自豪。

1950年1月，他们奉命办理了复员手续回山东。从福州乘船溯闽江而上到达南坪，从南坪步行重又穿过崇山峻岭到达江西上饶，坐上了火车。途中一段乘汽车时，遭到了土匪的流弹，一颗子弹击中了供给员的腰部，幸亏他腰部捆着帐本，从打碎的帐本中，掉出了子弹头。大家都说，这位供给员的命大，这些帐本也为革命立了功劳。在行将到达牛山火车站时，殷家孟、殷富贵得了伤寒，在火车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牺牲，战友们把他俩的遗体葬在了牛山。直到1950年的寒食节，才将遗体运回，在官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认他俩为革命烈士。垛庄连在牛山火车站下车以后，住在副团长孙桂芳家，在此等候着副政委杨凤山从济南带回组织关系介绍信。临近春节时，他们经欢墩埠镇步行向家乡奔去。

到达垛庄区小店村时已是1950年2月14日，农历腊月廿八，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办年。他们刚到小店村，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家人互相打探着亲人的消息，山路上到处是向小店跑着迎接亲人的父母、兄弟、妻子。杨家崮西的人听说他村里只有毓富亮回来了，其他的人家忙向小店跑，在崎岖的山路上，鞋子跑掉了都顾不上穿，直到见到自己家的亲人安然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嚎啕大哭。在小店村，指战员们把南下时带回来的用于路上吃的大米交给了政府。

这次南下远征，历时一年，经四省（苏、浙、赣、闽）一市（上海市），行程万里，参加了渡江等多次战役，先为民工，后为军人。一年的艰苦征战，使这些南下的勇士们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在回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先后有十几人去世。

曾国华传 (四)

王连城 曾林辉

七、血染大宗家 总结教训振军威

日军驻德州的板垣师团旅团长安田大佐，已经得知在冀鲁边打日寇、惩顽军，所向无敌的五支队，原来就是当年平型关大战的主攻部队，早已咬牙切齿，发誓要寻机报仇雪耻。当其探悉五支队正在大宗家休整时，立即纠集2000多人、骑兵500人、汽车60多辆，还有战车和炮兵，分进合击，连夜向大宗家奔杀而来。这时，自平型关大战以来，一直和胜仗相伴的五支队官兵还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对于已经来到眼前的生死厮杀还浑然不知。

拂晓，驻大宗家的一营哨兵首先发现敌情。五团团团长龙书金组织部队奋力抗击。团政委曾庆洪向支队报告敌情。当曾国华听到枪声接到报告时，敌人已将3个村分别包围，电话线也被切断。他顿觉敌情严重，部队处境险恶。此时求援不可能，只能各自独立应战。曾国华一面组织支队机关和警卫、通信分队阻击敌人，一面派通信员通知五团，要沉着应战，节省弹药，坚持到天黑再突围转移。他深信龙书金、曾庆洪率领的红五团是不会弯腰的硬骨头、不会卷刃的钢刀。战场的情形正是这样。

在大宗家村，龙书金率领的三营官兵在村头上、在院落里和鬼子短兵相接，刺刀见红。特务连人手一把大刀，与鬼子逐房逐院拼杀争夺，连长李东海身先士卒，一连砍死砍伤五六个鬼子，拼杀中英勇牺牲。五团机关干部和勤杂人员在团特派员谢甲树的指挥下也投入战斗。手中没有武器的炊事员、卫生员拿起牺牲战友的枪支，操起扁担、菜刀、铁铲同鬼子格斗。大宗家村到处是厮杀声，村前村后，院落道路横尸遍地，血流汇溪。

在赵玉枝村，一营奋力突围向大宗家村靠拢，以期解救团部之危。在攻击中突然发现敌人的指挥所。营长即令二连一个排前去偷袭，乘敌不备，一举将敌旅团长安田大佐及其五六名参谋人员击毙，鬼子大惊，攻势减弱。

在侯家村，曾国华得知敌指挥官被击毙，就乘势组织支队机关向村外转移。警卫、通信分队和机关干部都上了第一线全力突围。曾国华又派通信员通知部队不要恋战，迅速转移。这时，龙书金跑来找曾国华救援：“三营被围在村里的部队没有支援突不出来。”曾国华斩钉截铁地说：“大宗家的部队一定要突出来，一个不能丢。我手里只有你们一连掩护支队机关，我一定想办法支援你们！”曾国华一边说一边拍着肩送走和他一起久战沙场的老部下。随之找

来一连指导员梁世淦，令他带一个排赶去支援。梁对龙书金说：“支队长让我转告你，他实在抽不出兵力了，只能派我们一个排来。”又说：“团长，你可别嫌少，我们这个排有经过长征的铁汉，有大战平型关的英雄，能够一当十、十当百。”梁世淦的话没说错。他们一次又一次向村里冲锋接应被围的战友。街头巷尾、墙头房顶寸步必争。子弹光了，用刺刀捅，刺刀弯了，用枪托打，终于把战友接了出来。梁世淦又带五班掩护部队转移，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直至他们全部献出年轻的生命。

激战一整天，五支队终于突破日军重围。虽然击毙敌旅团长安田大佐以下300余名鬼子，打死战马100多匹。但五支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近500人，团长龙书金负伤，团政委曾庆洪、政治处主任朱庭先，特派员谢甲树先后牺牲。

战后，五支队进行短暂的休整。曾国华在连以上干部会上对大宗家战斗进行了总结。他说，大宗家战斗是五支队在敌众我寡又遭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场恶战，是同日寇精锐板垣师团进行的殊死对抗，其战斗场面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痛击了敌人，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曾国华沉痛地总结了四条教训：

- 一是由于连续胜利而轻敌麻痹，应了“骄兵必败”的古训；
- 二是违反游击战术原则，犯了“久驻一地易遭敌袭击”的兵家大忌；
- 三是驻在新区没有布置严密的情报工作，受了“耳目闭塞”之害；
- 四是没有预先拟定应急作战方案，吃了“仓促应战”之苦。

曾国华的总结和自责，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一度沉闷的气氛又活跃起来。

1939年夏，曾国华利用敌人“扫荡”的间隙，组织部队破袭津浦路。8月间在禹城至德州段，曾使鬼子一列军车冲出路轨，部队又冲上去消灭了车上的鬼子，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食品、被装等军用物资。日寇的交通运输中断了3天。连续的破袭战斗屡战屡捷，日寇大为恼火，不得不增兵沿途护路，又背上了大包袱。

1939年9月，由于敌人对边区封锁严密，扫荡频繁，粮食极度困难。萧华司令员率挺进总队直属队、五支队和六支队一部分分批进入鲁西地区。

曾国华率五支队对侵占我在平、博平等地的国民党顽固派保安第七旅齐子修部进行坚决打击，歼其大部，齐子修被迫退出运西地区。我党在聊城以北、在平以南、张秋镇一带重建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在日寇不断诱迫下，明目张胆地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起猖狂进攻。

2月2日，曾国华奉命参加一二九师刘邓首长部署的冀南反顽战役。五支队和范筑先支队等部编为右纵队，他们担负钳制高树勋部增援、阻止石友三部溃逃南窜的任务。由于部队间紧密配合，积极作战，自觉支援，保证战役部署顺利完成。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

3月4日，五支队又参加第二次讨逆作战。在独立旅旅长杨勇指挥下，曾国华率五支队将盘踞在濮县东的莫正民旅包围，随即歼其一部，余部逃至濮县县城。曾国华率部追击，又将残敌包围在城内，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城，仅用6分钟就打进城内，被围之敌缴械投降。

3月5日以后，曾国华乘胜追歼逃敌，连克顽军所占的多处村镇。又和兄弟部队一起分三路合击，奋战10日，石友三、高树勋部全线溃退。二次讨逆作战后，鲁西军区成立。萧华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委。

1940年3月，根据鲁西军区命令，五支队在聊城地区在平小街进行整编。五支队与山东纵队六支队合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曾思玉任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五两个团。

6月，日寇第三十五师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8000余人、汽车100余辆、坦克16辆，对我鲁西根据地进行“扫荡”。顽军石友三部也趁火打劫，纠集3万余众侵占濮县城，与土顽齐子修部在鲁西北，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部在豫北林县相连接，切断了我华北、华中、山东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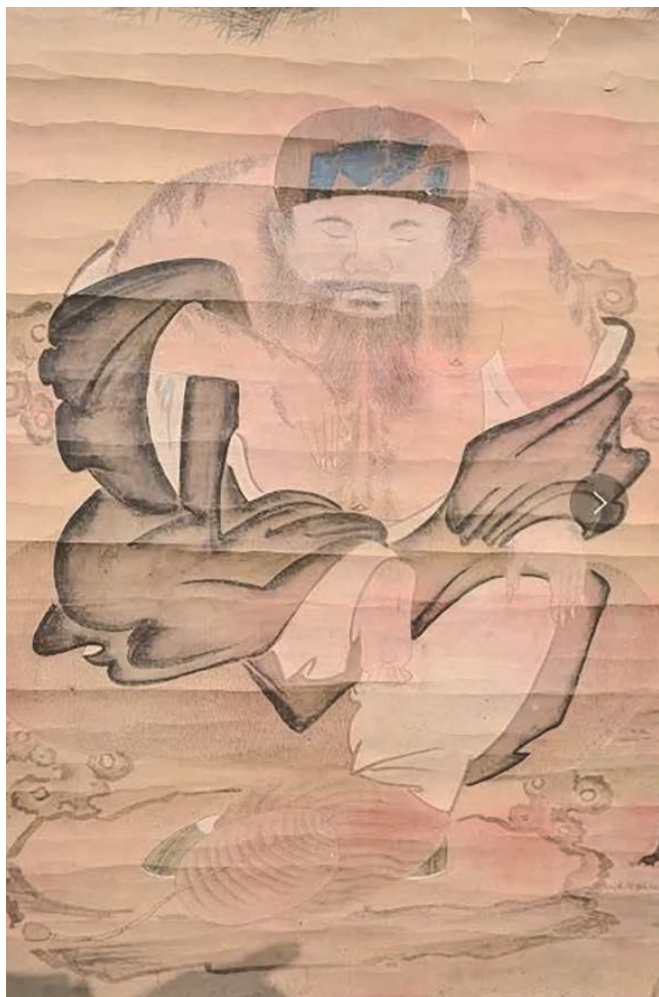
为粉碎敌人的进犯，7月2日，在华北讨逆野战司令员宋任穷、政委萧华统一指挥下进行第三次讨逆战役。运河支队的任务是歼灭盘踞在龙王庙、吴桥一带的顽军孙良诚部暂一师。7月10日，曾国华、曾思玉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攻占范县城、五里侯、房子铺及谷童一线。7月11日，孙良诚所部及石友三特务旅共5000余人分四路向房子铺、范县城反扑。曾国华率运河支队与敌激战一天，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当晚，大雨滂沱。曾国华、曾思玉率部冒雨追击石友三第三纵队邵洪基部，经数小时激战，最后顽军的头目和跟随的伪县长龟缩在一座大院的土楼里负隅顽抗。曾国华见状下令火攻。战士们用烟熏火烧的办法，迫使敌人投降。这次战斗击毙顽军支队长杨徽泰以下百余人，活捉副总队长于跃江及任县、肥乡等5名县长以下1000余人。

7月15日夜，五支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向范县、吴桥、玉皇庙进攻，经两日激战，击溃敌军暂一师，歼敌主力一八一师500余人。至此，石友三部全部被击溃，解放了广大地区，挽救了抗战局面，巩固了统一战线。9月，运河支队奉命出击巨南地区。这里包括巨野、嘉祥、菏泽、金乡、鱼台等县，介于鲁、豫、皖、苏四省交界，是鲁西军区与鲁东南一一五师师部和华中北上西去的必经之路，是我与日寇的必争之地。此时正值雨季，曾国华、曾思玉率领部队经过一个月的活动，基本上打通了巨南通道走廊。



疾风劲草阎尔梅 (-)

阎 强



阎尔梅的青少年时代

阎尔梅的祖父、父亲相继在兰陵褚家做私塾，阎氏为师，褚氏为门人，一时传为美谈。1603年农历九月十二，阎尔梅出生在山东兰陵褚家之坐馆，7岁附馆由父亲教读。12岁随父亲回归故乡沛县，居小闸。在官河东、浒引河之北，有瓦屋三楹，父子读书其中，湖光应树，远岫当门。其孙阎圻后来有诗，记阎

尔梅故居：“湖中秋水涨年年，失却杭穉学弄船。留得吾家三五舍，黄庐青笠数樵烟。”

阎尔梅16岁入县学，其才学让学使诧异，以为神童。为折其英气，岁试时学博将其置为下等。我们从阎尔梅年幼时作的《读书》这首诗歌中可以领略一下他的才华。

穷经常恨古人欺，不极群书不敢疑。
班马异同犹是史，齐梁金粉遂无诗。
低回佣舍樵柴初，寢寐玄亭载酒时。
博雅原非天授事，韦编三绝是吾师。

在这首诗歌里，阎尔梅用了佣舍、樵柴、玄亭、韦编三绝四个典故，表述自己对读书的体会。佣舍之典是指汉代匡衡为人做佣工时不忘读书的故事。樵柴是指汉代朱买臣采樵度日而不忘读书，奋发图强的故事。玄亭是指汉代杨雄编著《太玄》的地方。韦编三绝讲的是孔子读《易》将编简的皮条翻断三次的故事。

明天启三年（1623年），21岁的阎尔梅开始游学江南，至天启七年南京乡试报罢还乡，刻诗集《江上草》。期间结识了万寿祺、陈名夏、陈子龙、项仲展、项仲昭等人。所到之处，大家称之为奇才，溧阳人士为其筑“来贤馆”。倪鸿宝称之有当今武库之目，而方仁植、李映碧、涂印海也都赞同。然而在天启七年秋天，阎尔梅第一次参加乡试却落榜了。后来阎尔梅在《赠纪伯紫》一诗中写道：

有明天启岁丁卯，石头城下秋风早。
棘闹战罢气如虹，旧内西垣新揭晓。
自矜笔扫八千人，看榜儿童传康了。
怒把一樽莫愁湖，大江满斥响菰芦。
悲歌欲咽桓伊笛，秦淮水涸青溪枯。

尽管阎尔梅此次乡试落榜，但这四年的江南游学，让阎尔梅结识了一批江南才学，逐步了解东林党的思想，结识了复社人物。

明崇祯元年（1628年），26岁的阎尔梅以恩贡入都，寓真空寺。初夏，徐九一召各地才子集饮天坛，结识复社成员张天如、张受先等人。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四年春，阎尔梅都在京师读书，并于崇祯三年（1630年）在北京参加兆试，中举人24名。阎尔梅中举后参加了崇祯皇帝为考官及举子们举行的鹿鸣宴，见到了崇祯皇帝。阎尔梅在《皇极门早朝》诗中有“趋跄多错误，微笑睹天颜”之句，来描写举子们见到皇帝的情景。

崇祯四年，阎尔梅因得罪阉党势力，被罢公车，无法参加会试，于崇祯四年三月离开京城。在京师三年多的时间，刻有诗集《疏阴居诗》。

阎尔梅得罪阉党势力的主要原因：

（1）清代著名考据学家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记载：杨维垣戍淮安，画《明妃梦还汉宫图》，属人题咏。山人自沛至，曰：“杨名在逆案，果汉宫可返，则逆案可翻矣。”杨立取卷回，后直指使者诬劾用卿，杨与有力焉。阎尔梅有《杨维垣戍淮安以明妃返汉宫约诗余绝之纪事》。《阎古古全集》的编者张相文指出：山人《游燕京西山碧云寺》诗，有“学士鸿文表内官”句，山人在该诗的自注中云：“此诗大为逆案人所恨，遂发难端。”

（2）阎圻在《文节公白韋山人家传》中记载：崇祯初，铛诛，逆案成。霍维华戍徐州，假寓万孝廉家，屡谬论东林诸贤。山人不胜愤，对客痛驳之，至大声骂。阎尔梅有《霍维华戍徐州寓万年少宅与余论东林诸贤余驳之纪事》《陈百史为潘映姿寄书霍维华余见而焚之遂有张按院疏参之祸纪事》。

阎尔梅的这种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个性，使他在崇祯四年遭受了一场人生打

击。后来他在《上史阁部书》中总结自己说：梅生平无长才，不能修饰边幅，与时人周旋，惟兢兢先人家训，好名节，又好读书稽古。遇古人有气谊事功文章者，辄慨然欣慕。其卑不足道者，心鄙夷之；或形之诗歌以诋刺之。至处目前乡党师友，以及先达上官，皆复如是。先座师姚现闻公尝诫梅曰：“子嫉恶太严，面折人过，喜辩难，召爱憎，非明哲保身之道。”梅心志之，然终不能改也。谓世无知己，则爱之憎之，不足为轻重也。

随师南下再次游学，加入复社

阎尔梅在科举仕途中，因党派观点不同受到阻碍，决心不再应试，专心于学问，再次江南游学。崇祯五年（1632年），30岁的阎尔梅来到淮阴，随老师姚现闻到苏州。春夜与江南名士集于鸳止堂，堪称江南盛会，这一时期阎尔梅加入复社。返沛后，刻诗集《日删集》，并于崇祯十年，在微山立社，成为社长。

崇祯三年庚午，姚现闻以右春坊庶子主顺天乡试。崇祯四年升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五年，姚现闻因受首相温体仁所忌，被降为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十一月下旬，姚现闻次舟淮阴，阎尔梅正值淮安，因而晤而送之。

崇祯五年岁暮，阎尔梅附姚现闻舟，共抵吴门，下榻鸳止堂中，与姚希孟之子侄姚文初、姚瑞初朝夕讲论。次春诸大佬名士，云集鸳止堂，堪称江南盛会。与会者有吴无障（默）、钱牧斋（谦益）、张异度（世伟）、文湛持（震孟）、徐九一（汧）、夏彝仲（彝）、杨维斗（廷枢）、唐兴公（昌世）、张天如（溥）、张受先（采）、陈卧子（子龙）、项仲展（声国）、张弘甫（镛）、朱云子（隗）、徐武子（树丕）。这次游学江南期间，阎尔梅正式加入复社。

阎尔梅第二次江南游学回来，召集江北才子学人，积极参加复社活动，成为江北复社党魁。崇祯七年（1634年）温体仁欲起大狱杀东林，已置钱谦益、瞿式耜、张采、张溥于刑部，这个时候，阎尔梅父亲的学生褚德培赴任关中巡按，过沛看望阎尔梅的父亲，私语阎尔梅云：“君，江北复社党魁也，慎之！”阎尔梅在《茶马行送褚嵩华巡按关中》一诗中，详细记载了这一点。阎尔梅并没有听取师兄褚德培的警告，在崇祯十年，阎尔梅居微山，与其弟调卿、友人陈百史、蒋克昌等人立社会文，成为江北复社的社长。

舍家练乡勇，保一方平安

崇祯十四年（1641年），阎尔梅39岁。这年的正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陷河南，杀福王。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十一月李自成攻陷南阳，杀唐王。这一年徐淮地区大旱，贼匪四起，山东泰安匪贼犯徐州，与徐州匪贼合围丰县。徐州地区百姓苦不堪言。为保一方平安，阎尔梅开始在阎家子弟和乡居村勇中挑选人才，亲自教练，组成乡勇，自保一方平安。后匪贼报复，火烧阎家，阎尔梅避走淮安。

阎圻在《文节公白菴山人家传》中记载：壬午，寇氛四起。山人曰：“天下乱，国家自靖之。然县无一强民，不足保县库府，为大患。”遂请于郡县练兵，出外舍居，禁无以家事问我。约家童百，复大选其乡之能者，教以演刀操戈、句缩腾进之法。分两队约700余人。带黄九如、张子坤参观了微山褚鼎卿的火营。

崇祯十五年（1642年）秋，微山湖匪刘玄率兵数千，围攻沛县，沛人闭城守。匪兵弯弓纷驰，韃装轻矫，出没尘垆苍林间，射雉兔，歌关塞曲。纵横疾徐，千人一影。渐近城，环一匝而合，城上守兵惊恐万分。日暮，匪兵扎营城外，燃大炬数十

处，溷良家女子坐火光中，烤牛羊肉而食，腥膻之味，风飘数里。阎尔梅居城东，远望此番光景云：“危矣！城中人际太平久，虑不复知金鼓刀铤为何物，城守须臾，待破耳。”此时徐州监军带兵数百人过沛，阎尔梅乘夜借兵来助，并亲率乡勇壮士合攻匪兵，歼其贼首，群匪欲退，出金帛买路委去。阎尔梅率乡勇截杀，欲全歼之，不胜，壮士多被创，阎尔梅率乡勇撤，匪兵尾随家中，具焚其室庐。阎尔梅感慨曰：“嗟乎，贼纵横千里，破名城数十。上自宗藩抚镇，下及守令士绅，贼至，非弃城走，即听其残屠而已。谁肯捐躯为朝廷守？今救一城，即毁吾一家，吾宁悔邪！”并写下《歌台猛士行》，从这首诗歌里，我们可了解到当时阎尔梅率乡勇奋战的场景：“汤沐之乡多勇士，风云附会高皇帝。粉榆胜迹两千年，尚有萧曹功臣裔。屠沽酒媪悉英雄，海内何人敢轻视？辛巳之年三月暮，荒岁民饥逃满路。揭竿四起弄潢池，烽飞曾不计其数。直过湖陵犯歌台，深宵烽火如棋布。余心恶之传私令，邻里儿童皆听命。乡兵不与官军同，止可用奇不用正。铁马金戈农夫少，旌旗虚插垂杨杪。深春土气发烟光，土波摇动白茫茫。贼自西遍向东视，人影浮空几丈长。步者森森喧鼓炮，骑者随余捣中央。直入前茅穿背后，淋漓血溅绿沉枪。贼方蓐食寻攻具，闻信哄然各奔去。别遣余贼焚吾庐，楼厅图史尽灰墟。破我一家救一城，城上亲朋谢再生。岂知此非我所能，乃是我乡子弟兵。战罢疾书猛士铭，配大风歌勒泗亭。”阎尔梅含恨埋葬战死的子弟兵。由于湖匪的报复焚烧家园，被迫移家淮上。此后淮徐兵备金事何腾蛟表彰了阎氏壮烈精神。

心系国忧，草辩章欲解世危

崇祯十五年（1642年），阎尔梅40岁。夏秋间在京师，时流寇围开封，抚臣高名衡遣子入都乞师，首揆周廷儒欲以开封委贼。阎尔梅闻之，起草《流寇议》。崇祯十六年，沛邑大水，阎尔梅请于令赈之。倪鸿宝、方仁植、李映碧、涂印海应召入都，过夏镇，阎尔梅与之夜饮，谈论国事。不久阎尔梅寻之入都。归沛途中，见地方残破，因而草《安集地方议》上各抚官，以减租请。

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阎尔梅客金陵，遇黄石斋与王穆如、王衡之辈，夏秋间至京师。这时流寇再次围攻开封，巡抚高名衡遣子入京师告急乞兵，内阁成员商之于首辅，首辅云：“河南残破久矣，救之无益，姑弃之。”阎尔梅在太史家中闻之愕然曰：“开封非边外地，弃之则河南尽为寇据，淮扬必不可保，漕运中阻，京师大事去矣。”因草《流寇议》欲上之，竟为首揆所忌，太史恐阎尔梅因此获罪，促其疾出京师。八月河决城陷，高名衡挟周王逃去，河南尽失。顺治四年，阎尔梅过开封，为纪念好友高名衡在其诗歌《过开封有感》中，详细记载了此事。《流寇议》的引文也有记载。

阎尔梅京师归来，沿途所见地方残破，鸡犬无声。饥民载道，庐舍虚无人。面对如此景象阎尔梅泣曰：“国家将三百年，惨辱痛心，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于时牛贵，逾良马价。农耕废，一望田尽芜，绝行迹。因而草《安集地方议》，上书各地抚按官，请求为民免租，顺民意。但是各地响应者仅半，京师国库内虚，匪寇日益猖獗，整个大明摇摇欲坠。

经历甲申之变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崇祯皇帝殉国万寿山。五月初一，南明皇帝即位南京，改元弘光，三日，清兵入北京。这一年因是甲申年，历

史称之为“甲申之变”。

大明皇帝崇祯殉国后，大批文人以死相随，以表忠国之心，也有选择逃禅避世的消极生活，也有选择降于大顺政权或降清廷。阎尔梅也不例外，先是选择死亡以表对国的忠心。后选择抗清之路，反清复明之志，至死不改。

崇祯十七年春，阎尔梅的母亲吕氏病故，阎尔梅居丧微山。闻国殇之信，绝食七日，死而复生，作《哀燕山》。

甲申之变后，阎尔梅没有消沉下去，以积极抗争的态度，力求复明。崇祯皇帝殉国后，不少明之大臣乘清兵入京之际，纷纷南下，以求在南明政权再谋官职。1644年四月，总河黄希宪南下，42岁的阎尔梅着白衣冠去谒之，劝其主政黄河之北，力挽大局，黄不听而南去。沛令李正茂革崇祯年号，阎尔梅厉色谴责，几见害。五月大顺政权派防御使武素来沛，武素欲招阎尔梅，以书却之。

三次上书与南巡按使王燮，陈述复明大计，终未得答复，愤恨写下《寄王燮按台》：

谁云草莽不为臣？四海同悲故主人。

但使大夫能复楚，当求力士与椎秦。

移书州郡都如梦，起义江湖自恨贫。

编素勤王消息久，东南日日望来尘。

报国途径的受阻，阎尔梅并没有消沉，他决定散家产，结死士，自图抗争。并将投贼的徐州守牧生擒，交于南明总兵史可法处斩。拒绝清县令胡谦光的招降，毅然加入了史可法的抗清行列。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十六，阎尔梅赴史可法之聘，于正月十九在白洋河见到史可法。时高杰被杀，河南大乱。阎尔梅向史可法陈述抚高杰旧部，渡河收复失地，史可法不听。

南明政权建立后，开设四藩：兴平伯高杰镇守徐州、泗州，东平伯刘泽清镇守淮安、扬州，广昌伯刘良佐镇守凤阳、寿州，而黄得功晋为侯爵，镇守滁州、和州。后四镇总兵史可法遣高杰率兵入河南，欲渡黄河取中原失地。结果高杰在睢县被许定国杀害。这时阎尔梅见到史可法，先是陈述了徐州黄河以北的形势，力劝史可法大军进驻徐州，凭黄河之险，阻止清兵南下。二是安抚高杰旧部，利用高杰被杀群情激奋之际，北渡黄河复仇。三是守徐州，西进、北上收复失地。史可法均未采纳，一味退守扬州，结果江北之地尽失，史可法战死扬州，不久南明政权灭亡。从阎尔梅的《上史阁部书》中，我们可了解当时徐州一带的具体情况。在诗歌《已矣歌》的引言中，阎尔梅写道：予力劝史公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竟用左右言，去之扬州，且招予同行。予哭为此歌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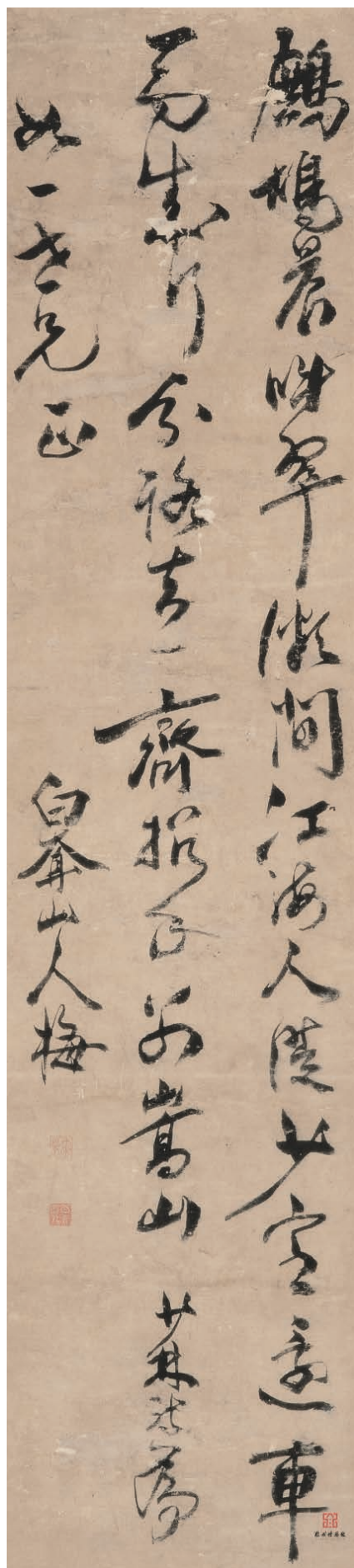
《已矣歌》

我公径南归，已矣河北事。

临行泣数行，不复能仰视。

大事今已矣，哀极不成音。

卷却离骚去，罗江独自沉。



史可法从徐州退守扬州之后，清顺治二年四月徐州兵乱，总兵李成栋东逃。阎尔梅写下诗歌《悲彭城》：

其一

黄河奎塔倚河隈，旗鼓高悬戏马台。
九里山长堪列阵，临期不见一人来。

其二

万顷春田麦秀匀，官军东走踏成尘。
侦他胡骑来多少，乡导前驱二十人。

阎尔梅在这两首诗歌的引言中解释到：满兵初未尝至徐州也。乃山东无赖市儿委署徐州丰沛间，通计百余人耳。总兵李成栋为兴平伯旧将，闻信东逃。予时自桓山微服往观。潜焉出涕。用古乐府题悲之，四月十四日事。

徐州丢失后，阎尔梅东走淮安，就刘泽清、田仰画战守策，刘、田不听，率战舰逃于海上。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入淮。清兵入淮时，淮人犹有歌舞迎婚者。阎尔梅率河北壮士盘桓城外，欲击清兵，淮人怕象扬州一样遭屠城，惧怕受阎尔梅等壮士的连累，将出首，结果阎尔梅被淮阴羽士陶震寅救下。阎尔梅从庙湾入海，寻南明水师。见到刘泽清等人后，阎尔梅发现他们欲降清，竭力劝阻，诸将不听。刘泽清欲杀之，王永吉认为阎尔梅是个忠义之人，将阎尔梅灌醉，放之于小船之中，弃之海上。阎尔梅复走淮安，在同乡老友蔡际飞的帮助下于该年十月返回沛县。

沂蒙大地一支笔（一）

——惠玉昆先生的书法历程和业绩

刘瑞轩



惠玉昆（1927—2018），山东日照人，自幼随祖父学习书法。先学颜柳，后学魏碑。经几十年修炼，其魏碑已形成个人面目。生前曾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临沂分校、临沂市老年大学教师，是山东省书协会员、临沂市书协副主席。出版有《惠玉昆书法集》《楷书千字文》。

呕心沥血修复碑刻

今天，中外的游客络绎不绝来参观王羲之故居，为华丽的亭台楼阁等古建筑所吸引，为小桥流水、翠竹假山的自然景物所陶醉，他们未必注意到建筑物上的匾额、对联和矗立于园内的各种碑刻，更未必知道书法家们为修复这些经历几百年，已经破损不堪的艺术品，付出多少心血和汗水。

惠玉昆先生就是为修复这些艺术品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书法家。2002年4

月，为纪念王羲之诞辰1700年，市委、市政府决定对王羲之故居进行第二期修复、扩建，惠玉昆先生被聘为顾问。

自2002年冬开始，每天八点，市政协派车把惠先生从家里接到修复故居的工地开始工作，直到天黑下班。所谓办公室实际是一座仅能遮风挡雨的简易房，周围是搬迁民房留下的砖头、石块和新建房的材料，可谓满地狼籍。惠先生就在这样环境，把陋室当作炳烛庐书房，从春到冬，挥毫不止。

修复工程从五贤祠开始。五贤祠，原位于临沂县老城南关外，是明嘉年间沂州知州何格所建，用以祭祀诸葛亮、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五位名贤。清乾隆十六年，沂州知府王埏主持迁于洗砚池东重建。这次扩建，仍置于王羲之故居东侧。该祠的主体建筑为硬山式大殿三间，殿内正中有一尊诸葛亮坐像，上题“忠冠云霄”四字；东侧有王祥、王览二位坐像，题有“孝感天地”四字（陈允升书）；西侧有颜真卿、颜杲卿二坐像，题有“忠冠古今”四字（陈允升书）。修复古建筑要“修旧如旧”是个原则。五贤祠山门上的匾“景行维贤”四个大隶字也是陈允升手书，但遗憾的是，其中的“贤”字在“文革”中被损毁。幸好惠先生自幼学过隶书，又见过陈允升许多隶书笔迹，便摹仿着补写了“贤”字，刻好后与原作融为一体，即使习过陈书的人亦难分辨。而更有难者是御碑亭两边楹柱上有乡贤狄建鳌的书联：“由汉而晋而唐前后五百年诞降三朝名喆，曰忠与孝与节辉煌廿八字褒题一邑英贤。”从楹柱原作上只搞到部分拓片，尚空缺好几个字。狄建鳌是写欧体的，而惠先生是写颜体的，两种体的笔画一瘦一肥，结构上一紧缩、一开阔，也迥然不同。但惠先生临摹着欧体，也将所缺几个字全部补齐。现在此长联安装在山门的两旁。

大殿前面是御碑亭，亭内有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临沂时题的碑文（诗）：“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这通碑要修复难度就更大了。原碑没有留下拓片，只能参考一张模糊的老照片来复旧。从照片看，前三句尚清楚，到第四句则看不清了，而落款“题琅邪五贤祠乾隆御笔”则全没有了。惠先生只能根据收集到的乾隆的字来摹写。此碑可说是集字而成。但只有经验丰富的专家能看出在气势连贯上稍逊于原作，一般观者是难以觉察的。此碑共复刻两块，一块是原大，立于晒书台前右侧；一块是放大四倍后立于观在御碑亭的碑。因为亭子高大雄伟，只有这样高大的碑才能配合协调。人们须仰视观碑，也易于表达对五位名贤的景仰之情。

修复旧碑的重头戏是重刻《集柳碑》。此碑又名《琅邪普照禅寺碑》。金皇统四年（1144年），普照寺主事和尚觉海对寺院进行扩建和修缮，请仲汝尚撰写《沂州普照禅寺兴造记》的碑文，觉海又千方百计集到柳公权的墨迹1261个字，由仲汝羲精刻于石上。该碑高2.9米，宽1.2米。此碑在书法史上地位很高，它与西安碑林里的柳公权《玄秘塔碑》齐名，它被称为东柳，《玄秘塔碑》被称为西柳。

《集柳碑》经历了860年的沧桑变化，遭遇很不幸。康熙七年（1668年），临邳大地震，它被震碎数截，损字很多。道光年间，一和尚对碑进行刮洗，致使笔画粗肥，失去原作风貌。日本军侵占临沂时，妄图将它劫走，幸未能得逞，可惜在“文革”中，被当作“四旧”砸碎，虽经修复，但残缺128字。2003年重刻此碑，是根据地震前的清拓本，又参照民国时修的《临沂县志》上的释文，惠先生认真细心地冒着酷暑炎热将拓上的字一个一个描在新石上，从上石到拓片，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因为字数太多，手续又繁复，整整花了三个月才完成。

惠先生对工作负责完全彻底的精神令人感动。新碑刻成后，过了11年，于2014年从南方又得到《集柳碑》明拓本，惠先生拿到此拓，与清拓对照，发现笔画比明拓本细瘦很多，而且因清拓模糊，还错刻了部分字。为此，惠老师深感不安，他在去世前还跟故居研究室的负责人交待，最好按明拓重刻，至少要把错字挖补一下。

除了修复旧的碑刻、匾额外，惠先生还亲笔书写了大门入口处的“王羲之故居简介”、碑廊的“前言”两块碑和普照寺天王殿楹柱上的长联，也都得到观光者的赞赏。

按照惠先生自定的规矩，为公益事业写字不收费。他为修复王羲之故居忙了近一年，最后一分钱未收。这给大家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凡是为故居修复写字的人都是义务劳动。惠先生工作既不为利，亦不为名。他亲笔写的字，只有碑廊的前言和普照寺的对联署名，其他都无名。他甘愿做无名英雄。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

在惠老师为修复碑刻忙得不可开交时，他的爱女不幸因患绝症去世了，年仅40来岁。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给他沉重的打击，大家都劝他休息几天，回家看看。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了，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2003年10月竣工。这种公而忘私的精神和坚强意志也令大家感动和敬仰。

两汉兰陵经学管窥

范玉秋

兰陵是中国古代著名城邑，据传因附近土陵兰草繁茂、兰花芳香而得名。两汉时期，兰陵地区经学兴盛，兰陵儒者在经学的传承、阐释、研究、弘扬及运用等方面成就斐然，影响深远，为汉代学术文化的繁荣和经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探讨兰陵经学兴起的原因、表现、学术特色，及其对两汉儒学的影响，对我们了解兰陵经学乃至两汉经学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经，最初字形写做“𦉳”，首见于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之中。对于“经”字之含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经，织从丝也。从系，声。”引申之则有组织、法则、规范、恒常不变之义。汉代儒学独尊之后，人们才开始将“经”解释为“常典”“常道”，以“经”专指圣人所作的具有神圣意味的儒家经典。经学，顾名思义，即治经之学，是训解、阐发和议论儒家经义，以对儒家经典的整理、考订、阐释、发挥和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问。两汉时期，兰陵儒者致力于儒家经典的传承研读，经学人才不断出现，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兰陵经学也逐渐兴盛。

首先，大批造诣精深的儒学经师涌现。西汉时期，兰陵群星璀璨，经师辈出，形成庞大的经师群体。其代表人物如王臧、繆生、褚大、孟卿、孟喜、后仓、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毋将隆、毋将永、段嘉等皆精研儒家经典，为一代名儒。他们或设帐授徒致力于经学的传授，或致身通显供职于朝廷，以经术处理政事，对经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汉时期，著名儒生王良亦是兰陵人氏，他长期在家乡授徒讲学，弟子众多；从政期间，积极推行儒家的“仁政”“德治”，为官清廉，品行高洁，为时人称颂。东汉末期，兰陵经学继续发展，繆袭精通经学，为时人尊崇。王朗少时读儒学经典，“高才博

雅”，为“一时之俊伟”，后被封为兰陵侯。其子王肃少承家学，曾从著名经师宋忠学习，后从政。他采会异同，融合今、古文经各家学说以解读经典，其学号称“王学”而与郑玄之“郑学”相对立，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其次，儒家五经皆有传承、研究。两汉时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在汉魏时代的兰陵都有着系统的传承和研究。王臧、繆生皆师事《鲁诗》的开创者申培，对《诗经》深有研究。褚大师从董仲舒研习《春秋公羊传》，官至经学博士。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仓、疏广”。其子孟喜曾从名儒田王孙学《易》，后来独成一家，称为“孟氏易学”。毋将永师承高相，为高氏《易》的著名传人。疏广、疏受精研《春秋》，分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朝廷以为荣”。孟卿弟子后仓，随孟卿学《礼》，著《后氏曲台记》数万言。其门人弟子众多，西汉时讲授《礼》学的名家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等人，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戴德著《大戴礼》，戴圣著《小戴礼记》，庆普著《庆氏礼》，三家皆立于学官。后仓亦精通《诗经》，是《齐诗》最早的传人之一。萧望之初从后苍习《齐诗》，后又从夏侯胜学《论语》及《礼服》。匡衡师事后仓，善解《诗经》，时人赞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王良精熟《小夏侯尚书》。王朗曾为《易》《春秋》《孝经》《周官》作注。王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

再次，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兰陵儒者承袭儒家传统，以弘道传经为己任，设立“精舍”“精庐”，创办私学，讲习儒家经典，推广礼乐教化。孟卿广招门徒，悉心教授。后仓亦举办私学，教授弟子多人。疏广、疏受早年在家乡办学，教授《春秋》，数年桃李遍布东海。王良在王莽改制时，不愿做官，而居家教授，先后有弟子1000余人，名声震动京师。兰陵经师所办私学，并非只是以发蒙为主的初等程度的蒙学书馆，而是致力于对经典的深研，其对经典的研究可达到与中央太学相同的程度。私学的发展，私家教育的兴盛促进了学术活动的繁盛，使经学在兰陵地区得到了系统的传播，天下才俊慕名前来求学，扩大了兰陵经学的社会影响。同时，兰陵儒者又多通经入仕，供职朝廷，官居高位，有较高的社会声望，《汉书·地理志》云：“汉兴



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兰陵经学的学术地位及社会感染力、号召力和影响力。

第四，家族文化群体形成。自儒术“独尊”之后，兰陵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经学并因此而累世高官的家族，经学世家逐渐出现，儒学家族文化现象开始形成。如孟卿、孟喜父子；疏广、疏受叔侄；萧氏家族、匡氏家族、缪氏家族、王氏家族等。萧望之，以研读《齐诗》《论语》起家，后官至前将军、光禄勋，宣帝临终受遗诏辅政，并领尚书事，其子萧良、萧咸、萧由等皆通晓五经，位至二千石。匡衡位至丞相，以儒学传家，其子匡咸位列九卿，后代亦多为博士者。王朗、王肃的子孙皆博通经史，王肃女王元姬，8岁即能朗读《诗经》《论语》，王肃之子王恂、王虔皆崇明五经。“汉兴，尊用儒术，贤良博士时有登进，而东海兰陵尤多以文学致身通显。以及魏晋门阀日重，而吾乡若萧氏、王氏、缪氏，皆以明德世业为一代甲族……尤以经术文章焜耀简编，而子孙相承至数百年传系不绝。”

二

兰陵经学的兴盛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儒家底蕴，从根本上影响着兰陵文化的发展进程，而特定的时代背景则是两汉时期兰陵儒学勃发的直接促成。

兰陵古属东夷，《后汉书·东夷列传》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生，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曰：“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春秋战国时期，兰陵长期归属鲁国，为鲁国次室邑，毗邻齐地，后虽为楚国所属，但其民风仍与齐、鲁民风略同。鲁国儒学兴盛，是儒家学说的发源地，延续着儒家文化的正统。《史记·货殖列传》称：“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颀颀。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嗇，畏罪远邪。”班固《汉书·地理志》也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齐国则是“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崇尚仁德、推重



匡衡“凿壁偷光”

君子的东夷文化，拘谨、守礼的鲁国文化，包容、睿智的齐国文化，共同滋养陶冶着兰陵大地，孕育着兰陵尚仁、好礼、宽容的儒家风尚，对兰陵学术文化的发展及了兰陵儒学的兴起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汉代兰陵经学的兴盛，与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后期，荀子先后两度为兰陵令，治理兰陵近20年，晚年定居于此，著书讲学，广收弟子，培养了大批人才，兰陵成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学术中心，兰陵儒学由此兴起，绵延不绝，为汉代兰陵经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刘向称：“兰陵多善为学，盖以荀卿也。”汉代兰陵在儒学上有造诣的人物，大多间接受到荀子的影响，兰陵人多善为学，也得力于荀子之遗风。汉代兰陵传经者亦多称出自荀子。胡元仪作《荀子别传》说：“至汉时，兰陵人多善为学，皆卿之门人也。汉人称之为：‘兰陵人喜字为卿，法孙卿（荀子）也。’教泽所及，盖亦远矣。”

西汉建立之初，除秦苛法，推崇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儒学也已逐渐受到重视，少数传授儒家经典的学者还被朝廷立为博士，经历秦火之后的儒学在几近湮没的状态中开始复苏。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汉代的统治地位。而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经典著作中，因此，《诗》《书》《礼》《易》《春秋》成为代表圣人常道的“经”，成为由圣人所作，蕴涵着天地不易之常道的神圣经典，是“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是孔子为汉制作的教化之义，蕴含着圣人“修世治道”的至明之理。儒家经典不仅成为儒家学派建构和展开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成为社会政治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重要来源，成为神圣不可怀疑的典籍。作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经学也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官方文化的核心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两汉学术发展也由之而进入了典型意义上的经学时代。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经学与仕途结下了不解之缘，汉武帝表彰六经，设置经学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以通经作为取士的标准，征召儒生为官，通经的儒生可以立为博士、官至卿相。士人对通经入仕充满了信心。“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怀禄以图存成为儒者研读经书的追求，“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成为社会俗谚，文人学士纷纷从儒治经，习经尊经成为社会时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有着悠久的儒家传统和深厚儒学积淀、儒学传承延续未绝的兰陵地区，经学的兴盛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三

兰陵儒风醇厚，《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代相传授，延续不断。诸经师虽然对经典的关注和研习各有侧重、不尽相同，但是在学术理念与治学风格上，在经典的传承、阐发，治经的方法、路线及价值取向上，兰陵经师却有着诸多相同相似之处，从而使兰陵经学在地域性的基础上又呈现出鲜明的学术上的特质与风格。

齐学、鲁学兼容并陈，在经学的传授系统上，兰陵经学呈现出学术上的包容性。汉初，随着儒家经典的相继复出，传经者日渐增多，各地经师所依据的经典文本或有

不同，对经书的解说也不尽一致，所用方言也有差异，一些带有区域特点的经学流派由此产生，鲁学、齐学便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派别。两派在治学风格、思想方法等方面多有不同之处。一般而言，齐学崇尚权变，近于趋时，多信讖纬，具有一定的神秘性；鲁学较多迂谨，颇为好古，大多不信讖纬。鲁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鲁诗》《春秋穀梁传》《鲁论语》等，齐学则有《齐诗》《春秋公羊传》《齐论语》等。齐学、鲁学本是因地域而划分，但是学派一旦形成，其地域性的界限必将被突破，只要对经典的解说基本相同，即可视为同一学派。入汉以来，《诗》学分为鲁、齐、韩、毛四家，其中，鲁、齐、韩三家并立于学官，成为《诗》学的主流和官方学派。在三家《诗》中，《鲁诗》之学最盛，最为先出，流传最广，影响也最大。《鲁诗》学的开创者申公，名培，鲁人，为荀子的再传弟子。其“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兰陵繆生至长沙内史，徐偃为胶西中尉”，王臧至郎中令。《齐诗》的创始人是齐人轅固生。兰陵人后仓是其再传弟子，为博士。匡衡皆师事后仓，为当时《齐诗》学大师。王良治《小夏侯尚书》属鲁学。褚大、孟卿、疏广、疏受等治《公羊春秋》属齐学。萧望之初治《齐诗》，师从后仓，后从夏侯胜治《鲁论》，齐学鲁学兼修并习，实现了齐学、鲁学的融合会通。

尊重师法但不拘泥守旧，在经学的传承发展上，兰陵经学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师法一词源于《荀子》。《荀子·儒效》篇称：“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荀子·修身》篇也有：“不是师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犹以盲辨色，以聋辨声也。舍乱妄无为也。”这里的师法，有师承效法、尊师重道之义，其核心在于辨明师承关系。西汉初年，经学始兴，经师传经，“率由口耳相传，又不能无讹误”，师法遂为世人所重视，弟子受业于师，应严守师训，不得更改。“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兰陵经师注重师承、尊师重道，皆有师法可言。如《汉书·匡衡传》载：“（萧）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师道即是师法的别称。但是，在经学的研究和传授过程中，一些有造诣的兰陵经师却是重师法，但不固守师说；贵传承，而更着意于创新，在尊重其先师的权威性的基础之上，发挥师说，开拓创新，突破旧规，形成自己独特的解经风格，创立新的一家之学，开创出各自的“家法”。孟（喜）氏之《易》学、褚（大）氏之《鲁诗》学、匡（衡）氏之《齐》诗学、后（仓）氏之《礼》学皆立于学官，设置为经学博士，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今文经学为本，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在对经典的解释上，兰陵经学具有鲜明的创造性。作为汉代儒家的一个学派，今文经学是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由于遭秦始皇焚书之厄，汉代搜求儒家经典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凭记忆，靠背诵，根据先师口授，用当时通行文字即隶书记录成书，作为传本，称为今文经。另一种则是从地下或孔壁中发掘出来的古本，因用古籀文字写成，故称为古文经。由经典传本的不同逐渐引发出了汉代经学中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两派各立师法，标榜门户，在所依据的材料和对史实的解释上，在考察、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上，都有着较大的分歧。“大抵两汉之时，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家言多以经术饰吏治，又详于礼制，喜言灾异、五行；古文家言详于训诂，穷声音、文字之原。各有偏长，不可诬也。”一般说来，古文经学多讲求文字训诂，留意典章制度，其为学方法上在于详古略今，以经为史，重在探讨经文本义，注重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具有较为浓重的实证色彩。今文经学则关注并热衷于参与现实政治，讲阴阳五行、灾异谴告，其治学的目的在于明义理，使古为今用，故在为学的方法是详今略古，信经为经，致力于发掘、发挥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汉儒之重六经，皆以其为孔子所传，微言大义所在，非以其为古代之典籍也。”两汉兰陵之经学，属今文经学派，兰

陵之儒生皆立足于今文经学，以章句义理之法释读儒家经典，着意于“六经”的微言大义，创造性地阐发《诗》《书》《礼》《易》《春秋》之学，把诸经的社会教育和教化功能发挥到极致，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及汉代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文经学传承、沿革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强调通经致用，在治经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强的功利性。所谓“通经致用”，顾名思义，就是指通晓经术以求致用。“经”是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用”是指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说“内圣”与“外王”，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学术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始，儒学重现实、倡有为、积极入世的经世风格即已确立。在汉代，将儒学理论应用于社会、“学而优则仕”、通经以致用已成为儒家知识分子读经治学所追求的目标和抱负，成为儒者的一种理想。在汉儒看来，六经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是为政之根本。“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贍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知，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通经即通晓经典的微言大义，领悟经典的根本精神；致用则是指“缘经术以饰政治”，以经术教化社会、参与政事，是“学问须有益于国事”。从根本上讲，经学的致用来源于汉代经师对经书义理的演绎与阐述，其“致用”的学术取向，是其直面现实讲究应世的学术精神的反映。兰陵儒者秉承儒家经世之传统，极力以经学谋求仕途，以经术参与政治。孟喜，汉宣帝时举孝廉为郎，任曲台署长，后为丞相掾。褚大，官至梁相。疏广、疏受分别任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萧望之曾任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前将军光禄勋等职。匡衡、薛宣为丞相。毋将隆任谏议大夫、京兆尹等职。王良居官多年，历任谏议大夫、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大司徒等职。缪袭官至尚书、光禄勋。王朗、王肃皆身居高位，位列三公。

作为汉代经学的重镇，兰陵经学的兴盛对汉代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经学的传承发展上，兰陵经学承先启后，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有所创发，开辟出新的解经路向和解经风格，为汉代经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兰陵诸儒也以自身的努力促进了汉代经学时代的真正到来。汉代经学的兴起，虽然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时，但是经学真正达到昌盛，却是在汉元帝时期。郭沫若先生曾说，“元、成以后……明经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出现了‘州牧郡守，家世传业’的经术世家”，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儒家经学的迅速发展，与汉元帝的个人喜好及施政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一切，又与疏广、疏受、萧望之、匡衡等兰陵诸儒者的教诲引导密切相关，兰陵经学对汉代经学乃至汉代政治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萧颖士轶事

温瑜

萧颖士，字茂挺，祖籍兰陵，梁鄱阳王萧恢七世孙，也算是龙子凤孙了。萧颖士自小聪明异常，据说四岁就能写文章，十岁的时候被破格录取为太学生，所读之书来一遍即能背诵。后来他跟朋友李华、陆据一起游览洛阳龙门，在路旁石碑上读到一篇好文章，哥仨想背诵下来，结果萧颖士读一遍就能背诵如流，李华要读两遍、陆据则要读三遍。

唐开元二十三年，十九岁的萧颖士以廷试策对第一的名次考上进士，一下子就成了天下名人。他老爸萧旻当时做莒县政府秘书长，犯了罪被抓到局子里，小萧跑去向父亲的上司张惟一求情，两人聊了聊，张惟一答应了。他跟别人说：“老萧有个极有出息的儿子，这次就算卖他儿子一个面子吧，即使因为包庇老萧而丢官，老夫也认了。”

天宝初年，萧颖士进入秘书省做秘书正字，当时秘书省几个名士像裴耀卿、韦述等人，虽然都是老资格的研究员，却没有一个人敢看轻小萧，而是主动跟他平起平座，这下子更是把他的名声抬起来了。不久以后，小萧奉旨去河北一带搜集古书，因为贪玩，好长时间都没有回京述职，结果被御史弹劾丢官。其实萧颖士对做个有职无权的图书馆员也没啥兴趣，于是干脆就留在濮阳，开馆授徒，收了很多学生，名望仍然极高，大家都尊敬地叫他一声“萧夫子”。再后来，朝廷想起了他，于是让他回长安做集贤校理，仍然是与文字打交道。时任宰相的李林甫想见他，又喜欢摆臭架子，萧颖士才懒得理呢。正好这个时候他父亲去世了，所以萧颖士以守父丧为借口，不肯去李林甫家。名士嘛，当然清高了，他可不把跟总理一起喝茶当成荣耀。可是李林甫不晓事，有一天正好到了萧颖士一个朋友家里，顺便让人去邀请萧颖士来拜见他。萧颖士来了，站在门外哭得天昏地暗，却不进门。李林甫一看再也无法躲了，只好先老老实实地去萧旻灵前磕头，萧颖士这才愿意跟他叙礼。李林甫气量小，一怒之下就把萧颖士发配到扬州管治安。萧颖士很憋气，写了一篇《伐樱桃赋》来骂李林甫。不久以后，他的母亲去世，于是萧颖士便辞了官，专心在江浙一带教书，赚了点束修便到处旅游。

萧颖士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候的老上司韦述后来在史馆供职，升官之后，便推荐让萧颖士来接他的位置。不过有李林甫从中作梗，他日子并不好过。萧颖士跟李林甫关系极僵，多次对李指桑骂槐，落得了一个做人不忠厚的臭名。因为这个坏名声，李林甫翘辫子之后，他仍然得不到提拔。不过，老萧做学问实在是没的说，名声都传到海外去了。新罗国使者入朝进贡，唐玄宗照例要给藩国厚赐，不过新罗人很过分，他们不要金银财宝，而要萧颖士去给他们当老师。

中书舍人张渐就很清醒，极力反对，所以最终萧颖士还是没有加入韩国国籍，这使得今天的韩国人少了一点吹牛的资本，不然某些喜欢意淫的韩国人又会说唐宋古文运动是他们发起的了。说到古文运动，或能大家都只记得韩、柳，其实最早却是苏绰、李谔肇其源，陈子昂理其绪，萧颖士等扬其波，韩、柳扬鞭奋蹄，才蔚为大观的。萧颖士他们提倡古文，重视文章的教化作用，在古文运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他的老师、朋友和学生全是当时名士，像颜真卿、柳芳、贾至等人，随便拿出一个，不是大学者就是高官。他的学生阎士和说：“即使是一个小孩，如果他曾经听过萧老师的课，你再跟他谈起曹植、陆机，他都会懒得理你。曹、陆算啥子嘛！”这话虽然有一定吹牛皮的成分，但还是有几分干货的。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萧家有一个下人，伺候了萧颖士十多年，好多次被老萧打得皮开肉绽。有人可怜他，劝他离开萧家另觅出路，这位老兄说：“不是我找不到新工作，只是因为敬重萧先生的才华，舍不得啊。”您看，居然有人为了耳朵享福就不顾屁股受罪，不服不行呀。还有一个故事，跟萧颖士齐名的李华曾经写作了一篇《含元殿赋》，别人都说水平不如萧颖士，他不服气。于是攒足了劲儿，苦心孤诣地写了一篇《吊古战场文》，再故意把书弄得脏兮兮的做成假古董，塞在一堆满是灰尘的书里，然后装着无意间发现了它，拿出来跟萧颖士一起读。萧颖士读了赞赏不已，李华满以为他上当了，故意拿出一副探讨学术问题的严肃派头来问：“你觉得今人之中，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萧颖士坏坏地笑道：“要是李教授你稍稍用点功，就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了。”李华听了大吃一惊，才知道这样的小伎俩根本就瞒不过老萧的法眼。

萧颖士不但文章写得好，搞政治军事还很有一套。当年他看到唐明皇和杨太真宠爱干儿子安禄山，心中十分忧虑，对柳并说：“看来以后会有大问题。如果安禄



山造反，恐怕洛阳会首先落入此人之手啊！”于是他借口身子骨不舒服辞了官，跑到洛阳附近隐居。不久果然，渔阳鞞鼓骤起，萧颖士马上从隐居的地方出山，拜见镇守开封的河南采访使郭纳，向他灌输了一大通对付安禄山的理论。可惜郭纳是个不识货的人，没把他的建议当回事。听说名将封常清此时正坐镇洛阳，萧颖士又打算去给封将军出主意。可是还没见到封常清本人，光看见老封带的兵军容不整，他马上就没了信心，赶紧南赴山南东道治所襄阳，投奔节度使源洧。源大帅还比较有眼光，委任老萧做自己的参谋长。安禄山派兵攻南阳，源洧害怕了，打算放弃南阳、襄阳，退守荆州。萧颖士说：“近来大战费用甚巨，朝廷必须仰赖江、淮地区提供的粮饷和钱财，而从江、淮地区往长安转输粮饷，襄阳是要冲。所以，如果放弃襄阳，恐怕整个战事就将处于不利局面了。叛军现在主攻潼关，攻击南阳的肯定只是一股小部队。山南东道下辖数州，组织起数万军队，抵抗小股叛军的进攻当然不在话下。您怎么能够轻易放弃自己的领地，这不明摆着惹人笑话么？”源洧听从了他的建议，死守南阳不出。不久，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围城的叛军土崩瓦解，一切都如萧颖士的预计。可惜不久以后源洧去世，萧颖士流落到南京。永王李璘起兵，派人请他从军，萧颖士比李白清醒多了，没跟李璘混。当时朝廷以盛王李琦为淮南节度大使，又怕小王子势力坐大，让他留在成都，只是派副大使李成式代理其职。李成式能力一般，难以驾驭这一带的骄兵悍卒。萧颖士赶紧给宰相崔圆写信说：“淮南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而又民风剽悍，自古以来，中原大乱，此地必然盗贼蜂起。目前这里的形势不是李成式所能控制的，您得赶紧把盛王派出来。”不久以后果然就发生了刘展造反的事件。崔圆很佩服萧颖士的先见之明，再次让他到扬州做官。可是萧颖士心高气傲，到任才一天又挂冠而去，最后悄无声息地死于汝南客舍之中。

东夷故乡寻踪 (二)


高 雷

二、勿忘在莒

莒，地名。古字为莒、廬，今“莒”字自汉朝开始使用。

莒地或莒国属于东夷的范畴，争议不大。1975年春，莒南县大店镇老龙腰出土了9件编钟，铭文：“唯正月初吉庚午，莒叔之仲子平自作铸其游钟，玄鏐鎡铝，乃为之音。端端雍雍，闻于夏东。仲平善厥祖考，铸其游钟，以乐大酉，圣智龚良，其受以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其中的“端端雍雍，闻于夏东”是谓和美的钟声。声闻于东夷。《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夏与华古韵为双声，互为通假，中原之地周初之人已用“夏”字，周末之人始用“华”字。夏东，东夷也。莒国国君也曾经说，莒“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左传·成公八年》）。“我国偏僻粗俗，地处东夷之地，有谁会把我作为觊觎的目标呢？”

东夷范围广阔，莒地的具体方位在哪里，则众说纷纭了。主流观点认为：莒地大致在今山东省日照市莒县一带。依据是《春秋左传》，隐公二年夏有：“莒人入向。”孔颖达《正义》注：“《世本》莒，己姓。……《（世族）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於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位置确定了，但莒人姓氏又产生了矛盾，究竟是姓嬴还是姓己？

究其源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山东省博物馆联合莒县文化馆曾对莒县陵阳河遗址进行过考古发掘，证明此地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距今4800年左右。在出土器物中，刻在大口尊上的图像符号，就有七类13个。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有人将其称之为汉字的雏形，但符号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确定为氏族符号或者图腾，则有一定的道理。

2014年4月，莒县文物考古人员在马鬃山南麓的帽盔石上发现神秘岩画，有太阳、大地、人物、凤鸟等，推断距今约有4600年左右。内容与太阳崇拜有关。此可以与大口尊上的符号互相印证，证明大汶口时期莒地的原驻民，是一个崇拜太阳，以日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符合上古神话传说时期太昊部落的特征。太昊，东夷的祖先和首领之一。风姓名昊，字伏羲，又称羲皇，传说为太阳神。《尚书大传·洪范》：“东方之极，自碣石东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昊）、神句芒司之。”榑木即扶桑，太

阳升起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中“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左传·僖公十七年》借郟子之口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杨宽说：“近年陕西神木县汉墓出土画像石，有春神句芒和秋神蓐收的画像。句芒人面鸟身，左手捧红色日轮于胸前，右手持矩，足下和身后各有一条青龙。”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的契合，证明太昊部落确为莒地的开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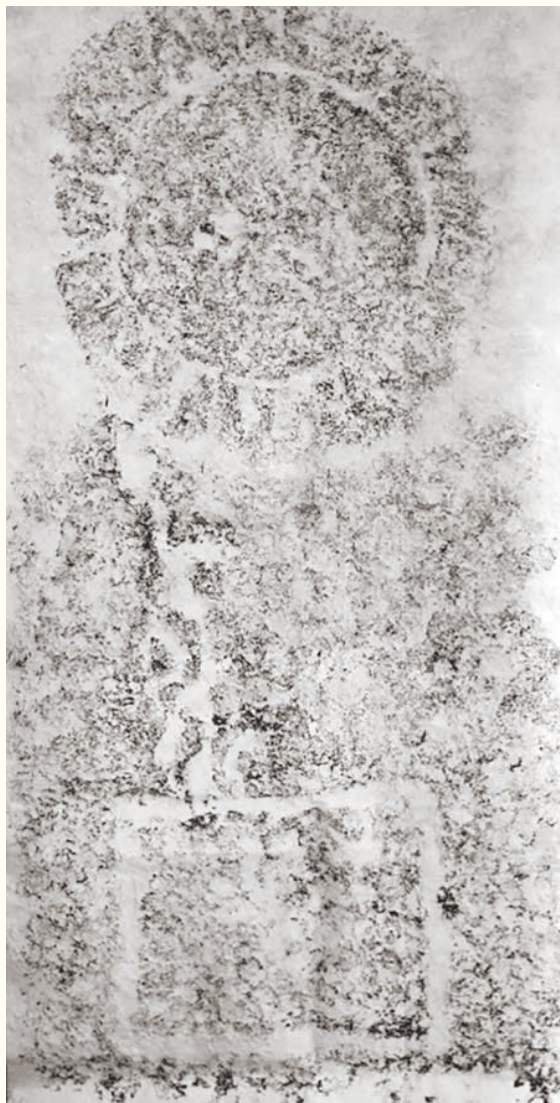
临沂境内尚存有太昊氏族的遗址。《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载：“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昊）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这里的颛臾指春秋时期仍存续的颛臾国，其遗址在今临沂市平邑县境内，民国之前属费县。孔子说过：“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鲁国）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论语·季氏》）颛臾即颛臾，颛臾国当为颛臾的封国，颛臾是太昊的后裔，无可争辩。《吕氏春秋·古乐篇》说：“帝颛臾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袁珂认为空桑即扶桑。高诱注曰：“空桑，地名，在鲁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征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窠’，在鲁南。”这也印证了沂蒙地区是太昊部落的大本营，颛臾是他的传人。

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里认为：“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郟氏、莒氏、……秦氏。”唐《元和姓纂》说：“莒，伯益之后封莒，以国为姓。”莒地领主本为太昊家族，何时改换的门庭？

嬴姓为少昊之后，得姓始祖是伯益，以鸟为图腾。清人马驥在《绎史·少昊世系》下注说：“《秦本纪》以大业祖颛臾。按，大业是为咎繇，即皋陶也。其子伯翳，即伯益也。宜祖少昊，颛臾其母家尔。”伯益父系祖先少昊，母系祖先颛臾。伯益后人封莒，不晚于殷商中期，莒地是得于禅让，还是得于掠夺。茹毛饮血的时代刀光剑影，还是掠夺得多。《路史》记载：“自剥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上古神话中，后羿射日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山海经·海内经》：“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羿是般的学生。《史记》说“帝羿有穹氏”。专家考证有穹氏是东夷族系，是少昊时代之后东夷中部落群体中最强大的一支，有些古书直接称羿为“夷羿”。“夷”字是一人持弓的形状，可以从字面看出东夷人特长——善射。屈原《天问》有：“帝降夷羿，革孽夏民。”帝王派遣后羿降临，替百姓解除灾祸、忧患。什么灾难呢？那就是“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淮南子》）日为太昊部落的图腾，后羿是少昊一族的首领，“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尽死，坠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后羿射日的寓意就是太昊部落的陨落，少昊部落取代太昊部落上位，完成了权力的更迭。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帝孺颛臾于此。”《诗经·小雅·常棣》《正义》训“孺”字为：“九族会聚，和而甚忻乐。”又引李巡曰：“骨肉相亲属也。”近人高亨先生说：“孺，借为愉”；余冠英先生释为“中心相爱”；少昊称王之后即与颛臾部族捐弃前嫌，握手言和，结成了姻亲。

殷商王朝的统治者和嬴姓同族，他们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同时，又有着内部的利益冲突。有商一朝，嬴氏部落“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后汉书·东



马鬻山岩画

夷传》)

商代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这方面卜辞，如“伐𤑔方”“戍及盧方”“征𤑔方”“册𤑔方”的记载，蔡运章释卜辞中的盧、𤑔为莒，莒作为地名这时已经出现，嬴姓封莒应在此之前。最初封地在哪里呢？1981年北京文物工作队在北京市铜厂选出28件带铭文的青铜器，这批铜器传为山东费县出土的。其铭文为“举𤑔”，属商代铸器。“举𤑔”即“莒”的同音字。孙敬明认为：这批铜器“显系出自墓葬。这种情形往往与其主人活动的地域有直接的关系。”“这说明商代之莒就在此附近。”“其最有可能在沂河两岸。”而颛顼的颛臾国，伯益的费也都在此地，彼此相邻，兴衰更替，似有渊源。

时至商朝末年，商王帝乙，帝辛父子与东夷之间爆发了大规模战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斯年》）黎，地名；蒐指通过蒐狩演习战事。其后便有了“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的结局。讲的是帝辛讨伐东夷，消耗了殷商的实力，周人乘虚而入，纣王失国身亡，周人入主中原。

鲁迅先生说过：“至于周的武王，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当国。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欲攻成周。”（《史记·卫康叔世家》）武庚作乱，嬴姓诸国积极参与了倒周行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载：“（成王）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塋方鼎》铭辞：“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伯、薄姑，咸戡。公归，获于周庙。戊辰，饮秦饮。”说的是什么呢？周公征伐东夷大获全胜。丰伯及薄姑国的国君都被斩首。周公凯旋而归，将俘获的嬴人首领飞廉作为人性献祭祖庙，公元前1040年12月23日，杀掉飞廉，畅饮其血。《孟子·滕文公下》称：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熊盈指淮夷嬴姓，刘师培《周书补正》卷三说：“熊者嬴之转，观《左传》宣八年夫人嬴氏，《公》（《公羊传》）、《穀》（《穀梁传》）作熊氏，则熊、盈、嬴三文通用。”杨宽认为：“所谓‘十有七国’是指东夷的大小方国，所谓‘九邑’当指东夷的许多部落。九未必是九个，当是多数之意。”参加叛乱的嬴姓莒国，当是在这次周公东征时被灭除。

《诗经·豳风·破斧》描写了周公东征时战斗的激烈、战事的艰难：“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东征，四国是遘。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铍。周公东征，四国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城头变幻大王旗。失败者国除名灭，胜利者，封地加爵。《路史·后纪八》记载：“莒则周灭之矣。”下有注：“非纪姓之莒，周灭之，封兹舆期。”秦嘉谟在《世本八种》辑本按语中说：“嬴姓之莒，则先封于祁，后归于莒。嬴姓之莒亡，而已姓之莒仍其名也。”至此，己姓部落取代了嬴姓的统治地位。

己姓，颛顼之后。帝颛顼曾孙重黎、吴回，帝喾时先后任火正祝融，《世本》云：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氏之妹，生六子，其一曰樊，是为昆吾。”陆终长子名樊，受赐己姓，封于昆吾国（河南内黄县古帝丘），世为夏伯。己姓，祝融八姓之一。

《左传·文公七年》云：“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声己，生惠叔。”《左传·文公八年》和《世本》、《潜夫论》。《左传》云：“穆伯如周吊丧，不至，以币奔莒，从己氏焉。”穆伯（公孙敖）去成周吊丧，没有走到京城，带

着吊丧用的礼物跑到莒国，投奔心仪的女人己氏去了。汉王符《潜夫论·志氏姓》云：“莒子姓己氏。”清代马骥《绎史·莒世系表》注说：“《传》言穆伯奔莒从己氏，其为己姓明矣。”

陈槃认为：“莒氏屡灭，遗址不一，而其姓或以为己，或以为嬴，或以为曹，盖尝改封易姓矣。各据所见，故言之亦不尽同也。”太昊的后人取代了嬴姓氏族。那么嬴氏部落又去了哪里？周灭商和平定武庚、淮徐乱后，采取了“以蕃屏周”的移民政策，在周的直接统治区域，迁入和迁出大批的殷遗及东夷部落，这包括新建的洛邑\成周，甚至到周的中心岐周\宗周地区。《左传·定公四年》中有：“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清华简《系年》则记载：平定三监之乱后，“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圉。”参与叛乱的东夷嬴姓部落则被迁往了甘肃。郑杰祥认为：己姓“莒族原来附属于商王朝，西周灭商之后，迁一部分殷民于东方居于莒地”。

己姓之莒封地比较明确，《世本》：“周兴，……置莒后舆期于始都计斤，十一世兹丕归莒。”计斤原为计汧，后人写作计斤（今胶州市南关城子村）《汉书·地理志》琅邪郡计斤下班注：“莒子初始此，后徙莒，有盐官。”颜师古注：“春秋时所谓介根也，语有轻重。”晋代杜预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齐伐莒取介根，把介根说成是《汉书》的“计斤”。后世学界治莒史者，凡谈到己姓莒初都计斤皆言即介根。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在此介根下说：“杜注‘莒邑’。案，周初莒兹舆期始封于此。春秋不知何年徙都沂州府莒州。此为莒别邑。汉置计斤县，即介根也。在今莱州府高密县东南四十里。”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胶州条下有：“周介国。又莒介根邑，莒故都。”“计斤故城在今胶州西南五里，今城子村。”杨伯峻在《春秋·左传》隐公二年“莒人入向”注说：“莒旧都介根，在今山东胶县西南。后迁莒，今山东莒县。”

莒国定都介根之时，东北部边疆达于山东省昌邑县东南。《春秋·隐公二年》载：“纪子帛、莒子盟于密。”杜注“密，莒邑，城阳淳于县东北有密乡。”即今山东省昌邑市围子镇古城村。春秋后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齐崔杼帅师“伐莒，侵介根。”可见莒国北境仍达介根。其后，北部边境被固定于齐长城一线，自今沂水县穆陵关至五莲马耳山奔青岛市黄岛区小珠山，呈V字走向。

莒国南部边境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境内。《左传·成公八年》杜预注云：“渠丘公，莒子朱也。”孔颖达疏云：“十四年，莒子朱卒，知渠丘公即是朱也。渠丘，莒之邑名。”叶圭绶曾说：“鲁成公九年楚伐莒，渠丘先溃，次莒、次郟，自南而北，渠丘在莒南明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指出：“疑渠丘在莒县东南。”尹钧科在《春秋莒国三都及疆域略考》一文中考证：“渠丘在莒城南，当在今江苏赣榆西境。”又考《魏书·地形志》谓：义唐郡之怀仁县有莒城，这莒城也就是后来的莒州南缘的莒城，亦名渠丘。即今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大莒城村。

莒国东境临海。《左传·昭公十九年》载：“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郟。”杜预注说：“纪郟，莒邑也。东海赣榆县东北有纪城。”光绪《赣榆县志》载“界墙城，县北六十里，东际海，西连山”，界墙城，即纪郟城。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东北，古城已被海浸没。

莒的西部边境。《春秋·襄公六年》载：“莒人灭郟。”郟在今临沂市兰陵县向城镇境内。据此，莒之西境已达兰陵县向城一带。

己姓之莒到春秋时期，疆域东起黄海，西至今兰陵县境，南达今江苏赣榆，北至今昌邑县境，拥有大小城邑30多个，是今山东地区仅次于齐、鲁的大国。顾栋高《春

秋大事表》叙述：“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其为患不减于荆、吴。”

兹與期封莒不久便与周王朝产生了矛盾，随着实力的壮大，其后人多次参与东夷与周王朝的冲突。这在出土的周朝青铜器中有所体现，1986年在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中晚期铜器史密簋，其铭文曰：“惟十又一月，王命师俗、史密曰：东征，伐南夷。廬、虎会杞夷、舟夷，翟，不折，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恶。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莱伯、夔，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父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铭文中的“廬”即莒，“长必”地名，一说在莱芜，一说在高密。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东征。南夷的莒、虎会同杞、舟等方国，犯上作乱。师俗率齐师，乡遂为左路，史密率部众，莱、夔国的军队为右路，合围长必，取得了胜利。

莒国在春秋前期和中期，曾入向、取杞、灭郕、伐鲁，表现其不弱的国力。它还能与齐国较量。《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载，公元前550年，“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莒人行成。”齐侯袭莒，“伤股而退”。再战，莒君亲临前线，击鼓进攻，俘获并杀掉了齐大夫杞梁，这也是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渊源：“春秋时齐大夫杞梁战死，其妻于城下大哭十日，城墙为之倒塌。待其夫下葬后，投水而死。”（刘向《列女传》）《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载，公元前520年，“齐北郭启帅师伐莒。莒子将战，苑羊牧之谏曰：‘齐帅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国不可怒也。’弗听，败齐师于寿余。齐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马灶如莒莅盟；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莒于是乎大恶其君。”意思是昭公二十二年，齐国的北郭启领兵进攻莒国。莒子将要迎战，苑羊牧之劝谏说：“齐国的元帅地位低下，他的要求不多，不如向他低头，大国是不能激怒的。”莒子不听，在寿余打败了齐军。《左传》襄公十八年，诸侯伐齐时晋范宣子说过：“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人。”可见莒国有兵车千乘以上，其兵力与鲁相当。

春秋时期，莒国附近的国君和贵族，包括齐国、鲁国之人。具体原因不一，多选择莒国避难之地。这也与莒国有较强实力，独特的地理环境有关。公元前684年，齐国灭谭，谭子逃亡莒国。公元前660年，鲁庆父作乱，失败后避难莒国。鲁人贿赂莒人交出庆父。庆父交给鲁人后，鲁自食其言，未送贿赂，引起莒国不满。公元前625年，齐王何投奔莒国。公元前574年，“（秋）齐高无咎出奔莒”。公元前488年，齐国夏逃亡莒国。最为著名的是：庄公八年，齐桓公为公子时，曾到莒国避难，留下“勿忘在莒”的典故。《吕氏春秋·直谏》记载：“齐桓公、管仲、鲍叔、宁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于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于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而居于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于不殆矣！’”

春秋初始，莒国虽然具有一定实力，但由于政局不稳和策略失当，丧失了发展的机遇，终春秋时代，不过是仅次于郑、卫的二、三流国家，始终处在齐、鲁、楚、越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它灭过向、灭郕，也避免不了大国的欺凌和侵扰，遭齐国侵伐五次（宣公十三年、襄公二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十九年、昭公二十二年），遭鲁国大的侵伐四次（僖公元年、宣公四年、昭公元年、昭公十年），其中，遭楚国侵伐次数不是很多，但打击很大。公元前596年，齐国军队攻打莒国，原因是莒国依靠晋国而不事奉齐国。公元前582年，《左传·成公九年》记载：“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

楚人曰：‘勿杀，吾归而俘。’莒人杀之。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郟，莒无备故也。”公元前549年，楚国军队护送齐国使节归齐，“遂伐莒，侵介根。”公元前541年，鲁国“季武子伐莒，取郟。”（《左传·昭公元年》）

莒国出于自身和平和安全考虑而不得不“结邻国之援”。仅《春秋》《左传》所记，会盟就达11次，会而不盟者也有21次之多。但弱国无外交，莒国没有当过一次盟主。总是仰人鼻息，看大国的眼色行事，做为附庸参与大国的行动。如《春秋·成公七年》莒国派军队参与了鲁国组织的晋、齐等国参与的救郑军事行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莒派民众参加晋国召集的修筑杞城活动，为“城杞”提供劳动力。在大国博弈之间，莒国首尾两端，《墨子·非攻》中说：“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顾栋高认为：“中间附于齐，更诉于晋、楚，致叔孙见执，意如为囚，兵端与春秋相始终，共公以后不复见矣。”（《春秋大事表》）

春秋后期，莒国外患频仍，丧师失地；内乱不已，进退失据；内外交困，而逐渐走向衰落。公元前609年，“莒纪公生太子仆，又生季佗，爱季佗而黜仆，且多行无礼于国。仆因国人以弑纪公。”（《左传·文公十八年》）莒国从此陷入长时间的內乱。公元前542年，莒犁比公废除已立太子展舆，“国人患之”，展舆利用国人攻打莒犁比公，杀死父亲自立为国君。展舆即位后，便夺去了公子们的俸禄。公子们到齐国动员去疾回来。秋季，齐国的公子鉏把去疾送回莒国，展舆逃亡到吴国。莒国内乱进一步加剧。前528年，莒著丘公卒，因废立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分裂，造成公子意恢被杀。莒国混乱不堪。内乱造成了莒国国纪不修，战备松弛。“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泱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左传·成公九年》）

内乱不仅造成了人才的流失，还导致了重臣的叛逃。前541年，“莒务娄、瞽胡及公子天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左传·昭公一》）公元前537年，莒国的大夫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三个自己的私邑投奔了鲁国。

民众对莒国统治者不仅是丧失了信心，而是痛恨入骨。公元前523年，齐国攻莒，莒共公逃亡到纪郟。齐人派孙书进攻纪郟。之前，莒国有个妇人，莒子虐杀了她的丈夫，成为寡妇的她已进入老年，寄居在纪郟，纺线搓绳丈量了城墙的高度然后保存起来。齐军到来，她把绳头扔到城下。有人把情况报告给孙书，孙书派部队在夜里攀绳登城，登上城的有60个人，绳子断了。齐军击鼓呐喊，城上的人也呐喊。莒共公害怕，打开西门逃跑了。齐国军队攻入纪郟城。

历史走到了此节点上，莒国不亡都对不起看客了。

《管子·小问》载：“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又载：“且臣观小国诸侯之不服者，唯莒。”

《晏子春秋·内篇问下》记载：“景公问晏子曰：‘当今之时，诸侯孰危？’晏子对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对曰：‘地侵于齐，货竭于晋，是以亡也。’”

《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公元前481年，“莒子狂卒”。时隔50年，公元前431年，《史记·楚世家》载：“楚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史记·六国年表》：“楚简王中元年，灭莒。”战国铜器中子化盘铭文曰：“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莒，用择其吉金，自作盍盍。”郭沫若释：“本铭‘中’字，余谓即楚简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简王中立。简王元年，北伐灭莒。’此言‘征莒’，事亦相合。”此器铭当是楚简王为太子时所作。简王在未即位前已开始征莒，公元前431年，楚国势力

扩张到淮上，灭蔡后，进而灭莒。《史记·六国年表》记载：齐宣公四十四年（公元前412年）齐伐鲁、莒及安阳，其时莒应属楚。后莒国的领土被齐国吞占，莒城被齐国设为五都南都。己姓之莒立国600余年，其中都计近300年。《汉书·地理志》谓莒国传“三十世为楚所灭”，杜预春秋释例云“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十一世兹平公方见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复见，四世楚灭之。”

从此，东夷之境再无东夷。留下来的只有莒的背影和莒成之为莒夷的轮廓：

一、己姓莒君无谥号，多以地名为号。《文献通考·封建考·莒》：“武王封兹舆期于莒。莒夷君无谥而有号。自兹舆期十一世至兹丕，始见于春秋。”杨伯俊在《春秋左传注》中指出：“莒是当时夷国，国君无谥号，以地名为号。如襄三十一年之黎比公、昭四年之著丘公、昭十四年之莒郊公、定四年之兹平公。昭十九年有莒共公，共亦非谥，而是地名。”杜预就指出，莒不属于诸夏，不行诸夏的谥号。

二、莒人居于东方，崇拜日神，具有明显的尚东情结。莒人墓葬，墓主首东是其特点。而人殉、狗殉则是殷商遗风，东夷人的传统习俗。莒南大店村发现2座春秋莒墓，1号墓殉葬10人，2号墓亦殉葬10人。其中，有的生前被支解或被处刖刑，显系被杀殉的奴隶。沂水刘家店子发现的两座莒国墓，其1号墓殉葬奴隶至少35—39人左右。发掘报告所指出：“刘家店子一、二号墓与莒南县大店两座墓的形制、葬俗都较近似。如都有椁室、器物库，都将礼、乐器置于器物库内，而将墓主随身佩带的玉石装饰品放在椁室内；都有数量较多的殉人，这在中原各国已经少见。”

三、《后汉·书东夷传》称：“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考古发现莒国之地音乐相当发达。1979年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出土陶质笛柄杯和陶质牛角形号角是两件乐器，是现已确认的在东夷地区发现最早的乐器，也是全国范围内发现最早的乐器之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春秋时期，莒国所出土乐器的特点是数量多，成批成套，制作精良。沂水刘家店子1号莒墓出土的两件罍于，为春秋中期制作，早于全国其他地区，莒县一带被专家认为是罍于的发源地。这也充分说明上古时期莒地就有着乐舞传统。同时，也佐证了东夷“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后汉书·东夷传序》）的事实。

四、《水经·沭水注》引《尸子》：“莒君（己姓）为鬼巫而国亡”。《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信巫鬼，重淫祀。”《汉书·郊祀志》中有：“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这两个国家地域不同却有着一种共同的信仰。旁证了楚、莒出于同源，有着某些血缘关系。可以确定楚人的祖先为颛顼之后的祝融。莒人出于颛顼似乎也争议不大，他们应是一个祖先。当然，由于崇信巫鬼，他们也有着相同的命运。

老照片“老大娘给炮兵指示目标”里的老大娘找到下落了

郑玉强



一张负载着岁月沧桑、记录着炮火硝烟，见证着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老照片，不知被多少有心人翻拍了多少遍，也不知被悬挂在多少家纪念馆里，仅在省内规模不等的大小纪念馆里几乎都能见到，且都配以不同战役的说明文字：在什么什么战役中，当地老大娘给炮兵指示目标……同一幅图片，见证了不下有七八次战役中指示目标吧。更不知被多少人拿来用以见证在战争年代本地老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拥戴和支持，表现军民鱼水情。久而久之，人们不禁疑惑，这幅照片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追根寻源，还照片的本来面目吧。

—

先从照片的作者说起。

这幅照片的拍摄者邹建东，是原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分社的摄影记者。当年，他冒着生命危险，在孟良崮战役的阻击战场上用莱卡相机拍下了这幅珍贵的照片。这幅图片所定格的，是1947年5月16日孟良崮战役正在进行时，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五师一部在青驼寺附近打阻击、炮击驻刘家河疃的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三师时的一幅画面。拍摄地点，无疑在蒙河以北的青驼寺境内。

孟良崮战役发起后，担任阻援任务的华野第二纵队由沂水以南进入界湖、张庄集、黄崖顶地区，阻击敌第七军等部，以保障“攻占营后庄、泉桥子一线，断敌第七十四师向青驼寺的退路，尔后有有力一部阻击敌第八十三师西援”的第八纵队侧翼安全，并策应第七纵队作战。

激烈的战斗已经打到第三天的上午。在战役外围，黄崖顶、青驼寺一线，急于增援的国民党部队发疯般地倾泻着猛烈的炮火，向二纵某部猛攻。这时，华野二纵炮兵团得到一份情报，说增援之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一团指挥所就驻在对面的刘家河疃村的一家粮店里。担负前线指挥的二纵五师参谋长李士怀随即命令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某炮兵连连长的施夫俊立即对这家粮店进行炮击。

施夫俊率炮兵连立即进入蒙河北的一条沟崖处。准备发射时，施夫俊却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目标的具体方位。原来，刘家河疃是个大村庄，3000多人口，占地面积很广，村西面还与卢家河疃、邢家河疃紧密相连；不熟悉街巷概况的人是很难一时找到这家粮店具体方位的。就在焦急万分的施夫俊束手无策时，一个精彩的瞬间出现了。这时，一位身着破衣、头发蓬松、满脸皱纹的老大娘来到施夫俊跟前，向他介绍了刘家河疃村这家粮店的地理方位。就在这时，邹健东摁下了相机快门，将这样一个精彩画面记录了下来，一瞬间变成了永恒：老大娘向炮兵指点目标。

摸清敌人的地理方位后，炮兵连只用了十几发炮弹就炸烂了国民党第八十三师第一团的指挥所，并将两座地堡一并摧毁，压制了国民党援军的火力，协同兄弟连队完成了阻击任务。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战事紧急，施夫俊没来得及询问这位大娘的姓名，自己和大娘也不知道上了记者的镜头。此后，这幅照片先后被《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等选用，都以《老大娘向解放军炮兵指点目标》为题被几百种报刊选用，被众多图书馆收藏。

邹健东1915年生于广东大埔县，1938年春参加新四军东进抗日，1946年在山东军区《华东画报》当摄影记者，1947年春在华东野战军（三野）新华社前线总分社当摄影记者，参加过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的采访。建国后在新华社摄影部当记者，重点采访拍摄中央领导的重大活动，1976年离休。著名作品有《我送亲人过大江》《占领南京总统府》《百万雄师过大江》等。几十年来邹健东拍摄了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照片，不仅被国家级的档案馆、博物馆和画报社刊用，有的还被传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甚广。为了表彰他在记录中国革命历史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88年中共军委向他颁发了二级功勋荣誉奖章。这是唯一获此殊荣的摄影工作者。2004年12月荣获文化部颁发的“造型艺术成就奖”。

二

再说照片的主人之一施夫俊。

1975年，时任兰州军区某师政委的施夫俊，在一次翻阅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战争摄影作品选集》时，无意中发现了这张图片，而上里面的人物正是自己。看着照片，不由勾起了积存在记忆深处的沉淀，想起近30年前的一段记忆深刻的往事。施夫俊眼观图片，浮想联翩，继而一连串的问题出现在脑海里：当年这位挺身而出的大娘叫啥名字，她现在在哪里？为此，施夫俊以《从一张历史照片想到的》为题，投书某报社，通过媒体向大众讲述了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想以此引起大家的关注，寻找这位大娘。但一年、两年……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音信。

2002年5月，临沂市举行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5周年暨国防公园奠基仪式，在兰州军区合肥干休所疗养的施夫俊应邀出席。在活动现场，施夫俊眼含热泪向与会嘉宾



照片的主人公之一，
原华东野战军某部炮
兵连连长施夫俊

介绍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沂南青驼大娘为炮兵指示目标的故事。但是，却说不清楚这位大娘叫什么名字，从而留下了一桩深深的遗憾。

当年的这位人民解放军炮兵连连长施夫俊，原名施厚聚，1924年9月出生于安徽庐江邱岗村，军政大学毕业，194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参加新四军四支队手枪团，历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战士，新四军二师四旅十团班长、号长，炮兵排长，原四旅炮兵连连长，原第二十一军炮兵团一营营长，原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三师炮兵团团长、师副参谋长，原第二十一军六十二师政委、副军长，兰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1983离休。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自由奖章（金质）、独立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等。

据施夫俊家人反映，2013年3月老人去世前夕，仍时常拿着照片念叨：大娘啊，您姓什名谁？您在哪里？您对革命有贡献啊！

白驹过隙，半盏流光。这么多年过去，人们经常见到的是一幅令人赞叹不已的图片，而照片上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大娘，却始终没有寻找到下落。

三

前几天，笔者在自家微信平台发了一篇文章，谈及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在孟良崮南部黄崖顶、青驼寺一线打阻击的华野二纵部队炮击“对面刘家河贻敌八十三师一团指挥所”，有一位不知名的老大娘主动给指点目标的事情，引起了读者的热情关注。青驼镇文化站站长孙延成与笔者联系，表示一定要深入访查，把这位老大娘的情况挖掘出来，把革命战争史上的这件动人的事迹弄清楚。

正巧，2019年5月30日，我在单位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参加老干部党支部学习日活动，副主任刘维常告诉我说，前几天所发“老大娘指点目标”的文章，里面提及的那位大娘已经找到下落了，是青驼镇王家圈人。原来，在今年四月份，他们就开始下乡村访查了。

访查的起因是，去年底沂南县委党校举办农村信息员培训班，青驼镇文化村负责人董传江的妻子王元梓参加了培训。在听革命传统报告的过程中，主讲人边讲述边辅以图片说明。其中展示的图片之一就是这幅“老大娘给炮兵指示目标”。王元梓看到后，马上触及了小时候的深刻记忆，感觉这件事儿怎么这么熟悉啊！小时候经常听奶

奶念叨，本家有一位叫刘玉的奶奶，在1947年有次“八路军”打刘家河疃时，曾给那些打炮的帮忙来着！培训结束，王元梓回家当即去了娘家王家圈村，找年已79岁高龄的父亲仔细询问，已久远的史实果真一如图片所示。

得知这一消息，县委党校副校长卢念华约了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维常，到青驼镇文化村和王家圈村进行走访调查，走访了王家圈村的王全恩（80岁）、王会恩（81岁）、王传厚（89岁），并实地察看了当年施夫俊炮兵阵地所在的村东北角的小沟崖。至此，才对当年随军记者邹健东用相机所定格的不朽瞬间有了一个详细真实的了解。

4月24日，卢校长和刘主任一起驱车来到青驼镇文化村，找到王元梓夫妇。然后赶往王家圈。在王全恩家里，卢校长拿出那张老照片给王全恩老人看。80岁的老人接过来一端详，就激动地说，没错，没错，这就是俺娘……话没说完，老人擦眼抹泪，哽咽起来……随后赶来的几位老人看了照片，也肯定地说，这不是刘玉是谁啊？！就是她啊！

据王家圈村几位老人讲，这张“老大娘给炮兵指示目标”的照片，里面的老大娘名字叫刘玉，娘家在刘家河疃村，18岁嫁到蒙河北岸的王家圈村王兴让为妻。刘玉个子不高，没缠足，头发也不握纂，留着齐头发，有时就用线绳束在脑后，正如图片的样子。她粗通笔墨，在村里经常帮邻居识字；思想比较进步，战争年代在村里担任妇救会长，开展筹集军粮、做布鞋等工作非常认真。由于她要求进步，参与共产党基层组织开展的活动比较积极，村里有些人就戏称她“区长”，意思是说就和区长一样，什么都管，什么都上心。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青驼寺、王家圈村一带成为双方交战的战场，村里人大部分都躲到映旗山里去了，而60多岁的刘玉大娘却挎了一个破篮子，在村庄附近转悠。看见解放军炮兵部队开过来，她就凑上前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蒙河南岸，距离有二里多路的刘家河疃村里就住着国民党八十三师一团，步枪机枪不时地打过来。当炮兵连长施夫俊在地图上找不到炮击目标的具体方位，焦急万分而束手无策时，刘玉大娘出现在施夫俊身边，指出了刘家河疃粮店的具体方位。也就在这不经意间，新华社前线分社的摄影记者留下了这精彩瞬间……

刘玉大娘的丈夫王兴让去世较早，只生了一个女儿，后嫁到邻村董家店子。1946年，刘玉收养了本村孤儿王全恩当儿子。王全恩1973年4月20日病故，享年88岁。

笔者认为，卢念华和刘维常两人寻访的几位村民对历史史实的回顾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这以前，一些有识之士根据照片的主人之一施夫俊提供的信息以及时代背景和原始资料就认定，这张老照片所反映的场景，就在青驼寺以东至陡沟村之间的这几个村子附近，只是照片上的老大娘由于时间久远，难以确定是谁。但是，可以肯定的也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偷换不了的证据是，这位大娘一定熟悉了解刘家河疃村的村庄构成和街巷方位，抑或就是刘家河疃人。再就是，在原始材料中早有记载：“敌八十三师第一团指挥所就在对面的刘家河疃村的粮店里”。说是“对面”，那炮兵立足点只能是在蒙河以北；如果说在董家店子以西，或在陡沟以东，那对于“炮击刘家河疃粮店”来说都是舍近求远了。所以说，只能是在蒙河沿岸的王家圈和陡沟村之间。除此之外，皆不符合当年的战时背景。必须清楚，这里发生的是孟良崮战役的外围阻击战，施夫俊所在部队在青驼寺、黄崖顶子一带阻击北上增援敌七十四师的八十三师，这些情节也决定了这张珍贵老照片里所定格的方位，就在刘家河疃村的对面——王家圈附近。至于照片中老大娘就是刘玉，相信这些已年逾耄耋的老人都经历过那段惊心动魄的硝烟炮火，印象深，记得牢，记忆不会错，认证有依据。

临沂师专记忆

杨东霞

因为写《费县，这个神奇的地方》这篇文章，写到了临沂师专。写到了当年师专、师专学生、师专的老师与师专娃，他们与费县的故事，那些扯不断、深深的，浓浓的魂牵梦绕的记忆与思念。

临沂师专，全称为“临沂师范专科学校”，是一所培养中学教师为主的学校，临沂大学的前身，最早就设在费县。那时的临沂师专，是临沂地区当然也是费县的最高学府。费县有了师专，是费县的幸运，使这里拥有更大的人才优势和更多的智力资源；师专设在费县，同样也是师专的幸运，东周时期的古鄆国，两千多年的古县，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也是师专成长的沃土，让它得到充足的文化滋养。

虽然生活在费县，工作也在费县，但是除了18岁时同学到费县做客，带他们到师专参观游览，拍了几张照片后，就没有再到过师专。想想很惊讶，这一晃，就快30年了，我居然快30年，没有再到师专的院子里走走看看。

这30年，也是师专搬离费县的30年。虽然无数次从学校门口、旁边经过，却没有一个理由让我想起，再走进师专。当写《费县，这个神奇的地方》时，涉及到临沂师专，发现没有合适的照片，才想到，我真的应该再到师专去转一圈了。

大年初三下午，和在师专长大现在临沂大学任教的韩其敏同学相约，一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临沂师专大门

走进往日的临沂师专校园。寒风刺骨，却无法阻挡我们追寻师专记忆的热情和脚步。

下面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师专校园走一走，看一看，向您讲一讲关于师专的故事。

临沂师专大门门口的“临沂师范专科学校”几个大字，还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1983年创办《临沂师专学报》时，制作学报封面，老师们到档案室找出了郭老的题字，信封内宣纸上除了题字“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之外，还题了一个“报”字，旁边用铅笔写着“学报请辑字用”。三四十年过去了，小故事仍带给他们很多感动。

后面的小山就是钟罗山。

学校门前的那条水渠，同学说，以前这里的水太清澈了，以前也没有这些石头边儿，坑坑洼洼，一点也不规则。学校大门旁边的白杨树，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当年很多的学子在树下读书，现在是一个市民休闲的场地。

一、最美的大学生校园

师专校园规划得非常工整，大门位于学校的正中心，正对着是学校的大礼堂。连接大门与大礼堂的道路，就是学校的中轴线。中轴线两边是教学区，路西是实验楼，实验楼北面依次是化学、外语、物理、体育、艺术五个系，皆平房。最西面是操场，操场的北面是学生的食堂和宿舍。路东是文史楼，中文系和政史系在这座楼上。数学系也在路东，与外语系相对，再东边是个土操场，以排球场地为主，兼放电影。学校的东北部是教职工生活区。动静分区，方便合理。

大门正对着一座山，这座山就是钟罗山，师专，就是坐落在这么一个依山临水的好地方。其敏特别给我介绍，大门东边的那棵木香树，木香花开的时候，整个校园都芳香弥漫。我说春天花开的时候，你一定告诉我过来看看。这棵木香树，也深植在师专毕业的嫂子心中。一次她问我，学校门口的那棵七里香可还在？我说，七里香不知道，但那里有一棵木香，长的很旺相，又高又圆，像个大花球。她说那就是七里香，一树花开，一园花香。我这才明白，不由想起了十六七岁时读的一首诗，席慕容的《七里香》：

溪水急着要流向海洋
浪潮却渴望重回土地

在绿树白花的篱前
曾那样轻易地挥手道别

而沧桑了二十年后
微风拂过时

我们的魂魄却夜夜归来
便化作满园的郁香

七里香，正如那十八九岁的年龄。在其敏的心中，七里香是她对春天的向往，在嫂子的记忆中，七里香是她的青春回忆，充满了温暖的美好的想象。估计很多师专的学子，都和她一样，在关于师专的记忆中，像席慕容诗中描述的那样，七里香那白色的小花，还散发着迷人的清香。

这座有海燕的楼房，是文史楼。我对文史楼的印象非常深刻，这也是师专比较

有特色的建筑之一。让我一下子想到了高尔基的那一篇《海燕》，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很喜欢海燕的励志形象。海燕有天高任鸟飞的寓意，也有迎接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的勇气。每当从这座楼旁边经过，海燕，会激励多少师专的学子，让性格坚强，让理想飞翔。

文史楼前的一条道路，路南曾经是我们经常来照相的花园。当时人根本就没有绿化、美化的概念，连冬青剑麻都没见过，师专就栽种了很多新奇的树，丁香、玉兰花、樱花等等，开着没有见过的非常美丽的花，那时，师专就已经成为一所花园式的学校。

现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小花园，里面有个紫藤花长廊，春天上面爬满盛开的紫藤花，一串串的垂下。紫藤是费县人非常喜欢种植的一种植物，花开漂亮，也有紫气东来之意。花园里还有一个曲水亭，北面的围墙上开了一个圆形的门，也是别有情趣，比以前更加整齐漂亮了。

这座漂亮的红楼，是当年师专的实验楼，也是我们要重点展现的一座石质的教学楼，它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景致不同，每一面都让你忍不住喜欢留恋。

实验楼的后面，比前面更好看。我们不知道这座楼房的设计师是谁，小时候我们不懂，但现在看着非常壮观。楼房是用料石垒砌而成，在当时的条件下，施工难度应该非常大，当时施工的石匠们，不知费了多少辛苦与心血，才有这座建筑的完美呈现。这样的设计，堪称经典。

同学说，实验楼后面的这个花园，春天的时候，花开得特别鲜艳，到时真的要来看看。

在实验楼的西北角，有一棵苦楝树，这里我们呆了好长时间，拍了好多的照片。这个地方一下子把我们拉到了30年前，那些青葱岁月，那些黑白的照片，那些朝气蓬勃，自信阳光的笑脸。

红色的实验楼，那些岁月不改的沧桑与从容，居然让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心生膜拜，为这座红楼的建设者，为在这里教书的老师和在这里学习的学生，一年一年，这里已经有了五六十年的文化沉淀。我和同学一致认为，一个有老建筑，有大树的地方，才可以称为大学，才可以谈传统，谈传承，谈文化，才最有大学的样子。

二、师专的老师和学生们

师专的老师们大多都出自国内的名校，来自五湖四海，但是他们扎根沂蒙，安家立业，无怨无悔。他们娶费县的媳妇，嫁费县的儿郎，与这个地方深度相融，骨肉相连。

师专的老师淡泊名利，一心治学，充分体现了陶行知先生对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要求，也为这些未来的教师做好了榜样。在师专老师的教育指导下，学生在这里安心的学习，当时，临沂师专是全省专升本最多的学校。现在临沂大学的年轻教师，都非常佩服当年老教师甘守清贫、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精神。

对于刚刚改革开放走进师专的那些学生来说，家庭并不宽裕，吃饭也非常简单。师专，那可是能让他们天天吃上馒头的地方，而且是馒头就菜，早上偶尔有油条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时期，又向往新的活力，热情澎湃又对异性遮遮掩掩的假象，就这样走过了一个羞涩的青葱岁月。如今看到熟悉的情景，忍不住会潮湿双眼，心生无限的惆怅。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师专毕业班学生，到县城的三关小学和一中、十六中（实验中学的前身）实习，当时觉得他们已经很大很大，现在想来，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小青



年。我还记得他们胸前佩戴着白底红色的写着“临沂师专”四个字的校徽，他们是我们的实习老师，却不像我们的老师这么严厉，非常有亲和力，让我们非常喜欢。每年都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知识，留下生动的故事。记得在初一的时候，也就是1985年春天，我们班来了一位实习的女老师，好像是外语系的学生，带着眼镜，胖胖的，留着短发，教我们唱最流行的歌曲《熊猫咪咪》，不知她看到这篇文章后，是否能想起这段往事。

这里走出的师专生，也把费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看到费县来的人，两眼放光，说起费县，音量也不由自主的增大，人一下子变得精神，变得年轻。他们会谈起当年一起爬钟罗山，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去看费县百货大楼里的美女售货员，看群芳照相馆橱窗里的大幅照片。因为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因为交通很不便，他们把费县城走了不知多少遍。所以他们的记忆里，他们的青春里，塞的满满都是费县。

严谨的教风，扎实的学风，影响了一代师专生，也影响了一代沂蒙人的工作作风，这些师专生，大多都成为沂蒙老区各个行业的佼佼者，有的成为优秀的教师，有的成为主政一方的领导。现在看来，他们仍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的魄力和成就让人钦佩。可以毫不谦虚的说，这些师专生，他们挑起了沂蒙老区，挑起了家乡发展和建设的大梁，做出了突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师专家属院的故事

从大礼堂向东，则进入了教职工的生活区。我的很多同学，家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我要说一说师专老师的家属和孩子们。

师专老师的家属，很多在费县的中小学任教。当时我在西关小学上学，我的数学老师王安华，是南方口音，非常的和蔼可亲。教音乐的谢爱东老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时髦的衣服，她本身就像音乐一样熏陶感染着我们。我们的姚宗萍校长也是费县的姑娘、师专人的媳妇，她的思路清晰简洁，做事果断干脆，在师专的生活，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和思路，影响着他们的工作。大学的文化，先进的教学思想，就这样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途径向费县的中学、小学流淌，共同铸造着费县教育的辉煌。费县的孩子们，真的是受益匪浅。



师专礼堂

我的中学、小学同学有很多师专老师的孩子，这些“师专娃”，他们很多都已经是土生土长的费县人。因为他们了解师专，也了解了课本之外的很多东西。师专的同学，除了个别的调皮捣蛋，学习普遍的好，可能与他们的父母是大学教师，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关。他们的见识，他们的修养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当地的同学。

1991年，师专迁往临沂城。一旦离开，费县，就成为他们共同的家乡，成为他们共同的记忆。曾经在师专生活过的陈孚同学，形容他对费县、对老师专的感情是终身难忘，魂绕梦牵。可能在他们的梦里，还常常见到学校门口清清的流水，常常去爬钟罗山。

在报社当编辑的“师专娃”敏敏，这样回忆她在老校区的生活：儿时，实验楼前是孩子们乘校车的集合点，向华姥姥的冷饮摊永远都散发着迷人的桔子味，木香花的春天里跟解放军叔叔的合影笑得比花还灿烂，土操场上露天电影爸妈军大衣好温暖，门前的水渠里河蚌比巴掌大，食堂里跳马和馒头可以同时存在，五湖四海的叔叔阿姨的口音，形成了只有师专人才听懂的独特语言。石头房子是我们好多师专娃出生的地方，想念房爷爷家的葡萄、桂花、防震床还有钟罗山上的酸枣和地瓜秧……

四、师专与费县

临沂师专1941年建校，办学之路非常曲折，停停办办，几次易名，最终在费县这个地方，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与发展。

1966年，临沂地区建立半工半读师范专科学校，校址定在费县城北。后与山东省教育干校合并，成为山东省临沂师范专科学校。1991年学校搬迁至临沂城，原校址成为费县师范的校区，后费县师范并入临沂大学，现为临沂大学费县校区。

其实，最初学校选址并不是在费县。那个时候，建这么一所学校，地方政府要跟上服务，会增加很多负担。后来和费县谈这个项目，当时费县的领导比较开明，接纳了这个学校。在钟罗山下建校，当时这里有一个大苹果园，便于半工半读。很多老师专生已经白发苍苍，还记得边学习，边劳动的情景。

现在，很多大学都提出服务地方理念，开始着手相关方面的工作。其实，大学服务地方，临沂师专早就做到了。临沂师专是开放式办学，与费县的深度融合，紧密相连，体现在方方面面。

临沂师专是县城的一部分，校园是费县人的公园，可以随便进出，可以进去游览观赏，拍照留念。师专的操场，也是情侣们人约黄昏后的地方。师专的澡堂，对社会公开，给费县人提供方便。师专的幼儿园，招收附近居民的孩子。总之，师专，是临沂地区人的师专，也是费县人的师专；费县，是费县人的家乡，也是师专人的第二故乡。

虽然是所大学，但师专没有高高在上，时刻密切关注费县的发展，参与费县的建设。对费县，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起着积极的引领、推动作用。费县人对师专，不仅是接纳，更是始终保持一种崇敬和尊重，那也是对文化对教育重视的体现。

1986年，师专第一次举办夏令营，其实也就是功课补习班，主要是给师专老师的孩子上课，老师全部是系主任一级的教授，但并不排斥费县的孩子，只要想去上，随便来，和师专的孩子一样待遇，一视同仁。我当时上初二，学习一点也不开窍，滑落到班级的第四五十名了，很无奈，也很迷茫。在师专夏令营，听这里的老师讲课，不知怎么，功课一下子变得简单，人也变得聪明，几次考试成绩，不仅及格而且很优秀，那一年我不仅补上了功课，更补回了信心。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一位给我们上课的化学系老师的模样。估计，现在的

孩子，也再难有这样的运气，请大学的系主任，请知名教授，给一群水平参差不齐的初中生补习功课。30多年过去了，那些老师早已退休，但我真希望有机会，能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师专对费县的文化影响也是非常深远，他们对费县历史文化的考证，至今留在《费县志》中，仍然是研究费县历史的重要参考。费县有这样一批文化人，他们不计报酬，不辞辛苦，自觉自愿，挖掘整理传承费县文化。现在想来，这是不是也有老师专精神的影响与留存？造就了这样一批人，这样执着的治学精神，这么多丰富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独特的“费县现象”。

五、师专精神的保护与传承

师专的校园里，最多的树有两种，一是雪松，一是水杉，一个四季常青，一个是挺拔向上。用树的精神，培育人的精神。

校园保留着很多高大的雪松，许多雪松枝条都已经沉甸甸地匍匐在地，仍然茁壮成长，犹如学校的文化，已经是硕果累累。让人感到校园格外的宁静，文化特别厚重，大学好像就应该这个样子，有很多古树，有很多老房子，这样才是一个治学的环境。

临沂大学，建校已经78年了。费县这个校园，也已经走过了五六十个春秋，它这才长成了大学的模样，有了属于它的文化底蕴，有了它的魅力和精神。大学，与沂蒙的历史同频共振，与沂蒙人同呼吸共命运，是一所根植于沂蒙大地，为地方办学，为地方奉献的学校。可以说，在临沂，哪座大学在它面前，都要肃然起敬。

这模样，这底蕴，这精神，非一朝一夕可造，非一年两年可成，这是五六十年的岁月沉淀与文化积累，是一辈一辈的师专人的薪火相传，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出，才有了今天的气质与辉煌。

临沂师专与费县的缘分，一旦结下，情深意厚，绵延不断。临沂师专的不断发展壮大，也丰富了费县文化的内涵，增添了更多的深度与厚度。正是因为费县有这种重文重教的传统，有宽容厚道的情怀，经过多方努力，另一所高校——青岛理工大学也落户费县。谨以此文，向在这个大学校园里工作过，为了沂蒙老区教育事业，默默耕耘老师们致敬！向这里走出，为家乡奉献青春和力量的师专生致敬！向保护爱护建设这座美丽校园的所有人致敬！

“沂蒙山上好风光”之一——

瞭阳崮

公丕成

瞭阳崮山寨坐落在蒙阴县野店镇东南瞭阳崮顶上，崮顶雄峙且处在群山之中，每逢日出，早见太阳，故名瞭阳崮。该崮“东列华盖，南纵文峰，西望岱山，北控浩轴，四周拱翠，仙灵宅窟”。崮海拔430.8米，东西长约1000米，南北宽约500米；崮顶呈隆起状，刀削似的峭壁环其四周，悬崖30多米高，唯有东西两侧陡峭山道可攀，亦称东门、西门。

据瞭阳崮碑和史料考证，瞭阳崮上原有三官庙、玉皇庙、天仙圣母庙、碧霞元君殿、王灵官庙等。据《包氏族谱》重修天仙圣母行宫记载：“上东门西山瞭阳崮巅，旧有天仙圣母石行宫，其创建之日莫可稽考；一修于明隆庆五年（1571），再修于崇祯五年（1632）。康熙四十一年（1702）由公德明、包士吉、延羽客、赵一旺、沈阳元重修。包延礼《重修玉皇殿记》载：“上东门西瞭阳崮，旧有玉皇殿，其创也有年，庙貌久既倾圮，神像因已剥落，自乾



隆辛未（1751）里中善人某某欲为重修，乃岁遇荒欠，其中寝抑越有年，至丙戌（1766）始有公廷瑚、公立等重修至丁亥（1767）、戊子（1768）秋完成。包亦整《三元碑记》载：“蒙阴之东北，山名‘辽阳固’，清康熙甲寅（1674）有羽客黄复存、阚阳勤创立三官庙于山椒。”《碧霞元君祠》碑载：清乾隆四十年（1775）重修。庙宇历明、清多次修葺，固上藤萝缠绕，松柏锁春；山鸡啼鸣，云雾飘渺。庙宇在民国时期被毁，现只存残碑四块。由于有碧霞元君殿，周围蒙阴、平邑、沂水、沂南、淄川等地商贾，百姓不愿去泰山祈福者，便取近到瞭阳固求福祷告。每逢农历正月十五、十月十五庙会，慕名来到瞭阳固焚香祈福者，络绎不绝，有“第二泰山”之誉。

瞭阳固山寨始建于元代。据《东蒙公氏族谱·公海传》记载：“元末兵荒，邑有山寨十八，皆悬崖峭壁，四方多投此避乱。豪强因以兼并，互相残杀。上东门左右寨，众推公为主。治兵力、农刑，赏无私。寇至聚保，寇散耕种，一方赖焉”。文中“上东门左右寨”是指安平固山寨和瞭阳固山寨；清末民初，适逢乱世，盗贼猖獗，生灵涂炭。固周边黎民百姓，为避匪患，上山筑寨。从此，瞭阳固山寨就不再平静，上演了一场场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狭小的山寨里，居住着200余户2000多人，山寨主事公玉东带领寨民垒墙筑堡，以御匪寇。固东西南北各有双层石碉楼，固四周筑两米高石围墙，石屋依墙而建；山寨分内外寨，石碾、石磨、石臼、石井、储水池等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山寨东、西两门要塞，仅容纳一人出入，山门旁筑有双层石碉楼，并设有轱辘，以运送粮食物资。

《蒙阴县志》载：民国元年（1912）夏，土匪（亦叫光棍）自九女关入侵蒙阴县，从此，匪患蔓延，人民陷入民不聊生、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这段悲惨历史长达22年，蒙阴人称这段历史叫“光棍年”。

1925年瞭阳固周边百姓为避匪患，上山筑寨；1927年土匪泉聚蒙阴，杀人放火，村庄十有九空，百姓纷纷逃至瞭阳固避难；1929年3月24日，瞭阳固山寨突发大火，烧毁草房200余间；1933年正月十二日夜，寨民还沉浸在节日气氛中，因麻痹松懈，钩子（内奸）牵线，土匪从固北攀绳而上，猝不及防的寨民哄涌至东门狭窄山口，相互践踏至死者，跳崖自尽者，被枪杀者不计其数。是年春，鲁南民团将盘聚于瞭阳固上的土匪一举歼灭。望着那突起的瞭阳固雄峰、灰白苍凉的石岩峭壁；脚踏着那斑驳黝黑的石块和被荆棘淹没的曲径小道；抚摸着那残存的石碑、石碾、石墙，瞭阳固山寨那被历史淹没的沧桑，如今只剩下残缺的记忆。

如今，为保护开发瞭阳固山寨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世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瞭阳固山前山后三个自然村群众自发组织，对瞭阳固山寨文化进行挖掘、修复，打通了去瞭阳固西门的道路。沿西门登上固顶，环顾四周，安平固、类锦山、云头固、晨云固尽收眼底；迎面扑来的山风，使你心旷神怡，群山拥抱着河流、村庄，如诗如画；虽然瞭阳固的悲壮历史已融入在历史长河之中，瞭阳固凝重的历史文化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我的“油画生涯”

王沂东

我一点都不高雅，就是特别喜欢漂亮的女孩——喜欢好看的东西，这个是真实的。好看，对我就有刺激，我就想画，但不是说漂亮的我都画，我只寻求我需要的那种美，希望这个形象能帮助我。

——王沂东

我和油画的缘分，始于一个特殊的年代。

1967年的一天，我从学校里放学回家，路过父亲所在部队的大门口时，看见一些战士正在大门里边不远的地方垒一堵高墙。高墙当仁不让地占据着路的中央部位，处于最显眼的地方。大约半个月后，一位当时在驻地部队中被公认的“大画家”来了，他在那面墙上用一些特殊的颜料画了一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被称为“献忠心”。后来我发现，几乎每个单位的大门里边都迎面矗立着这么一面高墙，上面画的是同一个人，高大、魁伟、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对画上的人物，每个中国人都一样熟悉，让我感到惊奇的，是那种颜料所形成的效果，如此神奇，如此动人，简直美轮美奂！对于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看到如此逼真的画面，真不知是因为颜料的功能还是因为画家的技能。

这个看似很普通的作品，当时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后来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在那面高墙前面久久驻足，不肯离开。就是那时，我听周围的人说，这种画叫油画，不仅好看，而且不怕雨淋、不怕风吹、不怕太阳晒。欣赏着那位大画家用神奇的颜料画出来的神奇的画，我心驰神往，倾心仰慕，有意为之。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计划我自己的“油画”了。父亲得知我有心学习油画，非常支持。无奈当时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没有学习的条件，再说，山东临沂是个小城，那里找不到我该用的书籍和颜料。为了满足我的要求，父亲特意去了一趟省城，给我买了一些颜料。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当时油画颜料的种类真是少得可怜，而对于当时的我，已经是相当奢侈了。看着一堆五颜六色的颜料，我感到一种温暖，一种幸福，想一想我即将要用这些颜料创造人物，这比亲眼见到毛主席还要幸福——当时谁如果能见到他，被认为是平生最大的荣耀！

我的第一张油画是画在自家白墙上的。当时，父母上班去了，我迫不及待地开始我的创作。我必须这样“先斩后奏”，如果事前告诉父母，他们也许不会同意，至少母亲不会允许我在墙上胡涂乱抹。我学着那位画家叔叔的样子，先在画报上的毛主席像上打了许多小格子，然后在墙壁上按一定比例画上同样多的格子，放大后，我开始起轮廓，然后上色……当时我以为，这种画只能画在墙上，不知道还有画布，因为那位画家叔叔就是画在墙壁上的。

我的第一幅油画的“诞生”，引来了很多参观者，他们都是我的邻居。我猜想，一定是我父亲告诉那些人，说他的儿子如何了不起，能在墙上画伟人像了。在那个年代，大多数青少年都在外边冲冲杀杀“闹革命”，如果谁家孩子学会一门艺术，是很难得的。在那之前，我虽然没画过油画，但因为爱好美术，已经有了几年胡涂乱抹的经验。第一次画油画，色彩的运用水平可想而知，但我估计，模仿得也还可以，如果有重大瑕疵，当时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父母也不敢在外人面前炫耀。

后来，我就在自己家里那间不大的房子里开始了我的油画创作，到处画满了我的作品，父母就是我的“粉丝”。父母的赞许，给了我极大的成就感，也满足了我的虚

诗画赏析

荣心。那是一段充满暖色的岁月，油画让我远离外边的动荡，我也因此逐渐接触艺术的门槛，并且与油画一起长大。后来，我进了深山里的一家工厂，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我的工作很枯燥，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工厂里也有一些宣传活动，比如画毛主席像，比如画宣传画。每当我和颜料亲密接触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平静，甚至感到很过瘾。

16岁那年，一次偶然的机，我考上了山东艺术学校，成为一名准文艺工作者。在我的课程中，就有我向往的油画课。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因为色彩总能让我激动。虽然油画课的课时不是很多，但已足够让我高兴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过：一个人如果能将自己的职业和兴趣结合一致，是非常幸福的。进入山东艺术学校并从此靠近了油画，是生活给予我的又一次美好机遇。再后来，我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一名油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由学生变成了教师。在那段日子里，我虽然也画过一些作品，但还是一位美术教育工作者，所有创作都是业余的。直到2004年，我被调入北京画院，才算成为一名专业的油画工作者。

许多艺术评论家和油画爱好者一直关注我的作品，写了不少文章，让我从中得到很多教益，我心存感激。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我的作品其实就是我要说的话。我有心创造一个模糊的情感世界，一种用油画语言建立起来的场景。这种语言已经被历史长河中无数艺术大家所证明：那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文艺门类的艺术语言，按照这种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形象逻辑，油画拥有一个极大的表现空间，并且因此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我希望，我所表达的情感，你我都曾经有过。我要借助油画中的人物和环境表





达一种情感——或是在兴高采烈中隐含着一点忧伤，或是在平静的气氛中潜藏着一丝思念，或是在一块感情奔放的红色里流露出某种程度的不安，或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压抑着的一份凄凉……我渴望以最简单的色彩和最朴素的语言，精确地表达这些感受和感情。我希望每一位关心我作品的朋友都能以自己的经历为背景，比较容易地走进我所创造的世界，并且因为我的作品而遥感共鸣。我坚信，美好的事物是需要共享的，也是可以共享的。大家都是社会的一员，虽然以独特的个体而存在，但在人性和审美上是相近的、可以共通的。如果您感受到我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向往、赞美和忧虑，您就是我的知音。

一切都在变化，我如此，我的画也如此。不知道您是否在我的作品中感受到了我的风格的渐变。我总是尝试着去吸收一切对完善画面有用的艺术营养，这些营养可能来自其他艺术门类，也可能来自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更多的则来自生活的启发、变化与冲突。这些营养对我的作品中那些不断出现的新模样，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我的作品的变化是自然的一就像我的年龄增长那么自然。年龄，或者说时间，给予我经验、领悟和感动，我的人生和我的油画都得益于此。

从一个毛孩子大胆地把颜料投放在白墙上开始，我就和油画结下了不解之缘。算起来，迄今为止，我的“油画生涯”已经40年了！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白驹过隙，真是太快了！在我对油画这门艺术刚刚有所感悟的时候，却不知如何说起——

语言和色彩确实不是同一个东西。我想，对于我一个热爱油画、一辈子从事油画创作的人来说，最朴实、最可靠、最真诚的表达只能是：不断学习，好好画画。

2000年：建设中的临沂人民广场

本 编

临沂人民广场位于临沂市老城区中心位置，东临沂蒙路，西至新华路，南依银雀山路，北靠红旗路。东西长670米，南北宽320米，占地面积21.6公顷，可同时容纳三四万人游憩，是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广场。广场以“蒙山沂水，文韬武略”为主题设计，充分展现了“蒙山沂水”的自然特色和“文韬武略”的历史文化特点。

临沂人民广场于2000年2月16日开工建设，在临沂人民广场建设前，八一路与新华路之间是农校，八一路与沂蒙路之间是部队和土产公司，以及曲曲折折的巷子，泥泥泞泞的小道和杂乱的平房组成的居民区。

2001年临沂人民广场竣工，广场中央的“山高水长”雕塑成了临沂的标志性建筑，人民广场更是成了临沂的地标，也是临沂人的“城市会客厅”。



建设中的人民广场全景



拆迁中的人民广场



广场东南角国安大厦平移



广场雕塑“山高水长”在建设中

鲍宅山凤凰画像

李遵刚

鲍宅山凤凰画像

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方向，有一组向阳面仰倾的裸岩，裸岩上刻有一组凤凰图像，并有附刻文字。沂南县之名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真正确立版图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裸岩凤凰石刻像所在的山系，明清时期称之为鲍宅山。因此，明清时期及现代论及这组裸岩凤凰石刻像的专著或文章，大都称之为“鲍宅山凤凰画像”或“鲍宅山凤凰石刻”。

画像内容

这组裸岩中有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风”“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显出古朴的原始趣味。

凤凰的起源约在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凤纹”出土于湖南洪江市高庙遗址，距今约7400年。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出土的象牙骨器上，也有双鸟纹的雕刻形象，距今约6700年。

在较早的先秦文献中，凤凰是作为一种实有的瑞鸟出现的。在先秦文献中，凤凰也记载为鸾凤，并且鸾与凤是成对出现的两种瑞鸟的不同名称。《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有鸟焉，其形如鹤……名曰凤皇。……是鸟也，自饮自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还记载：“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五彩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

秦汉以后，凤凰开始被神化成一种灵异之鸟。如《汉书·郊祀志》记载：“上自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集祿祠，于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乃下诏赦天下。后间岁，凤凰、神爵、甘露降集京师，赦天下。其冬，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秦汉史籍中关于凤凰出现的记载，都是以祥瑞出现的，其中不乏地方官员及方士投上之好的附会之说。

袁炼拓传

鲍宅山凤凰画像备受晚清、民国及当代学者的关注，近代美术史论者也多提及此刻画像。鲍宅山凤凰画像是什么时候发现并以拓片形式流传于世的，尚没有明确说法。但有资料证明最晚是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由沂水县进士袁炼访得后拓赏而传播于世的。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记载：“汉东安王钦元刻石题字（又名凤凰刻石），隶书，分三纸拓。一粗刻凤凰画，左上刻“凤凰”二字，一刻二小凤凰，左上刻“三月七成”，又大字“东安王钦元”，另附有一“元”字，下似“康”字之上首。道光廿四年袁冶池于沂水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按：元康年号，汉、晋皆有。由题字看，应为晋元康）”张彦生，1901年生于河北吴桥县，1915年到北京琉璃厂隶古斋碑帖店学徒。他在隶古斋学会了拓、裱及收售碑帖等业务，同时也有机会先后走访了京城著名的收藏鉴赏碑帖的专家，因而鉴别碑帖真伪及碑帖的传世知识大有长进。1931年，他脱离隶古斋，借用庆云堂字号的名义独立经营碑帖店。解放后被聘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顾问、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他将一生所见善本碑帖加以整理编撰，定名《善本碑帖录》，198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袁炼，字冶池，清代沂水县袁家庄（今沂水县许家湖镇袁家庄）人。袁家是沂水县“高刘袁黄”四大望族之一，袁炼与其长子袁振瀛分别考取嘉庆辛未（1811）和道光己丑（1829）进士，俗称父子进士。袁炼勅授文林郎，官历国子监助教，奉天府新民厅抚民同知。袁家庄与鲍宅山凤凰刻石处直线距离不足18公里，他对鲍宅山当早有耳闻。道光八年（1828），沂水县南乡刘家店子（今沂南县大庄镇刘家店子村）23岁的刘像久应乡试未果，到袁家庄附馆，师从已中举待考进士的袁炼。袁炼从刘家口中得知鲍宅山一带的文化故事也是有可能的。可以说，袁炼是发现并拓传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第一人。

许瀚收藏

许瀚，字印林，室名攀古小庐，山东省日照市虎山镇大河坞村人，生于清嘉庆二年（1797），卒于同治五年（1866），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清代杰出的朴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和书法家。龚自珍盛称其为人，其《己亥杂诗》云：“北方学者君第一，江左所闻君毕闻；土厚水深词气重，烦君他日定吾文。”龚自珍不轻许人者，对许瀚推挹备至，足见许瀚的学识非同一般。许瀚一生致力于学问，研究考据之学，搜辑金石碑版不遗余力。他每得到一件金石文物，必在第一时间对这些藏品的真伪、铭文、器形等进行鉴赏考证，为其定名，并即兴写下自己的收藏体会，写下自己考证考释的结论，或者写一些批注题跋之类的文字。道光二十四年（1844），许瀚任沂州府琅琊书院山长，暇时在境内访碑。在沂州两年，所获新碑拓本极多，均作跋语，有《沂州石刻题跋》三十种。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六月十四日，许瀚觅得鲍宅山凤凰画像拓片及东安王钦元题字，当时认定为“刘宋”时期之作。许瀚曾师从沂水进士袁炼，师生之谊甚密切，多年后还经常有书信往来。道光二十四年，袁炼在鲍宅山访得凤凰画像。同年，许瀚任沂州府琅琊书院山长时得到凤凰画像及东安王钦元题字，孰先孰后难以定论，但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是可能的。特别是道光二十四年时许瀚已是颇有成就的金石收藏和研究家了，又是刻意专访琅琊境内碑刻而得凤凰画像及题字，许瀚在传播鲍宅山凤凰画像及题字方面的贡献可能更大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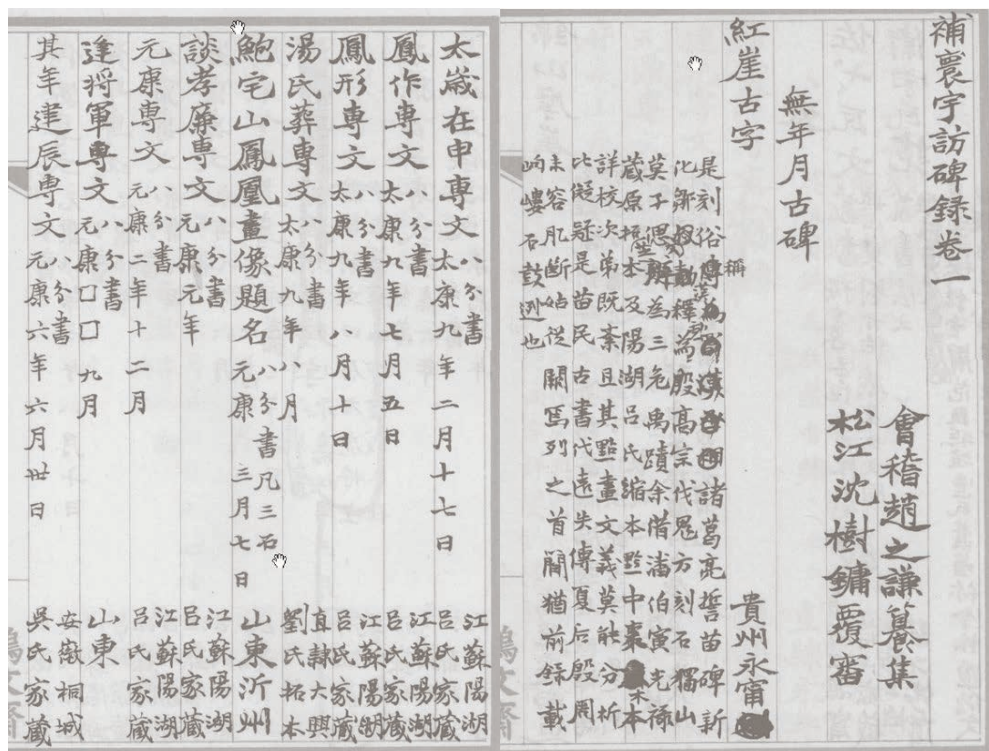
名家著录

记载鲍宅山凤凰画像的金石专辑，目前见到最早的是清人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赵之谦，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笏叔，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赵之谦所著《补寰宇访碑录》，成书于同治三年（1864），卷一收录了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注明：“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名。八分书。凡三石。元康，三月七日。山东沂州。”

张德容《金石聚》收录了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张德容，名谷，字德容，号松坪，衢州（今浙江衢县）人，清咸丰二年（1852）举人，两度出任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府。张德容是晚清大藏家，收藏以金石碑帖为主，并以藏宋拓《石门颂》为世人惊叹。随着藏品的积累和时机的成熟，1872年在岳州任上，他完成了《金石聚》十六卷，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收录其中。《金石聚》每卷碑目之下，前人著录悉载其名，碑石存于何地及出土年月、何人访得，均有详载，伪造者也加以考辨订正，考释极为详尽。所以序者、跋者等金石学家对他的著述方式都非常肯定。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卷二“分变第五”记载：“《金石聚》有《凤凰画像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

汪鋈《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详细地记述了鲍宅山凤凰画像内容、样式和尺幅。

《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成书于光绪元年（1875），汪鋈以《沂州府画像题字》为题目记曰：“三石高一尺七寸，广一尺五寸，下圆削仅七寸；次高与前石同，广一尺六寸；第三行高四寸，广三寸。右第一石画一凤形，八分书凤皇二字，径二寸余；第二石画一凤形较小，八分书两行，文曰：‘三月七日风’。风疑是凤字；又一行刻‘东安王钦元’五字，又一小石刻一‘元’字，下不可辨。玩其书势与与建初大吉买山券同定位东汉初物无疑。道光丙午（1846）日照许孝廉瀚所获，今在沂州府。”汪鋈，字研山，斋名十二砚斋，博雅好古，精于金石，工诗文，尤以书画知名。汪鋈精通金



石，《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的记载是严谨而可信的。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也记载了鲍宅山凤凰刻石。陆增祥，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少通六书，好学博览，精于金石学。《八琼室金石补正》是他积毕生之精力，一再增改而成的集金石学大成的巨著。书稿写成后未能刻印，直到1925年才由刘氏希古楼刊行问世。《补正》所收金石文字资料之丰富，大大超过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著作，所收石刻和其他器物铭文多达3500多种，其卷二亦仅录西汉刻石数种，沂南《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即列其一。陆增祥记载：“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拓本三纸，一高八寸八分，广四寸五分，二字字径一寸六七分；一高二尺三寸五分，广二尺。画麟凤各一。相向左上方题字一行五字，字径寸余，再左又题一行，亦五字，字径四寸许；一高二尺六寸，广二尺二寸。画一凤大倍于前。左方题二字，一径四寸，一径二寸，均分书，在兰山。右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在兰山摩崖。工人省纸，分拓。高广位置均不得详。姑就所见录之。赵勃叔《补访碑录》作元康。张松坪太守以为元狩。审视石本似“凤”字。三月七日下一字不可识，疑是‘成’或即‘凤’字。按：《汉书·昭帝纪》：始元三年冬十月，凤凰集东海，遣使者祠其处，七年八月改元‘元凤’。应劭曰：三年中凤凰比下东海，海西乐郡于是以冠元焉。画像之作，其在斯时欤？”陆氏治学严谨，不但尽力搜辑补充前人专著《萃编》之所缺，而且多以较好的拓本来校订《萃编》之误。书中凡例规定：“必目验墨本，不敢据金石家及友人录寄之文。”陆增祥根据刻字所记日期，认定为西汉刻石。但陆增祥所记“鲍宅山凤凰画像题字在兰山摩崖”和“在兰山”，实是误将兰山与沂州等同，岂不知兰山县是沂州府附郭，兰山代表不了沂州府，更代表不了沂水县。文字表达不确，实质内涵无误。

鲁迅收藏

鲁迅曾收藏了鲍宅山凤凰画像拓片。鲁迅从1915年开始搜集并研究包括汉画像在内的金石拓片，直至他去世，时间长达20年。鲁迅对汉画像的搜集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前期侧重点为山东汉画像，后期侧重点为河南南阳汉画像。1916年7月16日，鲁迅觅得到了三幅鲍宅山凤凰画像原拓。后来，他在为凤凰画像写的说明中认定：“凤凰象摩崖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夕’，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在第一幅原拓上，鲁迅还钤上了“周树所藏”印章。

鲁迅对汉画像艺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有意将所藏汉画像的珍品集印出版。但在收到最后一批南阳汉画像拓片的两个月后，便与世长辞了，因而选印汉画像计划未能得以完成。1986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编辑的《鲁迅藏汉画像》。《鲁迅藏汉画像》中收录了这两幅画像，根据鲁迅原有记录，图190把有“东安王钦元”字样的一副标为“沂水画像（鲍宅山）”，图192将有“凤皇”字样的一副标为“临淄画像”。

新中国建立以来，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简史》、安作璋《山东通史·秦汉卷》、荣宝斋出版社《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何应辉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刻石卷》、华人德主编《中国书法史·秦汉卷》、河南美术出版社《汉碑全集》等，或以目录形式或以原拓图片形式收录了鲍宅山凤凰画像及题字。

洋人青睐

在杭州“平湖秋月”景区内，有一座不起眼的楼房，叫哈同花园。这是一处既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也不是省、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清末楼房。现在这里是西泠书画院的院址，偶尔会举行一些书画展。但这座清末楼房与鲍宅山凤凰画像有关。

哈同是犹太人，全名叫雪拉斯·阿隆·哈同，出生在伊拉克巴格达，跟随其父经商到印度孟买后，入英国籍。1872年，哈同到了香港，第二年便到了上海滩。到了上海后，为迎合中国文化，自取别名“明智居士”。哈同发达后，在上海建起了占地200亩的花园别墅。光绪三十年（1904），哈同又从北洋政府购得了杭州孤山路附近一小块地皮，继而通过贿赂地方政府、侵占左右等方式扩大地盘，建设自己的花园别墅。此园于1909年竣工，建成后以妻罗氏（罗迦陵）命名为“罗苑”，杭州人则称其为“哈同花园”。

这是一座凝聚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建筑，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遗存的珍贵文物俯拾即是。哈同花园二幢建筑的窗棂榻扇雕刻图案，与我国传统的门窗木雕有明显的区别，它不是以传说故事、仕学孝悌为主，而是以珍贵的文物拓片为主题作装饰刻画。鲍宅山凤凰画像就是这座楼房的装饰刻画之一。他采用的鲍宅山凤凰画像是带有“东安王钦元”字样的小凤凰图，刻画的右侧以小楷字形题名为“汉王钦元凤凰题字一”。这一幅珍贵的凤凰图及题字，在哈同花园的窗棂榻扇上，历经风云变换和风雨洗礼，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这幅窗棂榻扇刻画虽然已过期颐之年，但仍在默默诉说着当年名嘈一时的辉煌。

年代认定

鲍宅山凤凰刻石的确切年代，尽管有当年的刻字内容和风格为证，但因为发现时字迹已局部漫漶不清，因此有了不同的结论，也给后人留下了考证的余地。

近代的金石学家及专著对鲍宅山凤凰刻石的年代虽然认识不已，但不外乎汉代和晋代两个时期。《金石聚》的作者张德容根据“元”字下模糊的字形，认定为“元狩”年作。《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的作者汪鋈认为“定位东汉初物无疑”。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认定为晋“元康”年。《八琼室金石补正》的作者陆增祥认定是西汉刻石。《善本碑帖录》的作者张彦生则根据“元字下似康字之上首”分析：“元康年号汉、晋皆有。由题字看，应为晋元康。”清代金石大家及著录者对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年代认定虽然不同，但共同点都是依据文字所表达的“年号”而定。

建国初期傅惜华著《汉代画像全集·叙录》对鲍宅山凤凰画像的说明是：元凤元年至六年（前80—前75年），认定是“有纪年最早之画像”。著名汉画研究者李发林于上世纪60年代发表的《略谈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分期》文也认为：鲍宅山凤凰画像是纪年最早的画像刻石。画面上所刻之字，《中国书法大词典》著录为汉隶，评价书法淳古、质朴。其他专著对年代的认定也不外乎汉晋两说。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西泠印社社长、近代考古学家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则认为：“沂水县鲍宅山摩崖刻凤凰画像，其题字有元□等字，前人或释元狩，或释元凤，以为西汉刻石。其实元□等字与三月等字不在一处，绝非年号。”马衡的观点，也许给单纯依据年号来确定画像所作年代的论证方式提了个醒，结合书法风格论证画像所作年代也许更为可信。汉画研究者李发林的研究思路就是很好的借鉴。

近年来，有的专著认定鲍宅山凤凰画像为晋朝以后之作。如李超等人著《中国



古代绘画简史·秦汉绘画》就说：“过去一般将‘鲍宅山凤凰画像’当作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例证，因其有“元凤”二字而著录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公元前80—前75年）。经实地考证，此石应为宋元以后之物，后经碑帖商人故弄玄虚泡制而出。实则从考古所见，汉画像石最早出现年代可追溯至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8年）。”不知李超等人是否“实地考证”过，也不知李超等人是否对最早发现者袁炼和许瀚二人的身世、学养及人品有所了解，更不知李超等人根据什么证据论证，就如此简单地结论为是“碑帖商人故弄玄虚泡制而出”的“宋元以后之物”。

拍卖价位

鲍宅山凤凰画像的文化价值自不待言，作为文物形式之一的旧拓，其市场价值也是不菲的。

现在市场上见到的最早拓件，是沂水刘惺父赠予蔡守的一轴纸本装裱件。蔡守，字哲夫，广东顺德人，近代广东著名的金石学家、文献学家和书画家。蔡守在这幅装裱立轴的左侧题签曰：“汉凤凰画像。旧拓本沂水刘惺父寄赠，癸丑四月装池，哲夫识。”刘惺父与蔡守过往甚密，不仅有文化交流往来，而且还专为蔡守喜得贵子遥寄珍贵的“秦量诏版”予以祝贺。蔡守在寄黄宾虹的信中就曾提到这件事：“沂水刘惺父以秦量诏版寄为弟得儿贺，其色泽固无论，而文字亦精湛罕匹，今拓呈法鉴，以为如何？”古时帝王下诏书，将诏书内容刻在金属版上称为诏版，以求存垂久远。秦量诏版又简称秦诏版，青铜刻，是学习秦篆的珍贵资料。刘惺父能觅到并收藏秦量诏版，可见也是颇具眼光的收藏家鉴赏家。刘惺父将鲍宅山“汉凤凰画像”寄赠蔡守后，蔡守遂将此拓件于癸丑（1913）装裱题签，又请李尹桑（字壶父）题跋。李尹桑，一字壶父，原籍江苏吴县，寄居广州，以精刻小篆名于时。李尹桑在上款题写了“汉凤凰画像题字”并署“哲夫社兄属题，乙卯二月壶父”，在下款题写了长篇跋文。这帧本来就很珍贵的拓件上，还有多名当时著名鉴赏家如梁鼎芬、褚德彝、风雨楼邓氏、刘三、李尹桑、邓尔疋等人的鉴藏印，因而愈加珍贵。这帧高96.5厘米，宽46厘米装裱拓件，在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2014年12月13日古籍善本专场拍卖会上，以5万—6万元人民币的参考价挂牌拍卖，最终以9.2万元成交。

日照丁氏先贤珩公

丁钢昌

日照丁氏始祖丁顺，原籍江苏海州（今江苏东海县）。明朝初期，沿海边境不时为倭寇掠扰，丁顺为避乱迁来日照，定居于刘家寨村东南二里许、傅疃河北处，当时人们称这里为丁家庄，即后来的丁家楼村。此时，朝廷命各郡、县募壮士守沿海哨墩，丁顺以勇敢中选，遂以军籍隶青州伍。之后，子孙后代皆业农，生计艰难，无人读书，多不识字，世系繁衍一度无考。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初修家谱时，即以有姓名的丁良儒为一世，以其顺延，丁尧为二世。丁尧因受“大马谲”之困，几乎倾家荡产，家境不支，决意远离县城，携全家迁居涛雚，重新创家立业。

丁珩（1565—1638），字荆璞，是丁尧的四子。他才高意广，不主故常，“痛念先阴凋零，一意向儒业，倾赀延名宿，督之就塾执经”。他不甘雌伏，发奋读书，入学求智，就至庠生，日照丁氏家族有了第一个秀才。他身体力行，兴办学堂，坐馆就教，倡导族人从事笔耕，使日照丁氏家族文墨渐浓，门户始盛。持续近200年的业农世家，开始有了功名。

丁珩共二子，长子丁允元，进士；次子丁允登，贡生。丁允元官至苏州知府，庐州兵备副使等职，为官清廉，被誉为“赔钱太守”。丁允元有子12人，孙34人，曾孙141人，玄孙349人，日照丁氏家族从此显扬发展，繁衍兴隆，乡贤名宦，层出不穷。从明末至清朝共中举49人，进士15人。而从丁珩的长子丁允元至他的曾孙丁续曾、丁勺曾进士题名，是一门连中六进士，当时在山东乃至全国轰动很大，文风之盛，实为少有。其中丁珩之长孙丁泰科进士后先后任知县、省正考官等职，政绩卓著，被公举乡贤，在他去世30年后，康熙还曾过问过他。丁珩的三孙丁时，中进士居家时，应知县之邀主修了《日照县志》，同时主持创修了《日照丁氏家乘》，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丁珩的曾孙丁士一，科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为清代日照丁氏族人官品之极。自此，日照丁氏被誉为日照第一家族。

清朝以后至今，日照丁氏充分发扬族人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各行各业名

人辈出，济济多士，为祖国和世界发展贡献各自的力量。在这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是最杰出的代表。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丁氏被誉为日照丁、牟、秦、安、李五大家族的首家，首先应归功于丁珩，他是日照丁氏家族兴旺发达的开拓者、奠基人。丁珩在年近70时，他以其子丁允元的官品和为官清廉，敕封徵仕郎中书科中书舍人，其夫人刘氏敕封孺人。丁珩不因受封而自居，仍自谦一如寒素时，保持黄花晚节。他一生正直忠诚，表里如一，“不面誉人之长，不背毁人之短。古君子也”。他慈悲为怀，爱人以德，舍己为人，大善人者。关于丁珩的为人品行，已故丁浙生先生在《先德纪闻》中做过叙述。全文如下：

三世祖荆璞公讳珩，明诸生，教馆于莒，岁暮返里，道经德靖山麓，迂一村妇哭于途，甚悲切。问之，曰夫出外谋生，久无息，家贫赖举债度日，值年关，债主催索急，无以应，只得卖身以偿，而母老子幼，吾去将更无以为生矣，语毕哭益哀。公甚悯之，适囊中有束修资若干，乃悉举以赠，妇大喜，千恩万谢去。公抵家，与语夫人刘太君，太君大称善。而家本寒素，年局措办维难矣。公与太君赋诗以自解，夫妇相视大笑乐。是年夕虽粗茶淡饭，聊以卒岁，怡如也。

公后馆于某进士家，某为京朝大员，权威盛一时，会丁父忧，居家治丧，因迷信风水，欲为父谋吉地。时有江西堪輿师蔡仙槎，声闻江南北，某聘之不至，遂乃运用权势，唆人诬蔡以罪，充军至日照。某得之即命其看风水，并请公作陪，足迹遍全邑。公与蔡相处久，甚投契，而蔡固衔某甚。一日蔡私语公曰，德靖山阳，有一良穴，用之后必大昌，某太狠毒，吾不能告之，公长者可得也，他日再到该山时，吾当以马鞭标示其位置与山向，务志之，公允诺。及重莅该山，蔡故作休息状，置马鞭于地以示公，公熟记之。后不久，某失势死，公乃复至德靖山，拟购其地，寻得地主，则为昔年赠金妇人之家也。时其夫早已自外积财回，家道转裕，夫妇见公齐叩谢，及知公来意，乃必欲以地相赠。公坚不受，遂以廉值立券。公卒后即葬此，是即吾邑有名之德靖山丁氏祖茔也。公之子孙后果发达，成为邑中望族，风水之说，渺茫难言，然以公之仁心善行，后代之昌隆，亦应为积德之报也。

公勤俭持家，有积余，偶因周急权子母，及右海公（即丁珩之长子丁允元）捷南宫，公悉取券焚之，曰吾少不喜狷薄，长不好矫饰，今幸有子兴家，无以此铢铢为也。公之忠厚率类此。

丁浙生先生关于丁珩品行之说，在日照丁氏族人中流传已久，尽人皆知，可见丁珩品行之高尚，影响之深远。

作曲界“隐士”刘廷禹

索之华



每当槐花开了的时候，作曲家刘廷禹便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当年六下沂蒙山区为创作舞剧《沂蒙颂》采风的日日夜夜……

“沂蒙山，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感人的故事数不胜数，而舞剧《沂蒙颂》所描写的就是其中的一个。通过了解，我们知道了在这个山区，当时可谓村村有医院，家家有护士。剧中的红嫂，确有其人其事，为此，我曾六下沂蒙，除了对原型主人公的采访，还收集了大量的音乐素材，如柳琴、梆子、胶州秧歌等，后来，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用人们所熟知的沂蒙山小调作为动机和主题，并在那里写出了可以说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为亲人熬鸡汤》。作为舞剧，一是靠演员的形体表演内容，二靠音乐说话。这首剧中仅有的歌曲，在音乐上没有原始的素材，而是抓住了小调的典型音型、旋律走势，以及可供发展的调式调性，结合节奏、手法上的变化创作出来的。”

刘廷禹谈话非常低调，这次难能可贵的交流，刘老师称：“这么多年来，我这是第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难怪这位多才、多量的著名作曲家，始终匿迹乐坛而鲜为人知。

他接着告诉我：“这个剧的剧本，也是我写的，而且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天就审批通过，也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成立剧组时，李德伦是组长，歌曲由

单秀荣演唱。”

六赴沂蒙的刘廷禹，每次都是和当地的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抡锹刨镐手上磨起了血泡，但正是这双满是血泡的手，写出了华丽秀美的乐章。

刘廷禹今年63岁，但精神爽朗，言语不多，却意兴盎然。他谈到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红岩青松》《祝福》《觅光》《拾玉镯》《兰花花》《女起解》《雁南飞》《红楼幻想曲》《大足石魂》《梅兰芳》；民族舞剧《乌纱魂》《阿炳》《菊夫人》《天祭》等音乐创作，部部都有令人动情的故事，段段都有使人感奋的经历。30多年来，他创作了近30部舞剧音乐，在数量上堪称世界之最。据悉，他最新创作的大型舞剧《红河谷》前期录音已经完成，此剧可望在年底与世人见面。

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的大型团体操《欢庆锣鼓》《碧水风荷》《亚运之光》，人们大概还会记得，而几代人做过和正在做着的“广播体操”，有几个人能知道这些音乐都出自刘廷禹的大手笔呢？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管弦乐《苏三》；担任亚洲杯开幕式、亚运会开幕式文艺晚会、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文艺表演、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光明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六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壮丽航程》《首都人民欢庆香港回归》、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大型音乐会《春潮颂》、纪念“五四”八十周年大型晚会《青春之歌》、纪念《黄河大合唱》六十周年音乐会、澳门回归大型文艺晚会《中华日月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红旗颂》、纪念邓小平大型文艺晚会《小平，你好》等国家级大型文艺晚会的音乐总监；担任了历届全国歌剧、舞剧及音乐、器乐等比赛的评委。至此，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去给这位在我心中突然像山一样耸立的、德高望重的音乐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只好在《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

《中国舞蹈辞典》《中国音乐家名人录》《中国当代音乐界名人辞典》《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国际名人录》《中国专家人名辞典》上摘录下他的简历：刘廷禹，1965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国家一级作曲家。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交响乐发展基金会理事、中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芭蕾舞团副团长、中央歌剧院副院长，现为北京音创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希望从今天开始，当我们唱起《沂蒙颂》的歌曲，随着音乐做起广播体操时，能想起这位勤奋、善良的作曲家……

全市党史史志工作会议召开。6月28日上午，全市党史史志工作会议召开，传达全省党史史志院长会议精神，部署安排全市党史史志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姜仕礼出席会议并讲话，各县区委党史史志研究中心主任、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姜仕礼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全市党史史志工作会议是机构改革后的第一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全市党史史志工作者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工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贯穿始终。坚持把弘扬沂蒙精神作为重要任务。沂蒙精神应成为党史研究、地方志研究的重中之重。

姜仕礼强调，要尽快理顺关系，着力推动党史史志工作融合发展。做好职能融合、思想融合、力量融合、内外融合四个“融合”。

姜仕礼提出，全市党史史志工作要突出沂蒙特色，切实提高党史史志工作质量，努力开创全市党史史志工作新局面，为新时代大美新临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市委党史研究院（市地方史志研究院）院长李洪彦就学习贯彻全省党史史志院长会议和姜仕礼部长讲话精神提出具体要求，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史史志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安排。各县区委党史史志研究中心主任就机构融合、工作开展、场馆建设等情况作了交流发言。

市委党史研究院赴临港区开展“传承沂蒙精神、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5月10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全体党员赴临港经济开发区开展“传承沂蒙精神、牢记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

全体党员参观学习了山东景耀玻璃集团、临港有色金属19万吨高碳

锰及22万吨汽车配件项目；到厉家寨纪念馆、天齐庙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现场党性教育。其间组织了赠书仪式，向厉家寨纪念馆捐赠图书600余册。

市委党史研究院组织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学习宣传。5月9日，市委党史研究院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宣传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精神。会议学习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传达提纲，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与会党员开展了座谈交流。

市委党史研究院、通达社区党支部联合赴淮安开展党性教育活动。6月25日，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市直机关单位“双报到”工作，市委党史研究院联合兰山区通达社区党支部党员赴淮安，开展“不忘入党初心、缅怀革命伟人”主题党日活动，机关、社区40余名党员参加。

活动中，全体党员参观学习了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故居，缅怀老一辈革命领导人，并开展了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中共沂南县组织史资料（2009年—2018年）》展开征编工作。近日，中共沂南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开展《中共沂南县组织史资料（2009年—2018年）》征编工作。目前，制定方案、开展培训、督导调研、上报稿件审核等工作已全面展开。

中共沂水县组织史资料（2005—2018）征编工作动员培训会议召开。5月7日，中共沂水县组织史资料（2005—2018）征编工作动员培训会议召开。会议传达了征编工作方案，对组织史资料征编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和专题培训。

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到莒县交流学习。5月16日，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到莒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交

流党史史志工作。双方就党史史志工作下一步的开展、宣传、定位、开发等问题开展交流，并交换了志书。

沂南县徐公砚亮相深圳文博会。5月16日至20日，在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沂南县徐公砚亮相展会。参展的20多件展品，每一个都加入极具特色的设计元素，深受观展人员的好评。

沂水县开展党史教育进军营活动。5月17日，沂水县委党史研究中心走进沂水县武警中队，开展党史教育进军营活动。向武警官兵们作了《千年古县——沂水》《红色的沃土——烽火中的沂水》专题讲座，并向武警中队赠送了党史史志书籍。

沂南县开展“初心·本色”建国前老党员先进事迹征编工作。近日，沂南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对全县近500名建国前老党员信息采集建档，并筛选了一批事迹突出的老党员进行集中专题采访，编辑整理《“初心·本色”——建国前老党员谈初心》资料集、拍摄《“初心·本色”》专题片。

山亭区党史研究中心来沂南县开展业务工作交流活动。6月20日上午，枣庄市山亭区党史研究中心主任朱道来一行来沂南开展业务工作交流活动。参观学习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创建纪念馆和沂蒙红嫂纪念馆，与沂南县党史研究中心负责人就党史史志融合发展、展馆建设、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进行座谈交流。

临沭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七一”前夕，临沭县委党史研究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开展“庆七一、守初心，担使命、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